《大西洋月刊》期刊摘要汇总

# The Atlantic (2024-02-02)

## The Danger Ahead

文章分析了唐纳德·特朗普若再次当选总统将带来的危险。作者认为，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现在更了解美国体制的脆弱性，将有更愿意配合的帮手，并会更专注于报复对手和寻求自身豁免。文章预测，特朗普将利用司法部停止针对他的案件，赦免支持者，并可能动用军队镇压抗议。第一任期中曾限制特朗普的“房间里的成年人”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忠诚的工具。右翼智库已在规划如何瓦解制度保障。文章强调，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使美国陷入比内战以来更严重的宪法危机，并可能导致社会走向不可逆转的黑暗道路。阻止特朗普不是为了特定议题的进展，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宪政民主结构，保留未来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 Trump Will Abandon NATO

文章认为，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很可能会放弃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从而重塑国际秩序并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特朗普长期以来对北约持怀疑态度，尽管在第一任期内因顾问的劝阻未能退出，但在第二任期内他将由更支持或不关心联盟的忠诚者包围。作者指出，特朗普只需通过一次讲话或社交媒体帖子，就能瓦解北约最关键的心理威慑力，即使法律上退出程序复杂。一旦盟友不再确信美国会在受到攻击时提供援助，俄罗斯等潜在对手的攻击可能性将增加。这将迫使欧洲国家重新武装并可能转向俄罗斯，亚洲盟友如台湾、韩国、日本也将质疑美国的可靠性，可能更靠近中国。文章警告，美国影响力的终结可能在相对默默无闻中发生，而美国人可能因国内动荡而无暇顾及，直到为时已晚。

## Loyalists, Lapdogs, and Cronies

文章探讨了特朗普若赢得第二任期，其政府人员构成将与第一任期显著不同。作者指出，第一任期中那些试图约束特朗普的经验丰富的“房间里的成年人”已经离开或与他决裂。特朗普现在优先考虑的是忠诚而非资历，他吸取了教训，将任命那些愿意执行其议程的人，即使这些议程具有争议或潜在非法。文章列举了潜在的忠诚派人选，如斯蒂芬·米勒（可能负责移民或国土安全）和理查德·格雷内尔（可能担任国务卿），以及可能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忠诚派人士，他们可能利用该部门进行报复。文章特别强调了“2025计划”等右翼组织的努力，旨在废除公务员保护（Schedule F），允许总统解雇多达五万名联邦工作人员，并用政治任命者取而代之，从而彻底政治化联邦官僚机构。文章总结，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将由唯命是从的工具组成，专注于实现特朗普的报复和腐败冲动。

## The Specter of Family Separation

文章指出，特朗普及其盟友已承诺在第二任期内恢复并扩大其严厉的移民政策，包括导致家庭分离的“零容忍”做法。斯蒂芬·米勒等前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度推行移民限制。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公开承诺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驱逐行动”，并计划完成边境墙、重新实施Title 42（一项疫情期间的快速驱逐政策）以及使用军事化营地收容被捕移民。文章还提到结束出生公民权、部署军队到边境（援引《叛乱法》）等更激进的计划。作者认为，这些政策的目的更多在于迎合其支持者，而非实际效果。文章指出，第一任期内的一些内部阻力（如伊万卡·特朗普和库什纳）将不复存在，米勒等人已学会如何巩固权力。文章警告，特朗普的回归将重新撕裂受其政策影响的社区，并可能对经济造成损害（因移民工人减少），同时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反对移民的立场正常化，为其他国家采取严厉措施提供先例。

## How Trump Gets Away With It

文章分析了特朗普若再次当选，将如何利用总统权力规避法律责任并报复敌人。作为首席执法官，他将掌控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虽然他在第一任期内曾面临阻力，但在第二任期内，他将任命忠诚派担任关键职位。他可以解雇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并下令撤销针对他的联邦指控，即使审判正在进行。文章指出，尽管州级案件（佐治亚州和纽约州）不在联邦管辖范围，但法律顾问办公室关于在任总统不受起诉的意见可能会使州法院推迟审理至2029年，届时检察官可能已更换。文章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如何通过任命忠诚派或特别检察官来调查和骚扰对手（拜登家族、前官员、法官），即使难以定罪，也能让他们付出巨大的法律和精神代价。文章还提到利用法律顾问办公室为非法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的可能性。文章总结，特朗普的最终目标是将法律和制度暴力作为个人权力武器，第二任期将使他更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其限制仅取决于其他机构的抵抗意愿。

## Four More Years of Unchecked Misogyny

文章认为，特朗普若赢得第二任期，将导致针对女性的厌女症不受约束地蔓延，其影响将比第一任期更甚。作者将特朗普的厌女症定义为强制女性符合其期望并服从其欲望，而非简单的仇恨。文章列举了特朗普公开贬低女性外貌和面临性行为不端指控的历史，以及他第一任期内通过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对堕胎权造成的巨大冲击。文章指出，MAGA共和党内部男性主导和反堕胎极端主义日益增强。特朗普的言行鼓励了网络和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者和厌女者。作者认为，与第一任期不同，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将由那些强化其黑暗冲动的人包围，导致厌女症在文化和政策层面不受限制地渗透。文章总结，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煽动性别恐慌，并为女性和不符合刻板性别规范的人创造一个更压抑和危险的美国。

## The Climate Can’t Afford Another Trump Presidency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对气候行动造成严重损害，其策略将是忽视气候问题并瓦解相关环境政策。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从政府网站删除气候变化信息、试图废除清洁能源计划等行为，文章预测第二任期将加倍推行此策略。在全球层面，美国可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削弱国际合作。在国内层面，尽管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清洁技术已普及，州和市层面的气候行动也在加强，但特朗普政府仍能造成重大破坏。化石燃料游说团体将努力拆除气候政策，右翼智库正计划阻止电网升级、削减环保机构预算和执法力度。文章特别指出，政府网站上的公共环境数据可能再次被删除，这是一种脆弱性。文章总结，尽管一些进展难以逆转，但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显著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可能使环境数据和科学发现更容易受到政治操纵。

## Is Journalism Ready?

文章审视了特朗普与新闻媒体之间复杂且常常失调的关系，质疑新闻业是否为他可能到来的第二任期做好了准备。作者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一种互利但充满敌意的表演，特朗普渴望关注却又攻击媒体为“人民的敌人”。文章指出，媒体机构在财务上变得依赖于报道特朗普的争议，导致对轰动效应的过度关注。特朗普的持续攻击侵蚀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尤其是在共和党人中。作者认为，特朗普的目标是摧毁客观事实的概念，他的影响使媒体变得更加自我中心、分裂和自以为是。虽然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利用总统权力针对媒体的尝试效果有限，但文章警告，第二任期可能会有更具威胁性的行动，包括利用联邦通信委员会、司法部调查甚至逮捕记者。文章强调，最大的危险不是法律或财务风险，而是新闻业变得无关紧要，因为特朗普成功地说服了大量公众，认为媒体对民主没有特殊价值。文章引用匈牙利和菲律宾的例子，说明独立媒体如何被削弱。文章总结，新闻业必须为法律攻击、经济压力和恶劣环境做准备，坚持不懈地调查并坚守事实，即使这不能立即改变公众舆论或拯救民主，因为民主最终取决于美国人民。

## Trump’s Polarization of Science Is Bad for Everyone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继续攻击和扭曲与他议程相悖的科学发现，进一步加剧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沿着党派界线两极分化。文章回顾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例子，如“记号笔门”（篡改飓风预测）以及他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淡化病毒威胁、推广未经证实疗法、嘲笑口罩、对疫苗犹豫不决）。尽管民调显示在他任期内公众对科学家的整体信任度有所提高，但这掩盖了共和党人信任度下降而民主党人信任度上升的显著党派分歧。文章认为，特朗普的行动及其引发的反应使科学政治化，将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部落信仰”。文章预测，第二任期将恢复对环境科学的压制，并在堕胎药、胎儿组织研究等政治敏感领域向联邦机构施压。文章警告，持续的两极分化使得国家在未来危机（如流行病或自然灾害）面前难以集体应对，因为人们甚至无法就共同的事实达成一致。文章总结，这种两极分化对所有人都不利，阻碍了在紧急情况下相互依赖和共享信息的能力。

## Corruption Unbound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系统性滥用以谋取私利，从第一任期“即兴的小型腐败”转向类似于“黑手党国家”的模式。文章对比了第一任期初期一些官员因轻微道德问题辞职，与后期利用总统职位牟利（如特勤局在特朗普房产的开销、外国政府在其酒店消费）的常态化。文章指出，特朗普及其盟友已经形成了一套利用公职的“剧本”，并且自信不会受到惩罚，部分原因在于共和党已对其腐败行为漠不关心。文章将其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政权进行类比，该政权通过裙带关系、清洗公务员、奖励忠诚者并利用国家权力对付批评者来运作，同时保持选举合法性。文章重点提及“2025计划”，该计划旨在恢复Schedule F，允许解雇多达五万名公务员并代之以忠诚派，从而彻底政治化官僚机构，这些忠诚派将利用政府资源为个人和政治利益服务。文章警告，外国专制领导人将懂得如何在这样的体系中寻求恩惠，可能显著地使特朗普及其盟友致富。文章总结，特朗普有充分动机拆除现有体系，代之以一个服务于其自身经济利益的体系，实现他长期以来像犯罪家族头目一样运作的愿望。

## Why Xi Wants Trump to Win

文章认为，尽管特朗普曾发动贸易战并发表强硬言论，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更希望特朗普赢得第二个任期，而非拜登。文章解释说，虽然特朗普声音响亮，但拜登在对抗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野心方面更有效。文章引用拜登政府对先进半导体等技术的出口管制，认为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芯片产业和人工智能发展。文章强调，拜登成功地重振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联盟网络（如G7协调、与印度的关系），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这令北京感到担忧，并导致习近平变得更加敌对和孤立，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结盟。文章认为，即使特朗普保留拜登的一些政策，他的回归也将危及民主国家之间的统一战线。特朗普的重点可能只集中在贸易等特定问题上，而在人权或台湾问题上摇摆不定。特朗普退出全球领导地位及其总统任期内的混乱，使得中国能够将自己宣传为负责任的大国，并将美国描绘成衰落的超级大国。文章总结，虽然习近平无论谁当选都会推行其议程，但特朗普的回归将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民主，为习近平扩大中国影响力、赢得发展中国家支持提供更多机会，从而巩固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影响力。

## A MAGA Judiciary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任命更多不仅是意识形态保守派，更是“右翼狂热分子”的联邦法官，他们致力于保护特朗普和共和党免受问责，并逆转民权进步。文章指出，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已经导致“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和肯定性行动的结束，但他的盟友现在更有准备用忠诚派填补司法空缺。文章引用马修·卡斯马里克法官作为特朗普主义法官的原型，他基于个人道德和对“历史和传统”的选择性解释来无视先例。文章认为，这种“历史分析”常被用来为保守结果辩护，并与一种偏爱“特定、男性化意识形态”的法理学相关。文章指出，有野心的法官会积极展示他们的忠诚和意识形态极端性。文章描述了右翼上诉法院如何迅速将“边缘思想转化为法律”，为保守派最高法院制造案件。文章总结，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继续并加速任命那些不太可能抵制他集中权力努力的法官，他们将利用“历史和传统”来证明一个保守政治权力不受挑战的未来是正当的。

## The Proud Boys Love a Winner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验证极右翼极端分子的暴力意识形态，并可能使他们逃脱法律制裁。文章解释说，特朗普的言论，尤其是在2021年1月6日之前，从隐性煽动转向直接鼓动。尽管针对极端分子和特朗普本人的法律反击（起诉、Proud Boys/Oath Keepers领导人定罪、福克斯新闻和解）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特朗普的胜利将被视为一种平反。特朗普已经承诺赦免许多1月6日事件的参与者，由他控制的司法部可能将此延伸至联邦定罪的极端分子领导人。文章警告，极端主义将“嵌入国家机构”，并针对被视为对手的人。文章总结，特朗普的回归将形成一种叙事，即极右翼极端主义在拜登时期遭受挫折后再次兴盛，这对美国构成了重大威胁。

## A Plan to Outlaw Abortion Everywhere

文章讨论了反堕胎活动家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受到鼓舞，正寻求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合法堕胎，可能通过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康斯托克法案》进行新的解释和执行来实现。文章解释说，这项1873年的法律禁止邮寄用于堕胎或不道德用途的物品。尽管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执行，但活动家认为，特朗普的司法部可以将其重新解释为事实上的禁止邮寄堕胎药物和用品，影响邮政服务和私人承运商。这不仅可能将制造商和提供者定罪，还可能将接收药丸的个人定罪。一些活动家旨在利用《康斯托克法案》关闭所有堕胎设施，即使在堕胎合法的州，通过阻止运输必要的用品（包括用于流产护理的物品）。法律专家认为，这一策略理论上可能成功，至少能将问题提交法院，可能迫使最高法院对该法案的广泛解释作出裁决。文章指出，尽管特朗普最近在堕胎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温和，但他迎合其基本盘的历史以及他自称“美国历史上最支持生命权总统”的言论表明，他可能倾向于积极执行该法案以安抚活动家，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对堕胎进行重大限制。

## The Truth Won’t Matter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通过进一步侵蚀公众接受共同现实和客观事实的意愿，威胁民主的基础。文章描述了特朗普依赖其“直觉”以及他制造荒谬和愤怒的能力，使世界看起来困难重重，同时将自己描绘成解决方案。文章解释说，特朗普擅长将谎言变成卖点，不仅扭曲真相，更是抹杀真相，让追随者“凭感觉找到自己的事实”。文章指出，这与党派媒体关注叙事而非真相，并将真相视为一种消费选择相符。文章认为，特朗普的方法植根于营销语言，优先考虑引人入胜而非真实，使注意力成为货币。文章讨论了这种情感风格如何限制政治想象力并排除同情心。文章将其与民主对学习、好奇心、耐心和谦逊的要求，以及想象他人经历的必要性进行对比。文章总结，特朗普解除了选民的这一负担，将他们视为永远正确的顾客。文章警告，他的言论正常化以及公众对其极端主张的麻木，可能导致即使他指示司法部针对对手，人们也会耸耸肩，因为他们已经听他承诺了多年。文章总结，特朗普的威胁并非虚张声势，而是认真的意图，公众未能认真对待这些威胁是一种危险的正常化形式。

## Donald Trump vs. American History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试图将其“有害、错误的史学主张”强加于学校课程，并在课堂上制造恐惧文化，旨在推行一种经过净化、民族主义的美国历史版本。文章以罗伯特·E·李雕像和特朗普为这位邦联将军辩护为例，说明他向其基本盘发出的信号以及他对“失落事业神话”的拥抱。文章解释说，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是承诺恢复一个白人基督教男性掌握政治权力的旧秩序。文章详细阐述了他2024年的教育计划，旨在削减对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性别意识形态或其他不当种族、性或政治内容”的学校的联邦资金，这与共和党控制州压制教授不符合固有正义叙事（奴隶制、吉姆·克劳法、原住民流离失所等）的美国历史方面的努力相呼应。文章讨论了他成立“1776委员会”作为对“1619项目”的直接反驳，旨在教授关于一个“卓越国家”的“伟大真相”。文章认为，特朗普主义试图审查与这一叙事相矛盾的经验证据，将其贴上意识形态灌输的标签。文章指出，特朗普已经试图改写1月6日的历史，将叛乱者描绘成爱国英雄。文章总结，特朗普致力于压制对美国历史复杂、道德不一致的看法，历史表明，当他发誓若再次当选将加倍努力时，我们应该相信他。

## A War on Blue America

文章认为，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将升级其惩罚和控制民主党倾向州和城市（“蓝色美国”）的努力，将其视为对手。文章回顾了他第一任期内的行动，如限制州和地方税收抵扣（损害自由派州的富裕居民）、试图拒绝向“庇护城市”提供拨款，以及试图剥夺加州的污染标准制定权。文章强调了他任期最后一年更具威胁性的行动，即在抗议和骚乱期间向蓝色城市派遣联邦特工和国民警卫队，通常违反地方官员的意愿，导致出现无标记车辆和激进行动。文章详细阐述了他第二个任期的计划，包括通过联邦立法强加红色州政策（例如，关于批判性种族理论）、对自由派检察官发起民权调查，以及要求城市采用保守派青睐的警务政策。文章强调他公开承诺进行军事化执法行动，包括使用联邦资源和国民警卫队恢复“法律和秩序”，并进行“最大规模的国内驱逐行动”，可能涉及大规模拘留营。文章讨论了总统在未经地方同意的情况下部署联邦军队的法律模糊性，以及可能援引《叛乱法》等紧急法规。文章总结，特朗普的议程，受到对对手的怨恨驱使，可能通过将国家的重要部分视为需要控制和惩罚的敌对领土，对国家凝聚力构成自内战以来最大的威胁。

## Trump Isn’t Bluffing

文章认为，公众已经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极端言论变得麻木，未能认识到他的信息已经变得更加黑暗和明确的威权主义，并且他对自己的威胁是认真的。文章引用他使用“害虫”等词语来描述政治对手，这呼应了法西斯语言。文章指出，虽然他第一次竞选和任期内有煽动性言论，但今天的特朗普更多地受到他对2020年选举失败的愤怒、针对他的法律案件以及对政治对手的报复欲望的驱动。文章强调了他最近的言论例子：称自己是“非常自豪的选举否认者”，威胁法官、证人、检察官甚至检察官的家人，暗示前官员（米利）应被处决，呼吁调查并可能关闭新闻网络（NBC），并誓言逮捕和起诉政治对手（拜登）。文章解释说，由于反复接触以及他从推特等平台转移，震惊感已经消失，使他的极端主义对一些人来说不那么显眼。文章认为，这种“正常化”使国家适应了威权主义思想，因此如果他在第二个任期内兑现威胁（例如，利用司法部监禁对手），人们可能会耸耸肩，因为他们已经听他承诺了多年。文章总结，特朗普的威胁不是虚张声势，而是认真的意图，公众未能认真对待这些威胁是一种危险的正常化形式。

## Civil Rights Undone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试图瓦解数十年的民权进步，这建立在他第一任期内的努力之上。文章重点提及司法部长比尔·巴尔在2020年底提出的一项规则修改，旨在废除“歧视性影响”标准，这是打击歧视的关键工具，即使没有恶意意图，某些做法也会不成比例地影响边缘化群体。文章解释说，这一标准至关重要，因为公开的偏见不如具有歧视性影响的政策普遍，并且它将举证责任从证明意图转移到证明歧视性结果。文章指出，特朗普司法部放弃了对投票权的积极保护，环保署忽视了民权投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缩减了对住房歧视的调查。他的最高法院任命者也削弱了民权法律（结束了肯定性行动）。文章预测，第二个任期将通过瓦解歧视性影响来完成这项工作，甚至可能主张其违宪。这将消除解决警察暴行、有色人种社区环境不公以及住房歧视的主要工具。文章认为，许多保守派反对歧视性影响不仅是出于哲学原因，更是出于对联邦确保平等的努力的本能蔑视，这种情绪因共和党拥抱白人民族主义而得到鼓励。文章总结，特朗普将从两方面攻击民权法律（削弱执法和挑战合宪性），考虑到保守派主导的司法机构和两极分化，这些改变可能实际上永久化，从而瓦解民权时代的基础。

## Trump’s Plan to Police Gender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把压制和危害LGBTQ群体，特别是跨性别者的努力推向全国并升级，超越州级限制。文章指出，LGBTQ群体在公众接受度方面取得的进展正受到政治领导人煽动性言论的挑战。文章回顾了特朗普从2016年假装同情到第一任期内撤销LGBTQ保护（医疗保健、就业、住房、兵役），以及现在公开使用反跨性别言论作为关键竞选主题。文章详细阐述了他的“保护儿童免受左翼性别疯狂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全国性的二元性别定义，并停止推广性别转换的联邦项目，可能导致行政上的残酷行为，如阻止文件上的性别标记更改和阻止医疗补助支付性别确认护理。文章警告，尽管拜登政府恢复了保护措施，法院也限制了一些州的极端行为，但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任命反同性恋法官，并重新推动允许歧视的宗教自由解释。文章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已经与针对LGBTQ群体和被视为不符合规范者的仇恨犯罪增加相关。文章总结，如果他煽动性别恐慌的策略成功，将使蔑视和暴力正常化，为LGBTQ个人和儿童创造一个更压抑和危险的美国。

## A Military Loyal to Trump

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优先把美国军队变成一支忠于他个人而非宪法的力量，并且他将比第一任期更有效地推行这一计划。文章解释说，在他第一任期内，职业军官和文职官员（如马克·米利将军）抵制了他的反民主冲动（杀害阿萨德、动用军队对付抗议者、夺取投票机），这为特朗普赢得了深刻的怨恨和威胁（如暗示米利应被处决）。文章预测，第二个任期将看到特朗普从一开始就任命忠诚派和“走狗”（更多迈克尔·弗林、安东尼·塔塔、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担任国防部最高职位，必要时通过代理任命绕过参议院确认。文章强调了“2025计划”蓝图，该蓝图呼吁清除高级军官中的“马克思主义灌输”，并恢复因拒绝接种疫苗而被解雇的军人。文章认为，特朗普将利用军队服从指挥链的训练以及一些人员可能缺乏公民素养来实施其议程。文章警告，这可能危及国家安全（解散北约等联盟、削弱情报部门）、发布非法命令（酷刑、战争罪），甚至使用核武器。在国内，他可能下令进行违宪的军事展示以恐吓对手，派遣士兵镇压抗议者（可能在就职日援引《叛乱法》），并清洗持不同政见的军官。文章总结，如果特朗普成功控制军队，同时削弱法院和司法部等保护民主的关键机构，将没有任何力量阻止他使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并继续掌权，这曾是不可想象的前景，但现在已是明确的威胁。

## The Left Can’t Afford to Go Mad

文章认为，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左翼产生了激进化影响，导致一些自由派陷入“高戏剧性、低影响力的愤怒”和弄巧成拙的策略，而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需要一个更务实、更外向的反对派。文章描述了一些自由派如何沉迷于“抵抗运动”，专注于希望特朗普消失或期待奇迹，而不是有效地反对他的政策。文章指出，社交媒体放大了这种现象，导致出现“橙色人坏”的漫画形象，并专注于清除自由派圈子内的异议者。文章认为，2020年的灾难（疫情、乔治·弗洛伊德谋杀案）进一步将一些自由派推向内部，优先考虑净化仪式和身份政治，而不是更广泛的政治行动或谈判。文章将此与通过务实和关注实际问题（如“修好该死的路”）在红色地区获胜的成功民主党政治家进行对比。文章认为，乔·拜登在2020年初选中的成功，特别是他在黑人选民中的表现，显示了选民偏爱一个专注于与共和党合作的温和派候选人。文章总结，如果特朗普再次获胜，左翼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专注于清晰冷静地反对他的权力滥用，捍卫民主规范（言论自由、法治），寻求转化而非猎杀异端，并提供一个基于说服和实际问题的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而不是屈服于绝望或进一步激进化。

##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American Psyche If Trump Is Reelected?

文章探讨了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可能对美国民众心理造成的潜在影响，认为这将迫使许多人长期处于慢性应激状态（“战斗或逃跑模式”），而人体并非为此设计。文章回顾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持续的压力和“技术应激”（强迫性地查看新闻），这些扰乱了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文章引用研究表明美国人政治压力水平很高，一小部分人甚至因政治产生自杀念头。文章讨论了“异位负荷过载”的概念，即慢性应激导致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的临界点。文章提到一项研究将特朗普当选与拉丁裔女性早产率上升联系起来。文章指出，可能出现人口层面的“习得性无助”，导致冷漠和绝望，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从而形成一个有利于潜在极权主义者的“冷漠共和国”。文章认为，虽然特朗普的反对者将承受巨大负担，包括害怕他和他的基本盘的共和党民选官员，但他的支持者将“陶醉”，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和极端行为增加，正如他第一任期内所见。文章总结，即使特朗普失败，现有的两极分化和不信任也将继续造成影响，但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压垮宪法规范，对集体心理和国家造成潜在的不可逆转的损害。

## Trump Voters Are America Too

文章挑战了自由派常表达的观点，即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代表美国“我们是谁”。文章认为，这句话，由米歇尔·奥巴马和乔·拜登等人在2016年选举和1月6日事件后使用，已被证明是一种“自由派的愿望”，而非对国家性格的准确评估，因为尽管特朗普的行为和争议不断，仍有数百万美国人继续投票支持他。文章回顾了2015-2016年的报道，当时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代表他们说话，并将自由派的蔑视（“我们比这更好！”）视为对他们自身的攻击。文章指出，希拉里·克林顿的“可悲者”言论证实了这种相互蔑视。文章强调，特朗普在2020年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显示出即使在一个动荡的总统任期后，他仍拥有庞大且持久的支持基础。文章认为，尽管他卸任后的行为（第二次弹劾、起诉）和1月6日事件不断，这种支持依然存在，许多共和党人对此轻描淡写或予以原谅。文章总结，忽视特朗普选民是无益且不准确的；他们“和任何理想化的美国愿景一样美国化”。如果特朗普再次获胜，他的反对者将不得不面对与大量人口共享一个国家的现实，即使特朗普在反对者看来正螺旋式地陷入道德深渊，他们仍然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人”。

## My Father, My Faith, and Donald Trump

这是一篇个人随笔，作者蒂姆·阿尔伯塔反思了他与福音派牧师父亲的关系、他们对唐纳德·特朗普的不同看法，以及特朗普主义对其父突然去世后美国福音派教会的影响。阿尔伯塔讲述了在他父亲的探视和葬礼上，人们专注于政治和他对特朗普的批评，甚至质疑他的信仰和忠诚，而他正在悲痛中。他将此与非基督教朋友和谦逊的教会成员提供的真诚安慰形成对比。文章探讨了他父亲与信仰和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他作为海军陆战队员的过去，以及他最终拥抱全面共和主义，部分原因在于他反对堕胎的立场以及相信美国是一个蒙受神祝福的国家。阿尔伯塔描述了他的父亲，虽然不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但难以将他的爱国主义与他的牧师事工分开，有时将政治忠诚置于基督教原则之上，这体现在他对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葬礼的反应以及他对特朗普品格的辩护，尽管他知道特朗普的缺点。文章还详细描述了他父亲的继任者克里斯·维南斯牧师的挣扎，他是一位政治上不那么保守的牧师，面临着会众的强烈批评和脱离，他们要求他与特朗普和保守政治观点保持一致，这导致了巨大的压力和教会社区的濒临崩溃。维南斯总结说，核心问题是“偶像崇拜”，美国已成为一些福音派人士的偶像，导致他们将国家认同置于信仰认同之上，并为美国而战，仿佛救赎取决于此。文章总结，作者现在认为教会内部的政治痴迷不再有趣，而是对一些成员迷失方向的严重警告信号，他们将政治忠诚置于核心基督教价值观之上。

## SNL’s New Kings of Bizarro Buddy Comedy

文章评论了喜剧团体“请不要破坏”（Please Don't Destroy）及其对《周六夜现场》（SNL）数字短片的影响，将其与早期的“孤独岛”（The Lonely Island）进行比较。文章讨论了“懒惰星期天”（Lazy Sunday）如何通过将荒谬与主流元素融合来重振SNL的数字存在。文章认为，“请不要破坏”尽管与节目有渊源，但为SNL带来了新的Z世代能量，其特点是快速剪辑、低保真、从平凡迅速转向歇斯底里的短片。文章指出，他们的视频常从SNL办公室开始，并利用他们在节目中的不确定地位和对素材的渴望。文章强调他们运用升级的荒谬感和一种“兄弟情谊能量”，感觉像压缩的伙伴喜剧，带有疯狂的边缘，探讨男性友谊、不安全感以及成人关系威胁他们羁绊的恐惧。文章提到了他们最近的电影《迷雾山宝藏》，该片试图将他们的短片风格转化为长片，但感觉冗长，不如他们的短片有效，尽管不乏喜剧亮点。文章总结，虽然电影有不足，但他们的SNL短片提供了引人入胜、常带怪诞色彩的动态描绘，并成功地为智能手机时代更新了节目的数字喜剧。

## What Does the Working Class Really Want?

文章探讨了美国工人阶级，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的政治变迁，并质疑两党是否真正理解或满足他们的需求。文章讨论了政治重组的历史以及当前政治僵局和两极分化的状态，两党都陷入“魔法思维”，互不信任，常将选举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而非民意。文章认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教育两极分化”，大学教育的白人转向民主党，而未受大学教育的选民（包括越来越多的非白人选民）转向共和党。文章指出，尽管不平等日益加剧，文化问题已取代经济问题成为焦点。文章评论了几本分析这一转变的书籍，重点介绍了大卫·莱昂哈特的《我们曾拥有光辉的未来》，该书将美国梦的衰落和工人阶级的异化归因于两党精英青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民主党转向身份政治并远离经济民生问题和劳工。莱昂哈特认为，虽然种族起了一定作用，但对身份政治的关注疏远了所有种族的工人阶级选民，他们通常持有更具社群性的价值观（秩序、传统、忠诚），并关注犯罪、移民和贸易等问题。文章还讨论了朱迪斯和特谢拉的《民主党都去哪儿了？》，该书同样呼吁民主党回归新政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中间路线，拒绝后六十年代左翼的“文化激进主义”。文章提到乔舒亚·格林的《反叛者》，该书认为桑德斯和沃伦等人物专注于经济民粹主义，看到了民主党的复兴，但忽视了文化的作用。最后，文章讨论了帕特里克·鲁菲尼的《人民党》，该书主张共和党基于多族裔民粹主义联盟进行重组，认为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更能驱动许多选民的投票行为。文章总结，经济和文化对于工人阶级美国人来说是复杂的，他们经历了经济上的忽视和文化上的两极分化。文章认为，工人阶级不是一个为了政治利益而解决的难题，而是占国家一半人口的群体，他们的繁荣对整个国家至关重要，政治需要提供稳定和独立，而不是更多的混乱和痛苦。

## Zombie History Stalks Ukraine

文章评论了塔尼娅·马尔亚尔丘克的长篇小说《遗忘》，该书探讨了乌克兰的“僵尸历史”或代际创伤概念，其中残酷的过去占据了生者的身体和心灵。小说讲述了一位未具名年轻女作家强迫性地拖地，这是她从祖母索尼娅那里继承的习惯，索尼娅是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索尼娅的创伤在叙述者身上表现为瘫痪般的恐惧。小说将叙述者的故事与20世纪初的政治思想家维亚切斯拉夫·利平斯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利平斯基尽管出身波兰贵族，却选择认同乌克兰，并倡导地域主义（基于土地而非种族的公民身份），反对盛行的民族主义。叙述者研究利平斯基，以理解自己与过去的联系。文章强调了小说如何通过身体症状和强迫行为来描绘过去从坟墓中复活，以及记忆如何与遗忘抗争，写作是记忆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文章指出，马尔亚尔丘克运用了隐喻和超现实主义，尽管有时语气压抑。文章讨论了利平斯基在双重身份下的挣扎以及他的身体疾病（肺结核、一种导致他看到人只有一只眼的神经系统疾病）作为心理危机的表现。文章指出，小说省略了赫梅利尼茨基在屠杀犹太人中的作用，突显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文章总结，尽管小说令人困惑且不完美，但它令人难忘，并通过存在和记录记忆的行为来反抗绝望，暗示生存和记忆是对祖先的亏欠。文章最后提到马尔亚尔丘克在2022年入侵后难以创作小说，暗示遗忘的“巨大蓝鲸”也可能代表普京的俄罗斯。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BM Way’

文章评论了关于IBM中世纪CEO小托马斯·J·沃森的传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资本家》以及詹姆斯·W·科尔塔达的IBM历史著作《IBM：兴衰与重塑》，并以IBM的故事反思企业文化、创新和社会责任。文章描述了IBM在老托马斯·J·沃森领导下的早期历史、对打孔卡技术的拥抱以及其福音派、家长式的文化（“思考”、终身雇佣、公司俱乐部）。文章强调了老沃森对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及其在实施社会保障法中的作用。文章随后重点介绍了小托马斯·J·沃森的领导力，他对父亲风格的反叛，以及他将IBM引入计算机领域的关键决策，最终促成了冒险但成功的System/360项目。文章指出小沃森的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种族隔离和麦卡锡主义，以及他的“冲突管理”体系。文章讨论了这种竞争以及System/360项目对沃森家族，特别是小汤姆的弟弟迪克的个人代价。文章随后涵盖了IBM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衰落，错失了个人电脑和软件的繁荣，以及卢·格斯特纳的拯救，其中包括结束终身雇佣制和瓦解旧的沃森文化。文章将IBM过去对员工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与现代企业优先事项（股东、高管薪酬）进行对比。文章最后指出IBM最近对人工智能（watsonx）的关注，以及放弃以人为本的“IBM方式”可能成为其未来关键的讽刺，这会让两位沃森都感到震惊，他们曾将IBM视为永恒的机构。

## Camille Claudel’s ‘Revolt Against Nature’

文章评论了法国雕塑家卡米尔·克劳德尔的新展览，认为这确立了她作为其时代最杰出艺术家之一的地位，摆脱了导师兼情人奥古斯特·罗丹的阴影。文章强调了克劳德尔的天赋，即使在她加入罗丹工作室之前就已显现，以及她作为女性在男性主导领域面临的障碍，引用了美术部拒绝支持她感性雕塑《华尔兹》的例子。文章讨论了她与罗丹的关系，将其描述为艺术合作（影响双向流动）和个人斗争，指出罗丹同意支持她的事业以换取她的陪伴，以及她在关系期间决定堕胎。展览展示了他们合作的深度，同时强调了克劳德尔独特的视角，特别是在描绘女性内心生活方面，将她的《蹲伏的女人》与罗丹更具物化色彩的版本进行对比。文章赞扬了她脱离罗丹后的作品，如《小女士》和《闲聊者》，认为它们是展示她技术技巧、情感洞察力和独立于罗丹风格的杰作。文章指出，尽管受到评论界赞誉，她的才华有时仍被性别化描述（“阳刚”、“男性”）。文章最后回顾了她被家人悲剧性地送入精神病院，在那里度过了30年，再未进行雕塑创作。文章认为，展览提醒我们她非凡的决心，她作品中女性身体的力量和脆弱，以及当女性的选择和艺术视野被压制时所失去的一切。

## The Wish

这是一首诗，探讨了对未知的渴望以及对已知悲伤的逃避。诗歌表达了对父辈未竟之愿的痛苦，对亲人遗体散落异乡的哀伤。在灰色的天空下，非鸟的队列中，无声的歌声中，诗人渴望被听到，渴望在被鄙视的深渊中得到救赎。诗中燃烧的面孔飞入虚无，愿望永远无法实现，无法变得不可见。诗歌以抽象的意象，传达了失去、身份认同和存在困境的主题，流露出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和对现实的挣扎。

# The Atlantic (2024-03-02)

## How a Playwright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cisive Social Critics of Our Time

本文深入探讨了剧作家迈克尔·R·杰克逊及其对当代美国社会，特别是艺术界社会正义话语的尖锐批判。文章以杰克逊因其普利策获奖音乐剧《奇怪的循环》收到粉丝赠送防弹背心的离奇经历开篇，揭示了他对2020年“种族清算”时期一些人利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谋取个人利益的厌恶。杰克逊认为，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平行宇宙”，身份认同的痛苦被转化为社会资本，尤其在艺术界，许多人利用这一时刻推进自己的职业。他批评了表面化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EI）努力，认为它们有时会阻碍少数族裔艺术家的真正发展，强调艺术应追求“他妈的真相”，而非迎合政治正确。文章还回顾了杰克逊的成长经历、创作历程及其第二部作品《危险中的白人女孩》，指出他是一位复杂、自我意识强烈的社会观察者，其作品挑战了简单化的“觉醒”叙事，展现了对美国种族和社会动态的深刻洞察。

## Meet Me in the Eternal City

本文探讨了硅谷精英阶层热衷于建造新城市或“网络国家”的现象，认为这是他们试图逃离现有民主体制及其弊端的体现。文章聚焦于Vitalik Buterin组织的Zuzalu活动以及Dryden Brown的Praxis项目，这些倡议旨在通过在线社区、众筹购地等方式建立基于特定理念的新社会，摆脱美国法规、税收和文化战争的束缚。这些项目吸引了科技界的有影响力人物，他们梦想创造由“认知精英”主导的乌托邦，追求技术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文章追溯了这种“退出”冲动在美国历史和科技界的渊源，从1970年代的自由主义定居点构想到Curtis Yarvin的“拼凑”概念，再到《主权个体》一书的预言。尽管这些项目充满宏大叙事和对现有体制的抱怨，但文章也指出其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风险，例如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冲突，以及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的精英主义倾向。最终，文章反思了现有城市的复杂性和生命力，质疑硅谷精英的逃离主义是否忽视了人类社会固有的混乱与美好，以及“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在那里”的现实。

## Uncancel Woodrow Wilson

本文探讨了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声誉的急剧下滑，他曾被历史学家和总统们高度评价，如今却因其种族主义思想和政策而受到左右两翼的普遍谴责，其名字被从学校和纪念物上移除。文章承认威尔逊确实存在严重的种族偏见，他在任内推行并加强了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并持有歧视性观点。然而，作者认为，对威尔逊的片面谴责忽视了他作为一位重要的国内改革者和自由国际主义奠基人的历史贡献。文章列举了他在任内推动的进步主义改革，如降低关税、建立所得税和联邦储备系统、反垄断立法以及支持妇女选举权等。在外交方面，他提出了“威尔逊主义”，倡导通过民主国家联盟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愿景在二战后得以部分实现，并至今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作者认为，当代社会在理解历史人物时过于僵化和缺乏宽容，未能认识到过去时代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文章呼吁在承认威尔逊的缺陷和错误的同时，重新审视和珍视他为美国带来的进步遗产，认为彻底否定他将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所依赖的理想和目标。

## ‘The Magic of Raina Is Real’

本文介绍了儿童漫画家雷娜·特尔格迈尔（Raina Telgemeier）的巨大成功及其对儿童文学的影响。特尔格迈尔以其自传体漫画小说《微笑》、《姐妹》和《勇气》而闻名，这些作品坦率地描绘了她童年时期的焦虑、家庭问题和身体困境（如牙齿矫正）。文章指出，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数百万年轻读者的共鸣，在于她能够生动、真实地捕捉和表达儿童内心的不安与挣扎，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焦虑症日益普遍的当下。她的成功不仅改变了儿童漫画市场的格局，使得现实主义、情感丰富的漫画小说成为主流，也将“焦虑的孩子”塑造成了一种新的漫画英雄原型。文章回顾了特尔格迈尔的创作历程，从早期的自出版漫画到与Scholastic出版社的合作，以及她的作品如何帮助孩子们感到被理解和不再孤单。尽管她的名气带来了挑战，包括个人隐私和创作方向的困扰，但她依然致力于通过艺术帮助孩子们面对困难，传递“尝试”的力量和连接的重要性，即使过程痛苦，也能找到希望和成长。

## The Rise of Techno-authoritarianism

本文认为，硅谷正在兴起一种危险的政治意识形态，即“威权技术官僚主义”。作者通过马克·扎克伯格早期的轻蔑言论和Facebook的发展历程，以及OpenAI最近的领导层风波，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对技术进步的盲目信仰、对传统民主制度的蔑视、追求规模和利润高于公共利益和安全、以及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精英主义。文章指出，尽管硅谷精英常以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自居，但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反民主和非自由主义的，他们通过构建和控制重塑社会的数字系统，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大众，却逃避责任。作者将这种思潮与历史上的未来主义和技术官僚运动联系起来，指出其潜在的危险性。文章呼吁警惕这种日益增长的威权技术官僚主义，认为仅靠监管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大学等机构重新承担起为人类福祉发展技术的责任，个人也应更加审慎地使用技术，捍卫个人权利和尊严，拒绝被异化为数据点，共同塑造一个更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未来，而不是任由技术精英设计我们的生活。

## Lost Photographs of Black America

本文介绍了南非摄影师欧内斯特·科尔（Ernest Cole）失而复得的关于美国黑人生活的珍贵照片。科尔因记录南非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而闻名，后流亡美国。2017年，在他去世多年后，一批他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在美国拍摄的数万张底片在瑞典一家银行金库中被发现，其中大部分此前从未发表。这些照片集结成书《真实的美国》，为我们提供了审视那个时代美国黑人生活的新视角。与科尔记录南非压迫的作品不同，这些美国照片展现了黑人社区的欢乐、日常生活、文化活动和政治抗争，捕捉了人们微笑、跳舞、做礼拜的场景，以及跨种族关系和黑人媒体的细节。科尔曾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旨在记录美国城市贫民区和农村种植园的状况，但他不愿被局限于描绘压迫。这些照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记录历史，展现了在种族隔离和制度性歧视背景下，黑人个体和社区的韧性与梦想。文章强调，这些照片的重见天日恰逢美国历史记忆受到挑战、右翼势力抬头之际，它们提醒着各种形式的国家压迫之间的关联，以及现在与过去密不可分的关系。

## The James Bond Trap

本文探讨了作家伊恩·弗莱明与他笔下最著名的角色詹姆斯·邦德之间复杂而纠缠的关系。文章以弗莱明年轻时焚烧自己诗集的轶事开篇，暗示了邦德这一角色可能源于弗莱明内心某种压抑或冲突。弗莱明出身显赫，经历丰富，曾在海军情报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拥有远超一般间谍小说作家的世界经验。然而，他在中年即将结婚之际创作了邦德，这个角色既是冷酷的机器，又是精致的享乐主义者，充满了矛盾性，反映了弗莱明自身的某些特质和焦虑。文章认为，邦德系列小说的成功让弗莱明声名鹊起，甚至让他得以重返权力中心（如肯尼迪总统曾向他咨询古巴问题），但邦德也成为了弗莱明的“陷阱”。弗莱明后期对邦德感到厌倦，试图杀死他，但邦德的生命力远超作者。文章暗示，邦德的巨大成功和形象可能反过来消耗了弗莱明，他最终在56岁早逝，仿佛被自己的创作所吞噬。评论家甚至警告弗莱明的传记作者不要被邦德的“鬼魂”所毁，就像弗莱明被他的创造物所毁一样，将邦德比作“魔鬼”。

## A Big-Box-Store Allegory

本文评论了阿黛尔·沃尔德曼（Adelle Waldman）的新小说《需要帮助》（Help Wanted），该书以一家虚构的大型连锁超市仓库为背景，被视为对当代美国工作阶层困境的寓言。小说通过仓库里十几位员工的视角，细致描绘了他们在低薪、不稳定的兼职工作中的日常生活和挣扎。文章指出，沃尔德曼巧妙地利用这个衰败的大卖场象征着美国经济的空心化，曾经提供稳定工作的工厂外迁，留下了缺乏机会的城镇和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的居民。小说展现了企业为了削减成本而将员工降为兼职、剥夺福利的残酷现实，以及员工们在微薄收入下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面临的困境。尽管环境压抑，小说也捕捉到了员工之间偶尔出现的团结和友谊。文章赞扬了沃尔德曼对人物心理和工作细节的敏锐洞察，她通过多个人物的内心独白，展现了他们在困境中寻求控制感和尊严的努力。与她之前讽刺布鲁克林文学圈的小说不同，《需要帮助》将视角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以一种悲剧性的笔触，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下普通人的无奈与挣扎，以及他们为了一线希望而可能做出的道德妥协。

## The Disorienting Beauty of ‘Africa & Byzantium’

本文评述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非洲与拜占庭”展览，认为这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展览，挑战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艺术史叙事。展览汇集了来自非洲和拜占庭帝国（主要是地中海非洲沿岸、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长达1500年的艺术品，旨在呈现一个不受殖民主义框架限制的非洲艺术叙事。文章指出，展览通过展示这些地区在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及之后的艺术交流与创新，揭示了不同文化、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复杂互动，而非简单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展览展出了精美的马赛克、珠宝、纺织品、手稿和圣像，证明了非洲地区在这一时期拥有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文章特别提到了展览如何通过艺术品展现基督教在非洲的早期发展及其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以及埃塞俄比亚艺术在拜占庭影响下形成的独特风格。展览鼓励观众放弃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更开放的视角理解艺术史的多元性和互联性，认识到“伟大”的标准并非只有西方一种。通过展示这些被忽视的艺术遗产，展览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为博物馆如何成为促进跨文化理解的场所提供了新的范例。

## Marilynne Robinson Makes the Book of Genesis New

本文评论了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的新书《阅读创世记》（Reading Genesis），书中她将《圣经》的第一卷视为一部艺术品和现代小说的先驱。作为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小说家和神学家，罗宾逊在书中深入分析了《创世记》的叙事技巧和主题，认为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家庭关系以及他们在世俗世界中与神圣的相遇。文章指出，罗宾逊挑战了将圣经视为纯粹神学文本的观点，强调其文学价值和艺术性，认为这是神圣启示的一部分。她对比了《创世记》与古代近东神话，突显了圣经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类困境的独特性。罗宾逊认为，《创世记》中的人物，如雅各，虽然有缺陷，但被赋予了深刻的心理描绘和尊严，这与她自己小说中对边缘人物的温柔关注相呼应。文章强调，罗宾逊通过解读《创世记》，模糊了神圣与世俗、形而上与物理世界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一种“神在其中”的现实观，这既是她的神学思想核心，也是她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最终，文章认为罗宾逊的解读展现了圣经的深刻复杂性和持久魅力，以及它如何启发了伟大的文学作品。

# The Atlantic (2024-04-02)

## The Cystic-Fibrosis Breakthrough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文章探讨了名为Trikafta的突破性药物如何彻底改变了囊性纤维化（CF）患者的预期寿命。该疾病曾被认为是绝症，但Trikafta修正了导致CF的蛋白质缺陷，使患者能够有效清除肺部粘液，肺功能大幅改善。曾经预期只能活到成年早期的患者，现在有望活到80多岁，开始了意想不到的“第二人生”。文章通过CF患者珍妮·利文斯顿的故事生动描绘了药物带来的身体和情感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如重新规划人生、面对过去的朋友的逝去，以及药物可能的精神副作用。同时，文章也指出Trikafta并非万能，仍有部分患者因特定基因突变或副作用无法受益，并探讨了药物的高昂价格和全球可及性问题。药物的成功改变了医学界对该疾病的理解和治疗方式，但也引发了对适应新生活的心理困境，类似于艾滋病药物突破后出现的“拉撒路综合症”。

## The ‘Secret’ Gospel and a Scandalous New Episode in the Life of Jesus

本文深入调查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默顿·史密斯（Morton Smith）在1958年声称发现的“秘密马可福音”（Secret Mark）及其引发的持续争议。这份手稿文本似乎描绘了耶稣与一位被他复活的青年之间带有情色意味的夜间相处，挑战了正统基督教关于耶稣禁欲的观点。史密斯认为这是福音书的早期、更真实的版本，甚至暗示了耶稣使用同性性行为作为神圣结合的方式。尽管一些学者接受手稿的真实性，但其解释多数被批荒谬。史密斯的同事昆汀·奎斯内尔（Quentin Quesnell）则怀疑手稿是史密斯本人伪造的，目的是讽刺神学研究领域的盲点。文章通过史密斯被销毁的个人文件和保留的专业记录，揭示了他作为一名曾投身英格兰教会并与男同性恋社群有复杂联系的牧师的经历，暗示了他可能因个人背景和对教会的幻灭而有伪造福音书的动机。德州学者布伦特·兰道（Brent Landau）和杰弗里·史密斯（Geoffrey Smith）提出的新理论认为，这份文本可能是萨巴斯修道院（Mar Saba monastery）的僧侣在内部辩论男性神圣结合问题时伪造的，以证明耶稣本人曾做出此类示范，但文中也指出该理论证据不足。遗失的手稿、史密斯的自杀及对个人文件的销毁，都为真相蒙上了迷雾，但史密斯的人生经历与他对“秘密马可福音”的解读之间的平行之处引人深思。

## Saint Dismas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群青少年在危地马拉山区公路边冒充建筑工或检查站进行抢劫的经历。故事背景设定在主角哈拉米略（Jaramillo）、奥马尔（Omar）、卡利托（Carlito）和塞巴斯蒂安（Sebastián）所在的村庄被暴力黑帮占据后，他们被迫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为了生存，他们采取了这种危险的方式。一天，他们试图拦下一辆车时，意外遇到了童年朋友莱斯利（Leslie）和她的父亲。莱斯利一家也因同样的原因逃离了村庄，生活同样不易。莱斯利提出加入他们的抢劫，并用假装被撞的方法帮助他们成功抢劫了一辆车，当天盈利远超以往。然而，莱斯利的加入加剧了兄弟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对于奥马尔而言，他难以信任没有血缘关系的外部人员。夜深时，莱斯利私自带走了抢劫所得的大部分钱财，只留下了一部分给他们，解释说她和父亲也需要这笔钱。这再次打击了这群孩子，揭示了在绝境中人与人之间复杂的道德和生存选择。故事以他们在旅途中的行走和反思结束，对比了莱斯利的“背叛”与他们自己的抢劫行为，以及对家园和过去生活的怀念，也对生存的意义和道德的模糊性提出了疑问。

## What Would It Take to Convince Americans That the Economy Is Fine?

文章探讨了尽管美国经济在多项客观指标（如低失业率、GDP增长、工资上涨）上表现强劲，但公众消费者情绪却长期低迷的“经济脱节”现象。作者指出，这种脱节部分源于人们感知通胀的方式与经济学家不同。公众更关注日常必需品（如食品、汽油）的价格上涨，即使总体通胀率下降，这些商品的持续高价也会影响情绪。自2022年6月通胀达到顶峰以来，虽然通胀率已大幅下降，但价格本身仍然远高于疫情前水平，而人们比起通胀率更关心实际价格。另一方面，文章认为党派认同和媒体叙事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的经济情绪往往极度负面，且受右翼媒体影响较大。而进步派民主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负面看法可能限制了他们对当前经济成就的认可。主流媒体在报道经济时也倾向于关注问题而非成就，可能加剧了普遍的悲观情绪。文章总结，消费者情绪能否在未来几个月回升并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取决于公众是更受价格高企的挥之不去的影响，还是受党派偏见和深层系统性悲观主义的限制。

## America’s Last Morse-Code Station

文章介绍了位于加州雷耶斯角国家海岸的KPH海岸电台，它是北美仅存的一个仍在运行的摩尔斯电码海岸电台。尽管海上摩尔斯电码于1999年被卫星通信取代，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一群自称“无线电松鼠”的爱好者们让KPH重获新生。这群志愿者每周六都会操作这些老旧设备，发送海事新闻、天气预报，并接收可能发来的电报。文章通过摄影师安·赫尔墨斯（Ann Hermes）的视角，描绘了电台的工作场景和志愿者的热情。他们使用“bug”等老式设备发送电码，修理二战时期的机器，甚至享用印有老RCA标志的餐盘早餐，以纪念辉煌的过去。文章指出，虽然摩尔斯电码已非主流，但在特殊场景下仍有应用价值，这群志愿者致力于传承这项技术和文化。电台的许多成员已近退休，但也有年轻一代（如文中提到的17岁少年）加入，显示出摩尔斯电码的独特魅力依然吸引着新血。这个电台不仅是一个技术遗存，更是历史、热情和社区的象征。

## Arthur Miller Explains Death of a Salesman

文章展示并分析了一封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49年写给大学生的信，信中他详细阐述了其最著名剧作《推销员之死》的创作形式和悲剧理论。这封新发现的信件提供了对这位戏剧巨匠思想的洞见。米勒在信中解释道，他的创作形式受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特别是莎士比亚）的启发，强调通过语言构建场景，允许“独白”以追随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这与他认为过于受限的“现实主义”戏剧形式不同。他认为真正的悲剧性并非仅限于社会地位高的人物，而是源于个体（无论阶层）对自己抱持的观念被外界力量摧毁，这在民主社会中尤其普遍。米勒的核心思想是，现代社会的悲剧在于人们被鼓励追逐物质积累和投机，而非创造和奉献，导致内在的空虚和隔绝。他认为悲剧人物是那些即便面对死亡，仍坚持人性与爱可以战胜邪恶压制的人。这封长信不仅解释了《推销员之死》的深层意义，也反映了米勒对社会价值和人类困境的深刻批判与理想追求，体现了悲剧的永恒主题如何在现代背景下呈现。

## A Bloody Retelling of Huckleberry Finn

文章评论了珀西瓦尔·埃弗里特（Percival Everett）的小说《詹姆斯》（James），该书以赫克尔贝利·费恩的奴隶同伴吉姆（Jim）的视角重述马克·吐温的经典故事。作者认为，《詹姆斯》不是一个简单的改写，而是一个“文化谋杀”，旨在解构甚至杀死美国小说和电影中常见的“神奇黑人”（Magical Negro）刻板印象——那个善良、乐于助人、牺牲自我以启迪白人主角的黑人角色。埃弗里特的詹姆斯是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秘密阅读）、有策略、充满压抑的愤怒和痛苦的角色，他被迫在白人面前扮演无知木讷的形象以求生存。小说中的吉姆不像吐温笔下的人物那样逆来顺受，他的苦难和愤怒最终转化为一种可怕的、为尊严而战的行动，颠覆了“压迫净化灵魂”的观念。文章特别提到了詹姆斯与一位沉浸在被奴役角色中的锅炉工的相遇，以及詹姆斯在马戏团中被迫进行种族表演的情节，这些都突出了埃弗里特对种族表演性和身份构建的持续关注，以及他对白人文化如何塑造和限制黑人身份的批判。小说最终走向一个暴力高潮，詹姆斯成为“死亡天使”，这与吐温原著中吉姆被宽恕并获得自由的温馨结局形成鲜明对比，强调了自由并非通过牺牲获得，而是通过打破枷锁、甚至以暴力方式争取的。这是一种对传统的“神奇黑人”形象及相关道德观的彻底反叛。

## Is Kara Swisher Tearing Down Tech Billionaires—Or Burnishing Their Legends?

文章探讨了科技记者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与科技界亿万富翁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她作为“最人脉广的强硬记者”和“最强硬的圈内人”所面临的平衡挑战。文章以她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从友好到公开敌对的转变为例，说明了她独特的新闻报道风格。斯威舍以大胆直接的提问著称，与科技圈巨头建立起一种互利关系：他们提供采访机会，她则挑战他们的同时，也无意中增加了他们的曝光度和传奇色彩，同时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这种共生关系在她共同创办的“D: All Things Digital”会议中达到顶峰。然而，随着一些科技领袖行为越发“成人巨婴化”，以及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斯威舍也开始表达幻灭，尤其是与马斯克关系的破裂，她将其归因为马斯克自身的行为。文章还从斯威舍的个人经历（渴望参军但因性取向受阻、与父亲和继父的关系）寻找她性格形成的根源。文章也批评斯威舍有时过于相信科技的进步叙事，像她对NFT的看法，这显示了她与她所报道的科技界一样，有时也可能对新事物过于“过于乐观”，从而模糊了监督者与煽动者之间的界限。

## Do Animals Have Fun?

文章探讨了动物玩耍（play）这一行为及其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的挑战。作者指出，人类倾向于将自身对玩耍的理解投射到动物身上，但也常常忽视或否定动物拥有类似人类“内心生活”或情感的能力。传统的动物行为学倾向于寻找动物玩耍行为的进化功能和适应性优势，例如促进体能、学习社交技能、缓解压力等。然而，许多动物行为（如虎鲸撞船、小猪翻筋斗、海豹幼崽在危险水域玩耍、乌鸦滑雪）似乎没有明显的实用目的，这让寻求功利解释的研究者感到困惑。作者引用大卫·图米的著作《玩耍的王国》（Kingdom of Play），提出这些看似“无功能”的行为或许 simply 是动物对新奇、兴奋和感觉的“渴望”（即为了“好玩”）。文章认为，如果研究者始终将玩耍归结为某种实用功能，无异于将动物视为没有主观体验的“自动机”。接受动物仅仅为了玩耍而玩耍的可能性，意味着承认动物拥有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的认知和情感世界，挑战了人类对动物的传统看法，并引发了对如何对待它们的道德反思。尽管动物玩耍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且人类难以完全理解动物的内在体验，但作者暗示，承认动物享受玩耍本身，便是认识动物复杂性并与之建立连接的重要一步，正如看到猩猩对杯球游戏的意外结局表现出明显的快乐一样。

## The Commons: Stop Trying to Understand Trump Voters as if They Are Aliens

“公共领域”栏目汇集了读者对《大西洋月刊》此前关于“如果特朗普赢得大选”专题的反馈。主要讨论点集中在：有读者认为应同样关注拜登连任的影响；多位读者强调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特朗普个人，更在于整个共和党及其自里根时代以来对政府和现有秩序的挑战；贫困研究专家指出专题忽视了特朗普政府对社会保障网络和贫困人口的系统性损害，并警告其潜在的进一步行动。其中一篇评论（摘自行文风格和观点判断应是马克·莱博维奇文章的回应）指出，媒体不应将特朗普选民视为“外星人”，而应理解他们对现有系统不满的根源，例如工资增长停滞等经济问题。另一位读者则通过自身与支持特朗普的家人的断裂经历，力陈试图用事实说服或“理解”他们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观点根植于党派信息源（如福克斯新闻和链式邮件）和群体心理，事实和理性已失效。这位读者认为，媒体的焦点应从“理解”转向揭示问题本质和呼吁警惕。文章也包含了对封面设计的说明，其风格致敬了意第绪语戏剧海报，并列出了登上封面的犹太裔美国文化和政治偶像，象征着“美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面临的挑战，尽管这部分与读者来信主题关联不大，被包含在同一栏目下。

## Tomato & Lettuce

这首诗通过“番茄和生菜”这一厨房中的常见配角意象，探讨了女性的劳动、家庭角色以及母女关系。开篇将过去的家庭生活描绘为一种“装饰”（garnish），妻子负责琐碎的家务，比如整理床铺、熨烫衣物、隐藏秘密，这些劳动如同洗涤、除垢一样日常而重复。诗人暗示，熨烫、瓷砖、浆糊，甚至婚姻和“家庭主妇”（ama de casa）这样的概念，或许都是男性为女性创造的负担和角色，让她们如同切菜的“装饰”一样被边缘化。诗歌随后转向母女关系的比喻——树与枝干。母亲的形象并未直接被描绘为悲伤，但诗人意识到，将记忆局限于母亲的笑声而非悲伤，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表明了母亲生活中隐藏的辛劳和不易。出生被比作“明亮的裂缝”，进入到一个既被要求扮演特定“装饰”角色，又无法忘记自身本质（如刚经历寒冬的树会记住春天发叶）的世界。诗歌通过日常意象如切菜、洗衣、尘土，深沉地反思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束缚、未被言说的母辈经验以及个体在家庭结构中的位置和自我认同。

# The Atlantic (2024-05-02)

## Clash of the Patriarchs

文章探讨了东正教会内由俄罗斯牧首基里尔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巴多罗买之间的冲突。核心矛盾是基里尔支持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并试图维持对乌克兰教会的控制，而巴多罗买承认了乌克兰教会的独立。文章描述了两位牧首会面的紧张气氛，基里尔代表普京政府将教会作为政治工具，推广“俄罗斯世界”意识形态，并对乌克兰政治类进行人身攻击。巴多罗买则寻求教会现代化并倡导普世价值。文章指出，这场教义之争不仅导致了两大东正教派的分裂，也与俄乌战争紧密相连，俄罗斯积极在世界范围内（包括阿索斯山、非洲、美国）通过资金和政治手段扩张其教会影响力，吸引保守派和俄国支持者。乌克兰教会的独立是俄罗斯的重大打击，但俄罗斯仍试图利用其教会作为地缘政治和宣传的工具。文章暗示这场冲突反映了东正教传统中教会与国家联系的固有问题，以及面对现代世界的不同路径选择，其影响深远，甚至可能触及东正教的未来。即便乌克兰战争结束，教会分裂的伤痕也将持续存在。

## The Homepage of the Black Internet

文章回顾了创建于1999年的BlackPlanet.com网站的历史及其文化影响。在Facebook、MySpace等社交媒体巨头出现之前，BlackPlanet是首批面向黑人社区的社交平台之一，为非裔美国用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上交流、表达自我和建立社区的空间。它允许用户创建高度定制化的个人主页（甚至无意中教授了基础编程技能），参与各类话题讨论，并提供了早期的在线约会功能。文章强调，BlackPlanet在数字鸿沟论盛行的时期取得巨大成功，证明了黑人群体拥抱技术的需求，尽管难以获得主流投资和广告支持。尽管BlackPlanet在后来的社交媒体竞争中逐渐衰落，但它奠定了黑人线上社区的基础，塑造了部分社交媒体文化（如 Black Twitter 的前身）。作者通过用户回忆，展现了网站在促进真实社区连接、提供安全空间（免受“白人注视”）方面的独特价值。文章最后反思，在如今充斥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的巨型社交平台时代，重温BlackPlanet的故事，或许能启发我们思考构建更友好、更注重连接而非冲突的社交网络的可能性。

## The Man Who Died for the Liberal Arts

文章讲述了作者的伯父菲利普·施利布曼（Philip Shribman）的故事。菲利普是达特茅斯学院liberal arts专业的毕业生，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作为海军少尉服役。在牺牲前夕，他写信给弟弟（即作者的父亲）及教授，强调liberal arts教育的价值，认为它培养了广阔的视野、对他人的欣赏能力以及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感受力，认为这些正是为之而战的理想。他相信战争不仅是武力对抗，更是为了捍卫这些“珍贵、稀有、重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学术理想。作者通过家族信件、菲利普同学和战友的回忆，追溯了菲利普短暂的一生，他在校期间的学习经历（包括关于美国反犹主义的荣誉论文）以及他所处的美国卷入二战前夕的时代背景。达特茅斯学院在战时调整了课程，但努力平衡战备需求与liberal arts的传承，这正是菲利普所珍视和捍卫的。文章将菲利普及许多为二战牺牲的年轻人视为“为自由主义价值观而死”的象征，并指出其对作者本人及其家庭的深远影响。通过菲利普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他的精神遗产得以延续，支持着新一代学生接受liberal arts教育。在自由主义教育和美国民主面临挑战的今天，菲利普的故事更具现实意义，提醒人们珍惜和捍卫那些习以为常、看似“不值一提”的自由和价值观。

## Miranda’s Last Gift

这是一篇由作家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撰写的感人至深的个人记述，关于他突然去世的女儿米兰达以及她留下的爱犬林戈。文章详细描述了米兰达与她的查理王小猎犬林戈之间特殊的感情。林戈是一只充满活力、特立独行的狗，与同品种温顺的狗不同。尽管弗鲁姆最初对林戈有些头疼，但在米兰达与抑郁症和随后的脑瘤抗争期间，林戈成为了她忠实的伴侣和重要的情感支持。文章描绘了林戈在米兰达住院手术期间表现出的非凡的平静和依恋，以及它在她去世后对家人的陪伴，尤其是在弗鲁姆处理丧女之痛的艰难时刻提供慰藉。米兰达在去世前最后时刻，林戈始终伴随在她身边。她去世后，林戈似乎将依恋转移到了她的父母身上。弗鲁姆坦诚面对失去孩子的巨大悲痛，分享了深夜失眠时对女儿的思念和自责。林戈成为他排遣这种悲痛、感受与女儿联系的独特存在。文章借由这只狗，探讨了亲情、失去、悲伤以及在至暗时刻寻找慰藉和延续爱的方式，林戈成为了米兰达留给父亲的“最后一个礼物”——一个活生生的、需要照顾和给予情感的对象，帮助他面对那份无法弥补的空缺，成为女儿眼中的“二号助理”，继续与这只特殊的狗共度余生。

## Our Last Great Adventure

文章是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对其已故丈夫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的回忆录节选。理查德·古德温是肯尼迪、约翰逊和罗伯特·F·肯尼迪等总统的著名演讲撰稿人及顾问，参与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关键历史时刻。年逾80的理查德决定与妻子一起整理他积累了40年的300箱历史档案（包括白宫备忘录、演讲初稿等），这项工作成为了他们“最后一场伟大的冒险”。通过梳理这些档案，文章重现了几个重要的历史片段：约翰·F·肯尼迪竞选时发表演讲，即兴提出“和平队”构想的时刻；多丽丝和理查德分别参与了尽管当时互不相识但都感受到历史力量的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以及理查德在仅有9小时内为林登·B·约翰逊撰写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克服》（We Shall Overcome）投票权法案演讲的过程，他如何捕捉约翰逊的南部口音、经历和情感，将其转化为载入史册的文字，该演讲激发了马丁·路德·金的泪水。文章穿插了作者对理查德个性的描绘和他们共同生活的细节，展现了这对历史学夫妇如何通过回顾档案来连接个人生命与国家历史，寻回年轻时的希望与理想。这项整理工作在理查德生命的最后几年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在面对疾病和死亡时赋予他目标。文章深情地表达了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历史，也承载着他们共同的记忆和未完成的爱情故事，是抵抗时间流逝和死亡的“护身符”，只要他们仍在学习、追溯历史，就意味着生命和爱情的延续。

## A Study in Senate Cowardice

文章严厉批评了投票支持弹劾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因1月6日国会山事件）定罪无效的共和党参议员，特别是罗布·波特曼（Rob Portman）。作者认为，这些参议员的“怯懦”行为，使得特朗普得以逃脱政治惩罚，并最终重回政坛，对美国民主构成严重威胁。文章引用了卡西迪·哈钦森（Cassidy Hutchinson）在1月6日委员会上的证词，揭示了特朗普及其幕僚对暴力的纵容，借此凸显其行为的严重性。作者指出，如波特曼这样备受尊敬但在弹劾案中投反对票的共和党人，尽管曾表示谴责，但其投票行为与他们所谓的原则和对民主的承诺相悖。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如弹劾卸任总统违宪或会引发报复性弹劾，被作者斥为软弱甚至带有悲情色彩。文章将这些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与投赞成票的7位共和党人（如米特·罗姆尼）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被赞扬为捍卫宪法和和平权力转移的英雄。作者认为，这些选择“串通”而非“异议”的共和党人，是出于惧怕、追求地位或仅仅随波逐流，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助长了走向威权主义的危险。文章最后建议，如果美国民主能够幸存，为那7位参议员立雕像，而那43位则最好被遗忘，因为他们的行动反映了他们真实的立场。该文章与读者来信一同发表，一些读者在来信中表达了对枪支暴力、警方在此类事件中责任以及枪支制造商豁免权的看法，但文章的主体聚焦于政治怯懦及其后果，尤其是在特朗普时代党派政治如何压倒原则。

## Family Ties

文章介绍了摄影师和视觉艺术家拉托亚·鲁比·弗雷泽（LaToya Ruby Frazier）的摄影系列《家庭观念》（The Notion of Family）。该作品始于弗雷泽的青少年时期，持续了十多年，深入探讨了美国锈带地区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多克（Braddock）因钢铁工业衰落而遭受的经济和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布拉多克失丧了数千就业机会，但钢厂排放物仍污染空气，给当地社区带来双重困境。弗雷泽的作品通过深入、跨代际的亲密肖像，展现了在企业和公共安全网崩溃之下，黑人妇女如何相互关爱、展现韧性。她将自己、母亲和祖母作为拍摄对象，使得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文章指出，这些早期作品展示了弗雷泽通过艺术见证并记录后工业时代景观及其居民的努力。她的作品意在抵抗“历史抹去和历史健忘症”，确保那些在工业衰落中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社区故事得到讲述和铭记。文章借她作品展览的机会，强调了这些肖像作为团结纪念碑的意义，以及艺术家通过镜头展现的家庭内部深厚情感联系和生存智慧，将镜头对准了那些遭受系统性创伤的人们，并记录他们相互支持的力量。文章配图展示了弗雷泽与家人共同创作的肖像以及布拉多克工业景观的照片，直观呈现了主题。

## Is Theo Von the Next Joe Rogan?

文章探讨了播客主持人兼喜剧演员西奥·冯（Theo Von）的崛起及其独特性，并将其与乔·罗根（Joe Rogan）进行比较。西奥·冯的播客《本周末》（This Past Weekend）目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播客之一，与罗根的播客有着相似的受众和非主流氛围。然而，文章认为西奥·冯有着独特的风格：他使用一种缓慢、沉思的路易斯安那州口音，将其南方基督教背景与互戒协会的理念融合，不仅采访名人，也采访普通人（如殡仪师、水管工、卡车司机）。他的播客充满个人化的观察、诗意般的比喻和对成瘾、孤独、信仰等议题的坦诚探讨。尽管西奥·冯偶尔表现出保守甚至倾向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并因此受到批评，但文章认为他的幽默基础是“灾难性的”，他能与听众建立深厚的情感连接，常给予真诚的建议和陪伴感，使得他在罗根的算法世界中显得与众不同。文章指出，西奥·冯能够让人们对他敞开心扉。作者经历了从对西奥·冯的单口喜剧感到冷漠到逐渐欣赏 его уникальному стилю и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оздавать ощущение братства. 文章结尾表示，西奥·冯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他可能沦为右翼集会的宣传工具而失去幽默感，也可能凭借其独特才能和庞大听众群，将社交播客带向一个意想不到的新方向。

## Christine Blasey Ford Testifies Again

文章评述了克里斯汀·布拉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的回忆录《归途》（One Way Back）。该书重新梳理了她决定出面指控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性侵、参议院听证会的过程以及随后的生活。作者认为，这本书是福特在卡瓦诺被确认大法官后，试图重新掌控叙事、填补空白并纠正公众印象的尝试。文章强调了福特的叙事视角：作为一位科学家，她以提供“证据”的心态参与政治进程，原本期待公正的回应，但现实却是一个充斥政治操纵的“枪战”。听证会上，福特的数据和清晰叙述对比卡瓦诺的情感化和政治化叙事，预示了结果。书籍详细记载了听证会后福特及其家庭所遭受的死亡威胁、人身安全担忧、生活动荡与隔离，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恐惧和因此导致的关系紧张。作者将福特的经历形容为一部“现代恐怖故事”，因为它展示了政治如何侵蚀个人生活，以及在缺乏问责和解决的情况下，创伤和不确定性如何持续存在。文章赞赏福特拒绝提供简单的“圆满结局”或治疗性“闭合”，而是坦陈了她在深渊中的挣扎、怀疑和犬儒时刻。尽管福特的困境独特，但其经历的欺骗、背叛感和对希望的挣扎具有普适性。文章认为，《归途》展现了福特面对持续打击时所展现出的韧性，并将其比喻为一位冲浪者在汹涌波涛中努力向岸边划行，即使不确定能否抵达，也必须不断前行。

## What’s So Bad About Asking Where Humans Came From?

文章评论了斯特凡诺斯·格鲁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的著作《史前史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Prehistory），该书认为对人类起源（“史前史”）的研究自启蒙时代以来，主要被用于证明西方优越性、为殖民暴力和帝国主义辩护等邪恶目的。作者批评格鲁拉诺斯的写作风格刻薄、自命不凡，且其论点过于片面和虚无主义，甚至质疑科学真相的存在。作者反驳道，尽管史前史研究确实曾被恶意利用（如将原住民视为“化石人类”以证明其应被取代），但格鲁拉诺斯忽视了书中所提供的许多反例：史前史的概念也常被用于批判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战争，倡导平等和人类普适性（如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恩格斯的“原始共产主义”）。作者认为，现代科学探究人类起源的方式（基于基因和化石证据）与过去基于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假说有本质区别，尽管科学发现可能被记者、作者或政治人物曲解和滥用，但这并非科学研究本身的原罪。作者主张，探究人类起源是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问题，它关乎“我们是谁”，不应因其曾被误用而全盘否定。虽然格鲁拉诺斯偏爱那些自称为“神话”的叙事（如女权主义者关于母系社会起源的猜想），但作者认为他否定了探索真相本身的价值。文章末尾肯定了人性的复杂性，尽管认识到其“发明”的性质，但相比格鲁拉诺斯的虚无，作者宁愿相信人道主义和人性中美好的部分。

## What Orwell Really Feared

文章探讨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侏罗岛（Isle of Jura）创作《1984》期间的生活，认为他的逃离不仅是寻求宁静写作环境，更是他对战后世界及个人命运深层恐惧的投射。奥威尔因妻子去世、原子弹问世及对斯大林体制的警觉而充满焦虑，他搬到偏僻荒凉的侏罗岛，过着简朴自足的生活，这既是对现代性的抵抗，也可能象征着一种自我放逐。文章认为，《1984》不仅仅是对集权主义的政治寓言，更深刻地反映了奥威尔对个人自主性被侵蚀、内心世界被剥夺的恐惧。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对孤独的珍视、对不被触及的内心空间的捍卫，反映了奥威尔本人的个性——他是一位特立独行、难以捉摸的人，他在寄宿学校经历的不愉快童年也让他形成了对“不可腐蚀的内在自我”的坚持。作者认为，《1984》与其说是传统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反向自传或对“自主个体”消亡的描绘，小说中对私密空间、感官渴望及记忆残片的描写，是温斯顿在极权压迫下仅存的“人性”挣扎。文章驳斥了将《1984》仅仅视为反斯大林主义文本或能提供安心的读物的解读，强调其核心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权力集中、公共语言的重要性，但最重要的是要抵御外部力量对个人内心和孤独的侵犯。奥威尔笔下温斯顿最终自主意识被摧毁的结局，体现了他对无法保有孤独、失去自我界限的深切恐怖。文章结论：奥威尔最大的恐惧，并在《1984》中淋漓尽致地展现的，是个人孤独感的丧失以及自主个体的消亡。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作这部小说本身也是他抵抗这种恐惧的一种方式。

# The Atlantic (2024-06-02)

## Ozempic or Bust

本文深入探讨了美国长达四十载对抗肥胖流行的尝试及其屡屡未达预期的“解决方案”，并将焦点集中于以奥zempi克（Ozempic）为代表的新一代GLP-1药物。文章以饱受肥胖困扰的Barb Herrera的个人经历开篇，她尝试过无数种饮食、药物和手术，但体重总是反弹，健康问题缠身，甚至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她的故事反映了数百万美国人与肥胖长期抗争、屡战屡败的困境。文章回顾了美国社会层面为解决肥胖问题所做的努力，如对“致肥胖环境”的批评、推行健康饮食政策（如卡路里标签、学校营养餐改革）以及争取减轻基于体重的歧视，但这些措施的影响有限，未能阻止肥胖率的持续上升。随后，文章详述了上世纪90年代曾被视为“奇迹”的减肥药fen-phen（芬芬）的兴起与衰落，它曾帮助Barb显著减重并改变她对食物的执着，但最终因导致心脏损伤而被叫停，给无数使用者带来身心双重创伤。芬芬的经历揭示了新减肥方案初期成功背后隐藏的未知长期风险。文章接着介绍了当前的焦点——GLP-1受体激动剂，它们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显著减重效果（平均15-20%），给肥胖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希望。对Barb而言，GLP-1药物（如Trulicity和Mounjaro）让她两年内减重超过200磅，重获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改变了她绝望的处境。然而，围绕GLP-1药物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并非对所有人都有效、高昂的价格、有限的保险覆盖以及未知的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影响。文章指出，尽管存在风险，鉴于过去四十年的失败尝试和对肥胖病因的持续困惑，GLP-1药物似乎成为当前唯一的选择。这场新的减肥革命不仅可能通过改变个人生理机制来对抗肥胖，也可能改变社会对体型的态度，尽管关于身体接受度与减肥药物使用之间的社会争论仍在继续。文章最终通过Barb的故事和对专家观点的引用，强调了在经历了多次希望破灭后，美国社会对这些新药物寄予厚望，但历史的教训提醒我们，任何号称奇迹的方案都需要时间来验证其真正的长期效果和安全性。

## The Lynching That Sent My Family North

作者Ko Bragg通过追溯家族历史，探讨了美国黑人家庭如何被系统性的种族暴力——具象化为一次未被记录、直到近年才被发现的私刑事件——“推”入了非裔美国人历史上重要的“大迁徙”。故事始于作者的舅妈，她作为家族史的守护者，偶然发现了1888年作者曾曾祖父的兄弟Bob Broome在密西西比州Edwards镇被白人暴徒私刑处死的新闻剪报。文章详细描述了Bob Broome遇害的经过：在一次与白人的街头冲突后，他被逮捕，随后被暴徒从监狱劫走并吊死。不同媒体（白人报纸与黑人报纸《里士满星球报》）对事件的描述存在巨大差异，白人媒体将Bob描绘成危险的煽动者，而黑人媒体则将他的行为视作在压迫政权下的必要自卫，甚至称他为“烈士”。Bob的遭遇，以及他的兄弟Ike Broome（作者的曾曾祖父）在私刑中幸存（可能由于与白人布鲁姆家族的复杂关系），共同构成了家族历史上的一个至暗时刻。作者反思了这种暴力如何迫使黑人家庭掩埋创伤记忆。Bob的死亡直接促使作者家族开始了从密西西比迁往北方（华盛顿特区，后至新泽西州）的历程。作者的祖母Victoria深受家族故事影响，严厉禁止自己的孩子“跨过梅森-迪克森线”南下，以此作为一种保护手段，希望通过教育和远离南方来确保后代的安全和发展。文章将这种驱使家族北迁的力量描述为一种“推力”，与传统大迁徙研究中强调北方经济机会的“拉力”兼而有之。为了对抗南方持续的暴力威胁，家族世代传承了持枪自卫的观念，作者的曾祖母便以枪法闻名。最终，作者和母亲选择“逆向大迁徙”，回到密西西比，这既是与被切断的家族根源和历史重新连接的尝试，也是一种复杂的回归——回到那个既是家园又充满创伤的地方。作者认为，回到密西西比是为了“扯平”1888年私刑悲剧以及家族迁徙中失去的一切，重新拥有这片土地，哪怕只是重新记起并记录下这段被埋藏百年的历史。Bob Broome的名字现已被记录在亚拉巴马州国家和平正义纪念馆，成为纪念美国黑人私刑受害者的重要象征。文章强调，虽然对完整历史的掌握有限，但这份“部分、不完美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慰藉，比许多对祖先历史一无所知的非裔美国人所拥有的更多，它让家族得以带着这段记忆继续前行。

## The Godfather of American Comedy

本文是关于喜剧演员、编剧、导演兼演员阿尔伯特·布鲁克斯（Albert Brooks）的深刻人物刻画，认为他是美国喜剧界的“教父”，其影响巨大却常被低估。文章通过布鲁克斯的终生好友兼合作者罗布·莱纳（Rob Reiner）的趣闻轶事，展现了他自少年时期便显露的非凡喜剧天赋和独特的视角。布鲁克斯以其音乐性的说话方式和独具一格的喜剧风格闻名，他笔下的角色常带着瞪大的眼睛、皱起的眉头和坦露的心声，但现实中的他则更为严谨、不耐烦且极其专注，对细节近乎偏执。文章强调了布鲁克斯不走寻常路的职业选择，他多次拒绝了如《飞越未来》（Big）、《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等让他有机会成为主流巨星的角色，而是选择亲力亲为，自编自导自演那些更具实验性、更贴近个人视角的影片，如《摩登爱情》（Modern Romance）、《迷失美国》（Lost in America）、《阴阳界》（Defending Your Life）。这种坚持个人艺术愿景胜过商业成功的态度，使他成为许多喜剧人和电影人的偶像。文章将布鲁克斯对死亡、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深入探讨追溯至其童年创伤：11岁时，他的父亲，著名喜剧演员哈利·爱因斯坦（艺名Parkyakarkus）在一次宴会上突发心脏病离世。这一经历使布鲁克斯对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预测性有了深刻认知，并贯穿于他的创作中（如《阴阳界》中角色死后接受审判的情节）。另一件影响他创作的标志性事件是1973年在波士顿的一次表演前的“大脑爆炸”经历，一夜之间他感受到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情绪和不安全感涌现，被迫面对真实的自我，这最终打开了他的思维，使他得以创作出更具深度和复杂性的作品。文章也提及了布鲁克斯与妻子金伯利·施莱恩（Kimberly Shlain）迟来的婚姻，这让曾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的他找到了情感的归宿。尽管他的电影不一定票房大卖，但布鲁克斯通过作品对生命中最深刻的问题进行幽默而独到的哲学式反思，这正是他作为“教父”对美国喜剧和电影的影响所在——他教会人们如何在灾难面前找到幽默的力量。文章最后引述他早期的未采用的《阴阳界》结局，角色最终变成了一头奶牛，这荒诞的设定恰恰体现了他作品中对生命意义和未知未来的戏谑与反思，尽管他本人不相信永恒或后悔过去，只专注于当下和可以改变的事物。

## How Daniel Radcliffe Outran Harry Potter

本文探讨了丹尼尔·雷德克利夫（Daniel Radcliffe）如何成功地从全球超级童星“哈利·波特”转型为备受尊敬的舞台和电影演员，打破了媒体对其未来可能面临堕落或事业夭折的普遍预测。文章回顾了11岁的雷德克利夫被选中出演哈利·波特的初期，媒体即充斥着对其“可怕命运”和职业生涯受限的担忧，而雷德克利夫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并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些预测是错误的。文章提及了他早期的表演经历和导演克里斯·哥伦布（Chris Columbus）看中他身上特有的“萦绕不去的特质”（haunted quality），尽管雷德克利夫自己认为只是因为他“眼睛大”。在《哈利·波特》系列拍摄期间，雷德克利夫在片场得到了像普通孩子一样的待遇，他与剧组成员，特别是他的特技替身大卫·霍尔姆斯（David Holmes）建立了深厚友谊。霍尔姆斯在拍摄中一次意外受伤导致瘫痪，这一事件对雷德克利夫产生了巨大影响，让他直面生命的残酷，并与霍尔姆斯保持着深厚的情感联系，甚至共同制作了纪录片《大卫·霍尔姆斯：活着的男孩》，影片也展现了他们之间充满黑色幽默的深刻对话。文章指出，雷德克利夫在青少年时期曾短暂地靠近了预测的“悲惨童星”结局，开始通过饮酒来应对压力和不安全感，但他最终意识到必须停止，成功戒酒并保持清醒至今已逾十年。他坦诚饮酒状态影响了他在《混血王子》中的表演。在《哈利·波特》系列结束后，雷德克利夫积极转型，有意识地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小成本或独立电影及舞台剧角色，如《恋马狂》（Equus）中需要裸体出演的争议角色、《杀死汝爱》（Kill Your Darlings）中的年轻艾伦·金斯堡，以及后来在《瑞士军刀男》（Swiss Army Man）中饰演一具会放屁的尸体等极具挑战性且“古怪”的角色。这些选择证明了他追求表演广度和深度的决心，而非仅仅依赖“哈利·波特”的光环或追求商业大片。他在《杀死汝爱》导演约翰·克罗基达斯（John Krokidas）那学到了基本的表演技巧，弥补了系列电影中未能深入学习的不足。文章还提及他与女友艾琳·德克（Erin Darke）低调的关系，以及她在帮助他设定界限、应对名声带来的困扰方面的作用。此外，雷德克利夫对J.K.罗琳（J.K. Rowling）关于跨性别者的言论表达了不同意见，并公开支持LGBTQ群体，展现了独立于“哈利·波特”光环的个人立场。文章认为，雷德克利夫的成功在于他利用“哈利·波特”带来的经济自由去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表演，并通过不断尝试多样化的角色，证明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实力和潜力，从而彻底摆脱了这个角色最初带来的束缚和预设的悲观结局。他目前在百老汇主演的音乐剧《拜访星期二》（Merrily We Roll Along）的成功，以及他对汤姆·莱勒（Tom Lehrer）、埃米纳姆（Eminem）等歌手音乐的热爱，也展现了他深藏的音乐天赋和广博的兴趣。他选择的角色往往在“极其古怪、令人不安”与“健康、真诚”之间找到甜蜜点，通过荒诞的故事讲述关于人性的美好之处。最终，他成功地将自己从“哈利·波特”这个影子中解放出来，成为一名真正热爱表演并持续挑战自我的成熟演员。

## Against Sunscreen Absolutism

本文作者Rowan Jacobsen对美国当前提倡的“防晒绝对主义”——即无论何时何地都应避免阳光暴露并涂抹防晒霜的公共健康建议——提出了质疑，认为适度的阳光照射具有被忽视的健康益处。文章以澳大利亚最近更新的，更为 nuanced 的防晒指南为例进行对比。尽管澳大利亚皮肤癌发病率全球最高，其新指南却首次承认“完全避免阳光暴露对健康并非最优”，尤其对于皮肤癌低风险人群。长期以来，人们知道阳光能促进维生素D生成，并曾寄希望于维生素D补充剂能替代阳光的益处。然而，多项大型临床试验（特别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研究）已明确证实，维生素D补充剂并不能有效预防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症在内的多种主要疾病。澳大利亚新指南的出台部分是对这一现实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新的科学研究揭示了阳光影响健康的非维生素D途径。文章提到了“纬度效应”——高纬度地区多种疾病发病率更高，特别是自身免疫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MS）。研究表明，阳光中的紫外线（UV）可以直接影响免疫系统，促进调节性免疫细胞的产生，这些细胞能迁移到全身，抑制炎症。虽然这不利于皮肤癌的免疫监控，但其全身性的抗炎作用可能有助于预防或缓解自身免疫疾病（如MS、1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及其他与慢性炎症相关的疾病（如哮喘、过敏、心血管疾病、阿尔茨海默症）。文章批评美国公共健康机构（如CDC和美国皮肤病学会）仍坚持“一刀切”的严格防晒建议，忽视了这些新的科学证据。这种简化信息的方式，尤其对于皮肤癌风险最低的有色人种来说，可能适得其反，剥夺了他们可能从适度日晒中获得的益处。新的、基于科学的建议应该更为个性化，考虑个体的肤色、风险因素和地理位置。文章呼吁公共健康信息应更诚实地反映科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非过度简化，因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过度简化反而会损害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并可能滋生阴谋论。最终，作者认为，科学的进步需要承认试错和未知，发现适度阳光（一种免费且易得的资源）可能带来的广泛健康益处是一个好消息，不应被严格的、过时的信息所掩盖。

## The One Place in Airports People Actually Want to Be

本文探讨了机场休息室日益增长的人气和奢华程度，并分析了其背后由高端信用卡和大型金融机构推动的竞争格局。文章以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大通银行蓝宝石休息室（Chase Sapphire Lounge）为例，描述了这个空间如何打破机场通常的嘈杂和不快，提供奢华的体验（高端餐饮、特色鸡尾酒、甚至迷你面部护理），吸引着旅客（包括越来越多的休闲旅客和在家办公的旅行者），让他们在候机时感到愉悦。文章指出，与过去主要服务于商务旅客、仅提供基本服务的休息室不同，现代大型休息室正在进行一场“设施军备竞赛”，提供餐厅级别的餐点、全服务酒吧、水疗设施乃至独特的地域特色（如丹佛机场美联航休息室的精酿啤酒吧）。休息室使用的激增主要归因于高端信用卡将休息室使用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旅行福利，吸引了更广泛的高消费人群。对航空公司和信用卡发行方来说，这些高消费旅客极具价值。然而，需求增长导致休息室变得拥挤，这与休息室“专属”和“私密”的宣传产生了矛盾。为解决此问题，各大运营商正加速建设更大更新的休息室。文章深入分析了信用卡公司（如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大通银行Chase、第一资本Capital One）而非航空公司成为休息室市场重要玩家的原因。对信用卡公司而言，休息室并非直接盈利业务，而是吸引和锁定高收入客户的关键手段。这些客户是信用卡公司 interchange fees（刷卡手续费）的主要贡献者。通过提供极致的休息室体验，信用卡公司旨在增强客户的“品牌亲密度”，确保客户在日常及旅行消费中优先使用他们的卡片。文章还提到了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层”，休息室内部设置更高级别的（甚至需邀请才能进入的）专属区域或私人套间来迎合顶层财富人群的需求。这种趋势也扩展到了机场之外，信用卡公司开始在音乐会、体育赛事等高消费场合赞助VIP休息区。而像第一资本咖啡馆（Capital One Cafés）这样的尝试，则是在非机场环境通过提供免费Wi-Fi和咖啡来吸引潜在的未来高价值客户。文章总结，这场机场休息室的竞争反映了银行在无现金支付时代争夺高价值客户的策略，通过提供昂贵且个性化的福利来建立忠诚度，尽管这对普通消费者和小型商家可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但它确实在拥挤不堪的现代航空旅行中为一部分人创造了令人向往的专属空间。

## The Mysteries of Plant ‘Intelligence’

本文探讨了科学界当前关于植物是否拥有“意识”“智能”“记忆”乃至“沟通”能力的争议。文章开篇描写了作者在实验室中目睹一株烟草植株在受到触碰后，全身静脉像霓虹灯一样发光的现象，这种快速传播的荧光信号类似于动物神经系统中的信息传递。这引发了关于植物如何在没有大脑的情况下感知和响应环境的讨论。长期以来，意识和智能被认为是动物特有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动物的行为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现在，一些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主张将这些概念同样应用于植物。文章列举了植物表现出的行为，如对声音敏感、储存信息以备后用以及与其他植物甚至特定动物沟通的能力。如果这些行为在动物身上被视为智能的标志，那么为何不能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植物呢？然而，将类人概念应用于植物的观点充满争议，部分反对者认为这剥夺了植物本身的独特性。文章回顾了这段领域的历史障碍，特别是1973年那本广受欢迎但不科学的《植物的秘密生活》，导致植物行为研究在科学界长期遭遇资金和发表困难。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卫·罗兹（David Rhoades）发现树木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化学信号来防御毛毛虫入侵，才重新打开了研究大门，即便“植物有意图地沟通”仍是争议焦点。文章指出，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定义“沟通”和“智能”，尤其是在缺乏中枢神经系统的情况下如何理解植物的信息处理。文章详细介绍了西蒙·吉尔罗伊（Simon Gilroy）等人的研究，他们观察到植物内部的信号传播速度惊人，可能通过类似于电信号或快速化学信号进行，这与动物神经系统的功能相似，能在整个植物体内协调反应，尽管它没有大脑结构。一些神经科学家甚至认为，这可以被视为趋同进化出的另一种形式的“神经系统”。文章还讨论了植物的“记忆”现象，例如一种秘鲁植物能记住蜜蜂拜访的时间间隔并调整其花瓣姿态，以此来预测下次授粉者何时到来。这种在没有大脑的情况下储存和调用信息的能力，对我们理解记忆机制提出了挑战。支持植物智能概念的科学家认为，植物感知、处理信息、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的表现，符合智能的基本定义，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自动化反应。文章最后承认，对植物“智能”的理解仍处于早期阶段，存在许多未解之谜。但通过研究植物，我们得以反思并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认识到生命在地球上演化出了多种复杂而各异的信息处理方式。

## American Beauty

本文以摄影师Jennifer Emerling的摄影系列“首先看美国！”（See America First!）为引线，探讨了美国国家公园既美丽雄伟又蕴含复杂历史和矛盾的特性。Em erling童年时代就随家人遍游美国国家公园，对这些地方有着深厚的情感，长大后成为专业摄影师，通过“首先看美国！”系列重访了这些地方。她的照片将智能手机、帽子等寻常的游客物品与黄石、大提顿、优胜美地等国家公园壮丽的自然景观并置，捕捉了冒险、童真与怀旧的情绪。但文章指出，摄影系列的标题本身就引人深思：“See America First!”源自20世纪初旨在 promoting 国内铁路旅行的营销口号，强调美国的“未受破坏的创造”。通过历史的 hindsight，这个口号带有了讽刺意味。文章指出，虽然国家公园的自然之美和力量毋庸置疑，但其建立过程却充满矛盾：这些被誉为“未受打扰的创造”的区域，是以牺牲原住民的土地主权为代价的；即使在崇尚自然之美的同时，它们很早就被商业化。文章篇幅较短，主要通过描述Emerling的照片传达其核心观点。这些照片提醒着观众，我们在国家公园中看到的壮丽景色，与美国旅游业的历史、商业开发以及更重要的——对原住民的驱逐和土地的掠夺——密不可分。承认这些矛盾（原住民的被迫迁离、商业化与保护理念的冲突）并非否定国家公园的美丽或其力量，而是为理解美国历史和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增添了更多层次的复杂性。Emerling的照片以一种既有趣又引人思考的方式，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个被深深符号化、充满回忆但也遍布历史印记的美国景观。

## Can a ’90s Cult Classic Save the Comic-Book Movie?

本文认为，1994年的邪典漫改电影《乌鸦》（The Crow）在当前超级英雄电影票房下滑、模式僵化的背景下，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不同路径，展现了漫改类型片探索人性和深刻情感的潜力。文章开篇即描绘了主角Eric Draven从坟墓中痛苦爬出的非典型场景，奠定了影片阴郁、暴力的基调，他并非传统英雄，而是充满伤痕的复仇者。影片上映时，超级英雄电影正经历低潮，《蝙蝠侠归来》试图转型但票房下滑，其他漫改电影也反响平平，市场在寻找新方向。《乌鸦》改编自James O'Barr讲述因未婚妻遇害而化身复仇者的漫画，由布兰登·李（Brandon Lee）主演。文章强调了布兰登·李在影片中的核心地位，他通过憔悴的外貌、芭蕾般的身姿和充满颗粒感的表演，将Draven塑造成一个既令人畏惧又异常脆弱的角色，他被悲伤吞噬，一心只为复仇。布兰登·李在片场的意外离世更为影片增添了一层悲剧色彩。文章赞扬了导演亚历克斯·普罗亚斯（Alex Proyas）运用其音乐视频的经验，营造出影片标志性的阴暗、肮脏、充满动感的哥特式视觉风格，搭配切合氛围的摇滚原声带，这种美学对后来的漫改电影产生了影响。与侧重善恶大战的典型超级英雄电影不同，《乌鸦》的核心是一种“令人心碎的人类苦难的唤醒”，Draven的复仇之路血腥而残酷，最终并未能真正修复失去的一切，片尾他回到了坟墓，暗示着悲伤和失去的不可逆性。文章认为，《乌鸦》超越了简单的类型片框架，它是一次形式的重塑，证明了这种类型影片可以成为探讨人性复杂和情感困境的载体，而非仅仅是视觉特效和俏皮对话的堆砌。尽管《乌鸦》催生了几部反响平平的续集，说明原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布兰登·李的表演。文章最后提及即将上映的由比尔·斯卡斯加德（Bill Skarsgård）主演的翻拍版，并引用了布兰登·李当年关于扮演Draven的说法——“关于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将如何表现，没有规则可循”——以此强调了《乌鸦》的颠覆性及其持久吸引力。在当前漫改电影市场疲软之际，《乌鸦》提醒我们，这一类型片仍有潜力容纳深刻、黑暗且不拘常规的叙事，通过探索痛苦、复仇等强烈情感来触动观众，这或许是拯救其当下困境的一剂良药。

## The Wild Blood Dynasty

本文是一篇书评，探讨了约翰·卡格（John Kaag）的新书《美国血脉：塑造一个国家的未驯化王朝》（American Bloods: The Untamed Dynasty That Shaped a Nation）。卡格，一位哲学教授，以自己居住的、由布鲁姆（Blood）家族早期成员建造的老屋为起点，通过追溯这个虽不如其他显赫家族但贯穿美国历史的庞大家族史，来考察贯穿美国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概念——“野性”（wildness）。卡格的书将哲学思考与个人叙事结合，认为布鲁姆家族世世代代展露出一种独特的“边疆精神”或“未驯化精神”，这种精神既推动了美国扩张，也是美国社会秩序表面下流淌的潜在混沌和冒险基因。文章介绍了卡格书中着重描写的几位布鲁姆家族成员：企图盗窃英国王室珠宝的托马斯·布鲁姆（象征无拘无束）；美国支系的建立者罗伯特·布鲁姆（体现早期殖民者在法律边缘游走又懂得合作的矛盾）；与爱默生有过交往并启发其超越主义思想的萨迪厄斯·布鲁姆（象征思想的叛逆）；隐居的萨迪厄斯之子佩雷斯·布鲁姆（与梭罗的“野性即自由”联系起来）以及参与西进运动和流血堪萨斯事件的詹姆斯·克林顿·布鲁姆（代表边疆开拓与暴力同在），还有通过婚姻加入布鲁姆家族、代表了南北战争后时代极端与反叛的妇女权利倡导者维多利亚·伍德赫尔。评论指出，卡格试图通过这些人物证明布鲁姆 가족 是美国历史进程中一股“动画力量”，但其叙事结构更像一系列肖像而非连贯历史，且有时将个人经历过度拔高以贴合“野性”主题，未能充分处理如驱逐原住民、奴隶制等更黑暗的“野性”面向。评论特别讨论了本杰明·布鲁姆，这位受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推崇的诗人-哲学家，他提倡一种强调现实不完善、偶然性和混乱性的开放性哲学，反对僵化的体系。本杰明的思想被卡格视为布鲁姆 가족 “野性”精神的哲学升华，认为它鼓励积极参与生活、接受不确定性。尽管评论认为卡格试图将这种哲学强加于整个 가족 史的努力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但书中对美国 identity 中未驯化、矛盾和未完成性质的探讨，以及通过个体生命折射宏大历史的尝试，仍具有独特的价值。最终，文章总结卡格通过布鲁姆家族史，揭示了“野性”作为美国精神的持续存在——它既有危险、corrupt 的一面，也包含探索、创新和通向更美好（尽管永远不完美）未来的可能性。

## The Female-Midlife-Crisis Novel

这篇书评聚焦于米兰达·朱莱（Miranda July）的新小说《四肢着地》（All Fours），探讨了她如何以其独特的古怪风格，呈现一场中年女性的危机、艺术身份的挣扎与性觉醒。文章从“weird”（古怪）一词的词源（意为“命运”）切入，认为朱莱的作品，包括《四肢着地》，常在字面上展现“怪异”，但同时也触及更深层的命运和存在的荒谬。小说主角是一位“半有名”的艺术家，她对稳定的婚姻和停滞的创作感到不满，决定开启一场跨国自驾之旅，试图证明自己能适应平淡生活，但旅程随即脱轨。她被一位年轻的赫兹租车店员吸引，并未按原计划前往东海岸，而是在附近租下一间破旧汽车旅馆的房间，并以高价委托店员的室内设计师妻子将房间装成巴黎丽兹酒店的风格。评论指出，小说在呈现主角行为动机上的模糊性——这究竟是艺术项目、跟踪行为、中年危机，抑或是某种意义上的命运驱使？——虽有时令人困惑，但也构成了其引人入胜之处。文章将主角的怪异行为与朱莱作品中常见的元素相联系：疏离感、随机性、性与古怪的融合，以及在轻描淡写和荒谬 earnest 之间的风格切换。主角试图将自己的离谱行为合理化为一种女性主义的艺术反叛，对抗压制女性创造力的“居所天使”，但评论认为朱莱也以微妙的嘲讽呈现这种自我辩护。更为重要的是，文章指出小说的核心在于呈现主角的更年期过渡（围绝经期），生理上的荷尔蒙波动为她“怪异”的行为提供了物质层面的 plausibility。身体的变化和衰老焦虑引发了一场迟来的性觉醒，特别是与一位年长女性的经历，这种体验既超越又令人厌弃，但也带来了一种对自身更多的理解和接纳。主角意识到自己从未是一个整合、真实的个体，总是在不同场合呈现不同的“自我”，逃避被单一理解。围绝经期让她被迫面对衰老，但也赋予了一种“怪人姊妹”（weird sister）式的自由，更愿意拥抱自身的“怪异”和不确定性。评论认为，朱莱成功地将通常被视为小众、感性的中年危机叙事，通过其独特的风格转化为一种荒诞而深刻的探索，探讨了在身体变化、社会期待和对真实自我的追求之间产生的冲突与可能性。尽管小说后半部分略显力度不足，但朱莱对女性身体经验的诚实呈现，尽管不一定提供了最终答案，但其独特、滑稽而有力的表达，构成了对伍尔夫提出的“讲述女性身体经验真相”这一挑战的杰出回应。

## Hypochondria Never Dies

本文探讨了“疑病症”（Hypochondria）这一概念的演变、它在现代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5）中被移除的背景，以及在信息爆炸时代，健康焦虑如何持续存在并以新的形式显现。文章以作者本人在儿子脖子上发现肿块后，经历了一轮焦虑的网上自我诊断为例，说明了通过互联网获取医疗信息所催生的“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已成为普遍现象。讽刺的是，尽管健康焦虑如此普遍，疑病症（hypochondriasis）这个词在2013年发布的DSM-5中却被正式移除。移除的理由是为了减少污名化，并将其分解为两个新的诊断类别：“疾病焦虑障碍”（illness anxiety disorder，指对健康过度担忧但无明显身体症状）和“躯体症状障碍”（somatic symptom disorder，指不成比例地过于关注伴随的身体症状）。然而，文章引用Caroline Crampton的著作《玻璃做成的身体：疑病症的文化史》（A Body Made of Glass），指出这种新的分类未能清晰界定健康焦虑的复杂本质。文章追溯了“疑病症”这一概念从古至今的演变：从希波克拉底时代指代躯体部位（肋骨下方区域）和体液失衡导致的身体/精神症状，到18世纪被视为神经系统疾病，再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医学诊断技术发展影响，被主要视为因内心冲突或过度关注而产生的心理障碍，患者常被刻板印象化甚至嘲讽。Crampton的个人经历（青少年时期身患癌症康复后产生的过度警惕和焦虑）也说明，健康的担忧与“过度”的病态焦虑之间的界限模糊难辨。文章批评DSM-5的新分类未能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的健康焦虑，可能将慢性疼痛患者或担忧自身已有疾病（如糖尿病、癌症）预后的人群也划入“障碍”范畴，且没有证据表明新标签提高了临床疗效。作者认为，这种强行分类忽视了医学本身的局限性：对于“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医生往往倾向于归结为心理原因（somatization），这使得很多拥有真实症状但疾病尚未被充分理解的患者（如慢阻肺/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难以获得应有的重视和治疗。文章总结，尽管医学不断进步，试图精确诊断和分类，但健康焦虑的本质是对生命固有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的反映。在后疫情时代和“谷歌医生”普及的背景下，曾被称为“疑病症”的健康担忧更加普遍且可以理解。重要的不是贴上新的诊断标签，而应是医生和患者双方都承认医学的局限性，共同 navigating 生命的不确定性。正如唐恩（John Donne）所言，身体状况瞬息万变且充满未知。只有停止道德评判，接受这种不确定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支持遭受健康焦虑困扰的每一个人。

## The 248th Anniversary of America’s Jewish Golden Age

本文是读者对《大西洋月刊》此前一篇由Franklin Foer撰写的题为《黄金时代的终结》文章的反馈集锦，该文认为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威胁着美国犹太人前所未有的安全与繁荣时期。读者的来信呈现了对当前美国反犹现状及犹太人“黄金时代”是否正在终结的不同观点。一些读者（如Monica Friedlander）对此表示担忧，她作为前共产主义罗马尼亚的移民，在美国曾感受到自由与接纳，但现在再次因反犹主义感到恐惧，甚至不敢向他人承认自己的犹太身份，认为当前局势令人警惕，并认同反犹主义与民主衰退的关联。另一些读者（如奥斯威辛幸存者Walter L. Lachman）则认为Franklin Foer的文章有些夸大其词，虽然承认反犹情绪抬头，但强调与纳粹德国时期由国家支持的 Systemic 的迫害有本质区别。还有读者（如Benjamin Levine）指出，即使在Foer笔下的“黄金时代”初期，美国犹太人也一直面临着街头暴力、社会偏见和 Systemic 歧视，认为潜在的偏见根深蒂固，“黄金时代”本身可能就带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一方で也有读者（如Jacob Foster） strongly 反驳文章观点，认为美国的“黄金时代”仍在继续，并且早于20世纪。他列举了美国历史上犹太人的贡献，强调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参与度和被接纳程度远超想象。他 citing 后期对10月7日袭击事件后美国社会 widespread 的支持以及皮尤研究中心关于犹太人在美国是受接受度最高的宗教群体的调查，认为反犹主义虽然存在，但“一直是且持续是不美国的”。最后，另有读者（如R. Toran Ailisheva；Samar Salman & Christina Kappaz）将焦点转向巴以冲突，认为将所有批评以色列行动者等同于反犹主义是错误的，部分美国犹太人正在区分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并呼吁关注 concurrent 增长的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强调需要超越 polarized 的叙事，寻求所有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与正义。这些来信 collectively 展现了美国犹太人群体内部和社会外部对当前形势的复杂、 multi-faceted 的看法。作者Franklin Foer在回应中对自己的预测可能成真表示 saddened，并再次厘清了他笔下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指的是使用古典反犹比喻来攻击犹太人，而非 advocating for a two-state solution 这类理想主义 vision。

## When Nan Goldin Danced in Low-Life Go-Go Bars in Paterson, N.J.

这首诗通过交织摄影师南·戈尔丁（Nan Goldin）在新泽西州帕特森一家低级脱衣舞酒吧跳舞的经历，与诗人童年时期在同一城市目睹家庭暴力的记忆，探讨了创伤、艺术与生存的主题。诗中将戈尔丁获取小费的情景（男人给她钞票，她塞进比基尼）与诗人童年在家中看到的暴力场景（拳头打在眼睛上，如同黑暗厨房中的闪光）并置。作为孩子的诗人，站在角落里默默观察。成年后的诗人回顾这一记忆时，虽然无法完整 recall 暴力瞬间，但能想起一只手臂挡在门口的画面。诗中描绘了诗人想象她和戈尔丁一起乘坐巴士回纽约，诗人说出自己的童年感悟：“在每间屋子里都有一个家庭，在每个厨房里都有一只拳头和一只眼睛。”戈尔丁则在清点赚来的钱，计算能买多少胶卷。诗中提到朋友曾将戈尔丁从某个公寓“拖出来”，暗示她也面临着困境，而她那张被打伤眼睛的自拍照，被诗人视为拯救了她自己，也拯救了那女孩的艺术作品。随着时间推移，眼睛青紫变色的记忆颜色也随之变化。多年后，诗人的兄弟向她证实了母亲被打伤眼睛的事实。诗人将戈尔丁视为通过艺术实现自救的榜样，并誓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创作艺术。她似乎真的坐上巴士前往戈尔丁的阁楼，将一张黑眼睛的幻灯片 slides 放入戈尔丁的投影仪中，希望母亲也能看到这张放大后的、超越生命的形象。诗歌结尾处，诗人回到戈尔丁跳舞的初衷（为了不用脱光上身），并将其与记忆的“脱衣舞”形成对比。那只黑眼睛的幻灯片被滑入记忆不愿揭示的部分，以完成一个场景——她在其中是那么渺小，无力帮助母亲离开。最终，诗人将戈尔丁通过自拍强行打开一扇门的行为，与自己的经历相呼应：“南·戈尔丁拍下自己，强行把门打开。她推开了它。我推开了它。”艺术成为了她们逃离、直面和超越创伤的工具和力量，一种救赎之路。

# The Atlantic (2024-07-02)

## The First Three Months

本文是安东尼·福奇博士对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前三个月政府应对情况的详细回忆。他描述了自己如何最初从记者那里听说中国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以及随后获取中国真实信息所面临的困难。福奇意识到情况可能比最初报告的严重得多，尤其是在看到武汉快速建设医院的消息后。文章详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如何迅速启动疫苗研发工作，特别是利用mRNA技术平台与Moderna公司合作。福奇也回顾了他首次与特朗普总统的深入互动，以及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观察到的白宫运作方式的差异。他指出，疾控中心（CDC）在早期检测和数据收集方面遇到了严重问题，这导致二月份成为了“失去的一个月”。尽管面临政治压力和公众将他视为联邦应对总负责人的误解，福奇坚持提供基于科学事实的信息，即使这意味着公开与总统的观点相悖（如关于羟氯喹的疗效或病毒会奇迹般消失的说法）。这种坚持导致他成为许多人沮丧和愤怒的对象，他和家人甚至收到了威胁。福奇反思了科学的本质（不断演进、自我纠正）如何与公众（尤其是在高度政治极化的环境下）对确定性的期待相冲突，以及这种脱节如何加剧了误解和不信任。他强调，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需要更好的科学教育和恢复公民社会讨论，以弥合分歧，因为我们国家的两极分化比他此前所理解的更加深刻。

## The Koala Paradox

本文探讨了澳大利亚国宝考拉所面临的复杂生存危机。考拉虽然备受喜爱，并因此获得了大量保育资金，但其种群数量仍在急剧下降，尤其在北部地区。文章详细介绍了考拉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衣原体感染（导致失明、不育和死亡，是入院考拉死亡 utama 原因之一）、汽车碰撞、狗攻击、其他疾病、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南部地区的考拉则面临截然不同的问题：过度繁殖导致栖息地（桉树）被过渡啃食，引发饥饿和生态破坏。保育工作者正在努力应对这些挑战，例如进行衣原体疫苗试验（虽然供应有限），但人与考拉在栖息地的冲突日益加剧，像“考拉友好”社区这样的尝试并未完全成功。文章尤其突出了人类行为的矛盾：人们既深爱考拉，又坚持拥有可能对其造成伤害的事物，比如汽车和狗。在过度繁殖地区，对考拉种群进行管理（如转移、避孕或安乐死）面临巨大的公众情感阻力，与对袋鼠等其他动物的常见扑杀形成对比。作者指出，北部和南部考拉种群在疾病抗性上的差异（衣原体、逆转录病毒）使南部考拉成为潜在的北部种群补充来源，但转移面临科学和实践层面的挑战。考拉的困境是一个缩影，展示了即使是广受欢迎的物种，在气候变化和人类优先事项下，保护工作也异常艰难且充满矛盾。

## The Harlem Renaissance Was Bigger Than Harlem

这篇文章是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哈莱姆文艺复兴与跨大西洋现代主义”的评论，其核心观点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范围和影响远超纽约哈莱姆地区，并与欧洲现代主义存在深刻的跨大西洋交流与互动。作者苏珊·塔尔曼认为，展览成功地展示了这股创意能量不仅限于文学和音乐，覆盖了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并且时间跨度更长，地理范围更广。展览突出了黑人艺术家如何从欧洲现代主义中学习，同时欧洲现代主义也受到非洲文化贡献的启发（如毕加索和德国表现主义对非洲面具和雕塑的借鉴）。哲学思想家如阿兰·洛克和W. E. B. 杜波依斯将艺术视为社会变革和肯定黑人文化的强大工具，洛克尤其视非洲艺术为现代主义表达的经典源泉。文章重点讨论了黑人艺术家如亚伦·道格拉斯如何融合多种风格创造出传达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叙事和自豪感的作品。此外，文章强调了肖像画在哈莱姆文艺复兴艺术中的独特重要性。与欧洲现代主义中肖像画地位下降、人物被抽象化不同，对黑人艺术家而言，肖像画是肯定身份、尊严和黑人多样化之美的关键手段，对抗了历史上的隐形和程式化描绘，具有集体性的目标。文章也提及了艺术家在巴黎等欧洲城市的经历，那里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学习机会。尽管展览并未回避那个时代的艰难现实（吉姆·克劳法、三K党），但其侧重点在于机构性和生存，通过艺术生产力展现韧性。最终，展览以及亚伦·道格拉斯等艺术家的作品说明了艺术与世界的关系复杂多层，既有直接信息传达，也有对学习与含义的深层思考。

## What America Owes the Planet

凡恩·R. 纽柯克二世探讨了气候赔偿（Climate Reparations）的议题，即那些为气候变化负有主要历史责任的工业化国家应赔偿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脆弱发展中国家。他追溯了这一概念的起源，早在1991年的气候谈判中，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就提出了由主要污染国提供资金支持的框架。作者强调，自那时以来，气候变化及其对脆弱国家造成的破坏（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等）已远超预期，而现有的气候资金协议（如COP27设立的“损失与损害”基金）往往以贷款形式存在，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且富裕国家的承诺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文章核心论点在于，气候变化本质上是工业污染，而美国等少数工业化国家（包括大型能源公司）对历史累积排放负有不成比例的责任，因此将当前时代称为“埃克森世”（Exxonocene）可能更为准确。真正的气候赔偿不仅仅是未来的损失与损害补偿，更应包括对过去已经遭受的破坏进行赔偿、修复和提供适应援助，形式可以多样，如债务取消、技术转让或碳捕获投资。作者认为，承认这种历史债务本身具有重要意义，既是道义责任，也是建立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一步。虽然美国在此议题上长期持反对态度，但作者认为气候赔偿并非激进构想，而是解决全球气候危机、防止受影响国家崩溃引发更大不稳定（如气候移民潮及其政治后果）的务实方案。尽管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估算高达数百兆美元），但这可能远低于不作为的代价。文章呼吁美国承担其历史责任，进行长期思考（“像祖先一样思考”），尽管当前政治环境使其立法困难重重，但这对于全球集体生存至关重要。

## The Magic of Old-Growth Forests

克林特·史密斯介绍并赞扬了摄影师米奇·爱泼斯坦的摄影项目“古老的生长”（Old Growth），该项目记录了美国一些最古老、最大的树木，旨在强调保护这些独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文章将古老森林定义为未经人类干扰、能够自我再生的区域，并指出北美大部分此类土地已被破坏。爱泼斯坦的镜头捕捉了多种古老树木，从小叶枫和东部白松，到巨大的红杉，还包括犹他州费许莱克国家森林中一个名为“潘多”（Pando）的白杨克隆群，这个巨大的地下根系连接着四万多棵白杨树，覆盖一百多英亩，重达一千三百多万磅，是地球上最大的活体生物之一，爱泼斯坦认为它“创造了一种无限的幻觉”。照片中的许多树木已存在数百年甚至三千年。文章指出，美国古老树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加剧导致的野火。史密斯也提及了气候变化引发的更频繁和强烈的风暴（如卡特里娜飓风）对树木造成的破坏。作者通过回忆童年在新奥尔良市公园攀爬古老橡树的经历，与这些古老树木的脆弱性以及跨越代际的意义联系起来。文章还引用了梭罗的观念：“在野性中保存着世界”，并在一笔中提到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地区机场扩建计划对沃尔登湖历史和神圣性的潜在威胁，这体现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最终，爱泼斯坦的项目旨在促使我们反思并调整与地球自然资源的关系，认识到“野性”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财富形式。文章强调，将地球恢复到某种气候平衡状态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但并非每个人都理解并珍视“野性”的价值。

## The Most Influential Climate-Disaster Thriller of All Time

本文探讨了1996年的灾难惊悚片《龙卷风》（Twister）的影响力及其正在上映的续集《龙卷风》的导演李 Isaac Chung。文章指出，原版《龙卷风》是一部极其成功的电影，位列当年票房亚军，它将风暴追踪者们的冒险和电脑特效与实体特效相结合的巨大龙卷风完美呈现，开创或强化了以气候灾难为核心的电影子类型。作者称，《龙卷风》以一种令人着迷的方式捕捉了人们对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敬畏，并展现了角色面对危险时的冲劲。文章介绍了续集《龙卷风》的导演李 Isaac Chung，他因执导了细腻的家庭移民故事片《米纳里》（Minari）而获得奥斯卡提名，被认为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然而，Chung本人认为《米纳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小尺度的灾难片，讲述了家人在逆境中建造新生活的韧性，这为他执导《龙卷风》奠定了情感基础。Chung向斯皮尔伯格等制片人阐述了他的愿景：将新片不仅打造成视觉奇观，更要深入挖掘角色关系和内心的自我发现。他希望影片的紧张感和轻松时刻源于人物之间的动态变化（原版是 Hunt 和 Paxton 角色的再婚喜剧，新片则是一个被龙卷风创伤的女气象学家如何与同事和对手找到目标）。新片融入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现实焦虑和新技术，比如基于真实科研的雷达数据追踪系统。Chung在拍摄中努力融合特效和实体效果，并在俄克拉荷马州实地取景，即使面临真实龙卷风带来的延误。文章也提及他在父亲去世后期间的经历，这使他将影片注入了更多个人情感和反思，尤其关注人物面对危险时表现出的勇气和韧性，以及对家乡俄克拉荷马的热爱和自豪。尽管努力避免过多刻意“致敬”原版，最终影片在惊险动作之外，更显Chung的个人风格，强调了角色成长、人际连结和地域感。

## Stop Trying to Understand Kafka

Judith Shulevitz 分析了弗朗茨·卡夫卡的寓言和独特散文风格，认为他刻意回避清晰阐释，旨在揭示现实的不可理解性，同时他的作品深受犹太文学传统的滋养。文章对比了卡夫卡与拉比和耶稣使用寓言的方式，指出卡夫卡对寓言的作用持悲观态度，认为它们只能说明不可理解之事就是不可理解的。通过引用《致皇帝的口信》等寓言，作者阐释了卡夫卡关于意义不可企及、徒劳等待的主题。文章肯定了卡夫卡与犹太文化（布拉格犹太人生活、意第绪语戏剧、犹太经典等）的深厚联系，尽管他本人未经正式的犹太教育。卡夫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通过特定的犹太经验表达普世主题，如异化、羞耻、流亡、律法，这些主题既深刻犹太化又具后神学意义，回响着现代人的困境。作者强调了卡夫卡“圣经式”的文风：极其精炼、缺乏修饰、词汇有限、避免主观情感，如同《圣经》中的人物描写，侧重行为而非内心独白。这种风格导致了卡夫卡作品翻译的难度，因为其简单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潜在意义。文章以《变形记》（Die Verwandlung，应译为《转变》）为例，解释了将标题译为“转变”更能捕捉格里高尔变化的多层次性（不仅是生理，还有家庭动态）。文章还细致分析了德语词 Ungeziefer（蠹虫、害虫）的复杂含义及其在叙事中的作用，以及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如《转变》中的“嘶嘶声”）如何在文本表层下构建深层含义，这与布伯和罗森茨维格对《圣经》风格的分析相呼应。最后，作者指出卡夫卡的寓言拒绝被完全解释，他的作品虽揭示了上帝的缺席或疏离，但描绘缺席本身也构成了某种存在。尽管他将曾经连接人与神的文学形式转变成了关于神缺席的告示，但这篇告示本身，以及他的寓言，并非无关紧要。

## The Real ‘Deep State’

本文评论了卢克和布罗迪·马林斯兄弟的新书《K街的狼》，作者富兰克林·福尔在评论中指出，与特朗普政府持续攻击的公务员阶层不同，华盛顿的游说业及其强大的影响力才是真正的“深层政府”，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它们都能持续运作并塑造政策。文章以保罗·马纳福特在特朗普治下可能重获影响力为例，说明了华盛顿旋转门文化的普遍性。文章追溯了游说业自20世纪70年代的爆炸性增长，从少数隐秘的中间人变成了以K街为中心的巨大产业，其本质是通过日益复杂的方法为 corporate 利益服务，塑造公众和立法者意愿。这种转变部分源于企业对消费者运动（如拉尔夫·纳德）和新环境/安全法规的回应，刘易斯·鲍威尔的备忘录更是呼吁企业建立政治基础设施抗衡。文章介绍了游說界的关键人物，如打造企业联盟的汤米·博格斯，以及将草根运动和名人策略引入游说的托尼·波代斯塔，揭示了行业为追求利润而选择客户时的不加区分，甚至与对立方的利益冲突（如服务乌克兰亲俄政客亚努科维奇）。作者指出，游说业的影响力巨大，不仅塑造了华盛顿文化（奢侈、金钱至上），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生活（媒体帝国、放松管制、减税导致不平等）。书中描绘了像埃文·莫里斯这样的悲剧案例，他利用“黑色行动”手法（如煽动禽流感恐慌推销药品），但因财务欺诈败露最终自杀，然而这并未阻止整个行业的繁荣。作者认为，游说业已发展为能够操控舆论的综合性组织，将其自身伪装成“咨询”或“战略”，难以察觉。文章警告，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并兑现其清除公务员的承诺，传统官僚体系对企业利益的制衡将被削弱，安插的亲信将更容易屈服于游说者和捐款人的意愿，K街的“狼群”将“蚕食”负责任的治理，迎来史无前例的狂欢。

## Rachel Cusk’s Lonely Experiment

尼古拉斯·戴姆斯在本文中评论了蕾秋·卡斯克的新作《游行》（Parade），并分析了她持续进行的独特小说写作实验：剔除传统元素，如今更是尝试放弃“人物”，以探讨自我和解放的主题。文章以书中的一个寓言（杂乱的房间与整洁的厨房对比）开篇，暗示了卡斯克作品中意象的积累与抹去之间的张力，以及她将后者（“清洁”工作）与女性解放写作联系起来。作者指出，卡斯克自《概览》三部曲以来，一直在精简小说架构，先是弱化情节，通过叙述者冷峻地观察他人来展现自我。在新作《游行》中，她进一步推向极端，目标是“关于无人的书”，抛弃传统意义上的角色身份、社会角色乃至生理束缚，追求一种抽象的、未被规训的自由自我。这种解放，在她看来，对女性写作尤其重要。文章阐述了《游行》的结构：四个分层部分，反复出现一个名为“G”的艺术家形象，其性别、状态和艺术形式不断变化，但总是倾向于视觉艺术，象征着从叙事和因果关系中解脱。G力图从艺术中去除自我。书中呈现的是那些“正在走出自我”的人们的片段式传记，他们放弃了工作、爱侣、家庭，以一种抽离、疏远的声音发言。作者认为这些人物是“空心化”的，是在经历净化仪式，寻求一种“非现实性”，即身份之外的空旷空间。这种风格导致了卡斯克作品中讽刺的边缘被磨平，变得更加苦修化。文章认为，卡斯克放弃了她早期 작품 中对他人经验的强烈好奇心和判断欲，这导致了新作品中角色描写的单调，比如在“潜水者”一节中，关于自杀事件后的艺术界晚宴，对话变得缺乏个性，接近“理论黑话”。然而，文章指出，《游行》在处理母子关系时，展现了隐藏的活力。卡斯克将这种关系视为身份具有束缚性的核心原因：母亲塑造孩子的自我，孩子也给母亲套上母性的面具，两者互相创造又互相束缚，最终都想逃离。这种逃离总是伴随着痛苦和代价。文章最后提出，卡斯克坚持自由的代价，但这种追求抽象和洁净的语言，虽然符合她的理论，却可能失去了传统小说中人物和情感的吸引力，这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挑战：你真正想要的小说是什么样的？

## 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

本文是《The Atlantic》杂志主编杰弗里·戈德堡撰写的编者按，介绍了本期杂志（2024年7月/8月号）的核心主题：气候变化以及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戈德堡强调，《The Atlantic》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环境议题，并有着出版梭罗、约翰·缪尔、雷切尔·卡森等重要环保作家的历史，他本人不认同通过探索外星球来逃避地球环境危机的观点，而是认为应该专注于保护我们目前所处的星球。本期杂志的专题文章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凡恩·R. 纽柯克二世探讨了气候赔偿问题，论证美国等富有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负有责任，并认为赔偿脆弱国家可能是全球自救的最佳途径，警告富有国家的舒适感只是幻觉。乔治·帕克撰写的封面故事深入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将其视为美国在气候危机、政治极化等根本困境的缩影，以及对美国乐观精神和创造力的考验。罗斯·安德森的文章则关注格陵兰的冰川，研究通过技术手段拯救冰川的可能性，以对抗海平面上升不可避免的悲观论调。凯瑟琳·J. 吴的报道聚焦澳大利亚的考拉危机，揭示了即使是受欢迎的物种，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压力下，保护也面临巨大挑战，并探讨了衣原体等疾病的影响。戈德堡分享了他拜访沃尔登湖的个人经历，感叹现代旅游业和附近机场的扩张计划对这片历史神圣之地的影响。他引用了梭罗的著名格言“在野性中保存着世界”，认为将地球恢复到某种气候平衡状态符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但可惜的是，在各种利益冲突下，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并珍视野性的价值，这种共同的利益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

## ‘I Will Never, Ever Go on a Cruise’

这部分内容是《The Atlantic》杂志“公共空间”（The Commons）栏目刊载的读者来信，主要围绕加里·什泰因加特关于乘坐世界上最大的游轮“海洋标志号”的体验文章，以及杰弗里·戈德堡关于共和党参议员在弹劾特朗普问题上表现的文章。针对什泰因加特的邮轮文章，读者反应呈多样化。一些人赞扬文章诙谐、深刻，并认同作者的观点，表示更坚定了不乘坐邮轮的决心。一位从事旅游代理的读者则给出了较为复杂的看法，她觉得文章有趣真实，但也指出邮轮对于残疾人士提供了难得的旅行机会，并且赞扬了邮轮工作人员的专业和关怀，认为作者忽略了这些积极方面。另一些读者则表达了强烈的批评，认为什泰因加特的文章傲慢、刻薄，缺乏旅行写作应有的客观和对当地/人群的尊重，只是发泄自己的不适。还有读者将文章上升到政治批判层面，认为这种“蓝州精英”对普通美国人的鄙视，恰恰印证了特朗普支持者的论点，加剧了政治极化，认为作者未能看到乘客（包括退伍军人）的“内心生活”。加里·什泰因加特在回复中回应了这些批评，他认为文章的关键点在于观察到乘客普遍缺乏好奇心，而非其政治立场（他指出许多乘客来自蓝州）。他坚持自己观察到的乘客消费习惯和娱乐选择的单调，认为这种冷漠和缺乏好奇心可能与一个国家放弃民主传统有关。对于杰弗里·戈德堡关于参议员的文章，读者普遍赞扬其点出了部分共和党议员在涉及特朗普问题上的虚伪和懦弱，未能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和民主。但也有读者提出了更中立的观点，认为部分参议员可能基于对宪法解释或相信特朗普主义会自行消退的判断，或许其考量比简单的“懦弱”更复杂。栏目最后还简要介绍了本期封面故事关于菲尼克斯的设计理念和过往文章的更正。

## Mojave Ghost

这是一首由弗雷斯特·甘德（Forrest Gander）创作的短诗，题为《莫哈韦之鬼》（Mojave Ghost）。诗歌以沙漠景象开篇，描述了微小的鸟儿像星星一样坠入荷叶树枝头的夜栖场景，营造出一种静谧而略带神秘的氛围。随后，诗人的思绪转向梦境，反思梦境是否像水一样无味、无嗅。然而，梦境中的一个探访者，一个“你”，打破了这种设想。这个访客的身体是完整的，但却带着一种强烈的、令人无法忽视的气息——“灭绝的霉味”。通过这种感官描写，诗歌在现实观察和梦幻遭遇之间构建对比，引入了死亡、失去和灭绝的主题。访客身上“灭绝的味道”是一种沉重而具体的象征，可能代表着自然世界正在消失的物种，或者某种过去的存在（也许是逝去的爱人），它们以一种鬼魂般的方式回归，提醒着诗人世界正遭受的损失。这首简短的诗探索了记忆、自然世界的脆弱性以及消逝之物的持久影响，尽管其形式简洁，但通过并置具像的自然景象和抽象的“灭绝”概念，引发了深刻的反思。

# The Atlantic (2024-08-02)

## The First Three Months

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Anthony Fauci回顾了2020年初COVID-19大流行的最初三个月，从得知中国出现不明肺炎的电话开始。文章详细描述了获取关于病毒的真实信息遇到的困难，特に中国官方的不透明。他描述了病毒人际传播能力的早期不确定性，以及美国疾控中心（CDC）最初遇到的障碍，包括测试的延迟和对无症状传播的认识不足。Fauci着重记述了与疫苗研发团队（特别是Barney Graham）快速启动mRNA疫苗工作的过程，尽管当时这项技术尚未获得FDA批准。文章也记录了他与特朗普政府的互动，包括在白宫会议室首次与特朗普长时间交流的经历。他提到特朗普最初对其的赞扬，但也逐渐显露出对科学事实的漠视以及对诸如羟氯喹等未经证实疗法的推广意向。公众健康指南的演变，例如是否应该戴口罩的建議改变，被极化政治扭曲，导致了对科学家及其建議的质疑。Fauci还讨论了政治分裂如何放大不信任和错误信息，指出即使是基础科学的自我修正过程也成为攻击目标。他分享了因担任公众人物而面临的威胁和騷扰，以及妻子提供的支持如何在职业压力下帮助他保持身心平衡。文章最终反思了这场大流行暴露出的美国社会深刻的分裂，并强调了科学教育和恢复civility的重要性，认为理解科学过程的自我修复性以及重建人际对话是应对未来危机、弥合分歧的关键。他指出，特朗普政府和公众低估了病毒的长期影响，将其与季节性流感相提并论，这种誤解对疫情控制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 The Koala Paradox

本文探讨了澳大利亚国宝考拉面临的复杂生存困境。尽管深受喜爱并投入了大量保护资金，考拉种群数量在一些地区急剧下降，而在另一些地区却面临过度繁殖的问题。文章详细描述了考拉面临的主要威胁，首当其冲的是衣原体感染，这种性传播疾病在考拉中广泛传播，可导致失明、不育甚至死亡。此外，非感染性威胁如车辆碰撞、狗袭击、癌症、真菌感染以及栖息地破坏和气候变化也对考拉构成严峻挑战。在澳大利亚北部，考拉被列为濒危物种，其主栖息地正是人类青睐的沿海地区，这导致人与动物的冲突。衣原体疫苗正在研发和试用中，显示出一定成效，但供应有限，且无法治疗已感染严重的动物。文章通过追踪一只名叫Dumpling的考拉的命运，生动展现了衣原体疾病的残酷和保护人员的无奈与悲伤。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澳大利亚南部的考拉种群在某些地区（如French Island和Cape Otway）因缺乏天敌和适宜环境而过度繁衍，过度啃食桉树导致森林受损甚至死亡。这种南、北考拉状况的巨大差异凸显了保护策略的复杂性，南部考拉被一些人视为劣等或麻烦，甚至有人呼吁扑杀。文章指出，试图将南部考拉用于恢复北部种群的想法面临基因差異、疾病传播和迁移难度等多重挑战。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考拉的压力，导致高温胁迫和栖息地因野火和干旱而丧失。作者认为，对考拉的两极化看法——既被视为国宝投入巨资保护，又在某些地区因过度繁殖或被人类活动伤害，甚至被视为“树虱”——体现了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拯救其他物种做出牺牲的矛盾。文章强调，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考拉的问题，人类需要解决自身的分歧，并反思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找到保护这些标志性动物的出路。

## The Harlem Renaissance Was Bigger Than Harlem

本文评述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哈莱姆文艺复兴与跨大西洋现代主义”，认为该展览成功地展示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力远超哈莱姆地区及其通常被理解的范围。展览旨在证明黑色美国艺术家的创造力爆发不仅包括文学和音乐，还涵盖视觉艺术，并且延续时间更长，地理范围更广，특히强调了与欧洲现代主义之间的双向交流。文章通过分析Aaron Douglas等艺术家的作品，例如他画作中对提香作品的引用，揭示了黑色艺术家如何借鉴欧洲大师的技巧与主题，并将其融入自身对黑人身份和历史的表达中。展览展示了Aaron Douglas将非洲艺术的几何形式、埃及艺术的侧面剪影与装饰艺术风格相结合，创作出既具现代感又富有历史叙事的“历史画”，旨在激发黑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驳斥了W. E. B. Du Bois和Alain Locke等知识分子领袖关于艺术作为“宣传”与艺术作为纯粹“美学”的辩论。文章指出，巴黎是许多黑人艺术家学习和找到自由的重要之地。展览中的一些作品捕捉了他们在欧洲丰富多彩的生活，如Archibald Motley描绘巴黎夜生活的画作，其中融入了对欧洲古典绘画构图的借鉴。文章还重点讨论了肖像画在黑人艺术中的特殊意义。与欧洲现代主义中忽视肖像画、將受试者抽象化不同，对于黑人艺术家和观众而言，肖像画不仅是财富和个体价值的象征，更是纠正艺术史中黑人形象长期缺席、展现黑人多样美丽和品格的重要方式。Laura Wheeler Waring和William H. Johnson等艺术家的肖像作品以不同的风格强调了肖像主体的尊严和重要性。文章认为，展览侧重于展示黑人艺术家在困境中展现的能动性和顽强生命力，而非着重表现种族暴力和创伤。最终，文章认为展览揭示了艺术创作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黑人艺术家们在前辈大师的作品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在吸收各种国际影响的同时，致力于表达真实的黑人体验和身份，他们的成就值得更充分的认可。

## What America Owes the Planet

本文探讨了气候变化中“气候赔偿”的概念，认为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气候改变负有历史责任，并应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弱小国家提供赔偿，这也许是拯救全球的最可行途径。文章追溯了气候赔偿理念的起源，提到1991年由瓦努阿图牵头的由小型岛屿国家组成的联盟（AOSIS）首次提出的“损失与损害”基金提案，尽管该提案在最初的气候框架谈判中未被采纳。作者强调，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对这些脆弱国家尤为严重，远超主要经济体。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气候政策有所进展（例如2022年COP27会议同意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但富裕国家的承诺往往流于表面，提供的援助多为增加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贷款，而非无偿援助。作者认为，“人类世”这一概念模糊了气候责任的差异，实际上，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部分碳排放集中在少数企业和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文章以海地为例，说明殖民历史如何加剧了脆弱国家面对气候灾害的脆弱性。Maxine Burkett等学者提出的气候赔偿框架不仅包含对未来损失的补偿，还应涵盖对已造成破坏的补偿，形式可以多样，如GDP比例捐赠、征税于化石燃料产业用于援助、或无偿提供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作者认为，赔偿的核心不仅在于金钱，更在于责任的承认，这有助于建立全球社区的信任，并促使主要排放国设定和达成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文章最后强调，虽然气候赔偿成本巨大（估计高达数万亿美元），但在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政治不稳定等问题面前，不采取行动的代价将更高。美国作为最大的历史排放国，应主动承担责任，这不仅是道义的需要，也是为了自身的长期生存。作者呼吁美国人像“祖先”一样思考，做出代际承诺，投入必要资源，为后代保留一个可居住的地球，而非寄希望于虚幻的“深层国家”清洗或其他短期政治目标。

## The Magic of Old-Growth Forests

本文通过摄影师Mitch Epstein的新项目《Old Growth》来探讨美国古老森林的意义。Epstein的项目记录了美国各地一些最古老的树木和森林，包括高大的红杉、枫树以及猶他州跨越106英亩、由单一根系连接的阿斯彭颤杨群落Pando——地球上最大的活体生物之一。作者回顾了自己童年在新奥尔良城市公园攀爬老橡树的经历，以此引入人类与可以世代相传的古老树木之间的情感联系。文章定义了“原生林”（old-growth forests）是指未经人类砍伐破坏，能够自然修复和生长的森林区域。Epstein的镜头捕捉了这些历经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时光的古老树木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和宏大规模，这些照片旨在提高人们对现存原生林的关注，并呼吁加强对其保护。然而，文章指出，这些古老森林正面临严峻威胁，尤其是气候变化加剧引发的野火，这是根据近期一份联邦报告得出的结论。气候变暖对所有年龄段的树木都构成了风险，正如休特尔卡特里娜飓风曾摧毁新奥尔良城市公园的树木一样，未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破坏。Epstein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让人们反思“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重新调整我们与地球赋予的自然资源的关系？”，他認為现在改变方向还为时不晚。文章通过摄影项目强调了古老树木不僅僅是自然景观，它们是活着的历史，承载着时间、记忆和生态韧性，它们的存在提醒着人类对自然的责任和保护的紧迫性。作者认为，认识到世界“野性”的价值——如Thoreau所言“野性即世界的保全”——并在人类发展与自然平衡之间找到出路，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在。

## The Most Influential Climate-Disaster Thriller of All Time

本文探讨了1996年的龙卷风灾难惊悚片《龙卷风》（Twister）的文化影响力和遗产，指出它不仅票房成功，更是开创了后续一系列以气候灾难为主题的电影的先河。作者追溯了他本人少年时在阿肯色州对龙卷风的着迷，并对比了对灾害的恐惧与片中主人公的无畏追逐。文章强调了《龙卷风》如何利用快速发展的CGI技术与传统特效相结合来营造逼真的灾难场面，片方和导演甚至认为这部电影无法被成功翻拍。然而，近三十年后，电影界正推出续集《龙卷风》（Twisters），由韩国裔美国导演李·艾萨克·郑（Lee Isaac Chung）执导，这被认为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选择，因为他之前的作品（如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米纳里》）更偏向安静的角色研究和家庭剧。本文通过对导演的采访，揭示了他接受执导《龙卷风》的动机并非仅仅为了商业利益，而是希望在灾难背景下探索更深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张力。他将原版电影视为一场婚姻喜剧，并希望新片能通过主人公与龙卷风的创伤经历以及她与两位风暴追踪者的复杂关系来构建核心冲突和叙事弧线。文章指出，新片在展现惊险灾难场面的同时，也融入了真实的气候科学和新技术，反映了当下人们对极端天气日益增长的焦虑。导演在拍摄过程中面临了真实的龙卷风延误以及父亲突然去世的个人悲剧，这些经历让他更加依赖信仰，并认识到将自我控制与顺应更大力量相结合的重要性。作者提到，尽管是一部商业大片，李·艾萨克·郑的新作仍然体现了他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关注以及对美国乡村地区韧性与地方自豪感的细腻描绘。电影中对角色个人旅程的强调以及对俄克拉荷马特定地域的捕捉，使得这部续集在惊险刺激之余，也具有了独特的个人印记和情感深度。

## Stop Trying to Understand Kafka

本文作者Judith Shulevitz深入分析了弗兰兹·卡夫卡作品的独特之处及其难以捉摸的意义，认为试图完全“理解”卡夫卡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他的寓言本就不旨在提供清晰的答案。文章首先对比了卡夫卡的寓言与犹太拉比和耶稣的寓言，他们通过寓言传达道德或属灵真理，而卡夫卡在自己的寓言《关于寓言》中似乎宣称寓言的无用，它们只是说明了“不可理解之物是不可理解的”。卡夫卡作品中弥漫的疏离、羞耻、流亡、法律与缺失等主题，被作者认为是深深植根于他犹太背景的同时，又具有普世性的现代困境的投射。文章讨论了卡夫卡受犹太文化和经典文本的影响，特别是他简洁、刻板的语言风格被认为具有圣经般的朴素感，这与当代文学的潮流形成对比。作者特别指出卡夫卡作品中的关键重复词语的重要性，例如在《变形记》（在此由翻译家Mark Harman改译为《蜕变》）中，主人公的蜕变不仅指生物形态，更指其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原文中“Ungeziefer”（通常译为“害虫”）一词的分析，揭示了其多层次内涵，既指格里高尔的生物形态，也可能暗指他父亲或更广泛社会中令人厌恶的一面。德语词Zischen（嘶嘶声）的重复使用，则串联起格里高尔和其父亲在场景中的行为，暗示了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对应与“荒野人”的标签共享。文章还分析了卡夫卡最著名的寓言《在法的门前》，强调了其中“进入”（Eintritt）如何滑向卑微的“许可”（Einlass），以及门口永远只为“你”而开的悖论。作者引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指出卡夫卡的寓言抗拒解释，它们不是要被穷尽意义，而是以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存在。最终，文章认为，卡夫卡在激进怀疑主义时代将寓言形式从连接人与神的媒介转变为宣告神缺席的方式，但这本身反倒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使神性在文本中持续存在。卡夫卡本人关于神只是有时心情不好，对人类没有无限希望，但对神自己有无限希望的说法，都进一步印证了他的作品对确定意义的抗拒。尽管卡夫卡的作品没有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希望，但其存在本身，以及它们所引发的无尽反思，本身亦非虚无。

## The Real ‘Deep State’

本文评论了Luke和Brody Mullins兄弟的新书《K街的狼：热钱如何接管华盛顿政府的秘密历史》，核心论点是华盛顿的游说产业已经成为真正的“深层政府”，其影响力根深蒂固，甚至超过了特朗普及追随者所抨击的官僚体制。文章回顾了美国游说业的崛起历程，指出其在20世纪中叶规模尚小，但自1970年代起，为应对拉尔夫·纳德等消费者维权人士以及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等新监管机构的出现，企业界在刘易斯·鲍威尔的倡导下开始大规模投入，构建亲商业的政治和智力基础设施。Tommy Boggs等人物被视为现代游说业的先驱，他们利用在华盛顿的人脉和影响力，成功地为企业客户阻止了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法规，例如阻止联邦贸易委员会对针对儿童的糖果广告进行监管。文章指出，游说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华盛顿文化的转变，金钱和影响力变得更加公开和被追逐。更甚的是，游说者将进步主义社会运动中动员公众、影响舆论的策略嫁接到为企业服务上，Tony Podesta等从反战运动出身的人物转为为企业乃至外国政府提供游说服务。通过使用名人效应和伪造的“草根”运动，游说者成功地影响了公众态度和立法。文章列举了游说公司Black, Manafort, Stone, and Kelly如何帮助默多克扩张媒体帝国、为企业争取税收减免等案例，认为游说业的兴盛导致了企业逍遥法外和日益加剧的贫富不均。文章也穿插了一些个人悲剧故事，如Evan Morris为了追求财富和地位而进行欺诈性游说，最终自杀的案例，但指出这些只是少数个例，游说行业整体仍在蓬勃发展，不断适应和规避新的监管措施。作者认为，特朗普虽然声称要“抽干沼泽”，但他执政期间游说支出反而增加。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意图清除官僚体制的计划可能导致政府部门被效忠个人而非公共原则的亲信占据，这些新官员将更容易与游说者进行利益交换，从而使得K街的力量对政府运作形成近乎全面的掌控。文章悲观地认为，虽然公务员体系存在不足，但它仍是对抗企业利益侵蚀的一道不完美防线，而未来的情况可能意味着“K街的狼群将吞食负责任治理的尸体”。

## Rachel Cusk’s Lonely Experiment

本文评论了瑞秋·卡斯克（Rachel Cusk）最新的实验性小说《Parade》，深入分析了她独特的创作路径和对传统小说元素的持续“清洗”——继在《Outline》三部曲中剥离情节之后，新书进一步试图摆脱“人物”本身。文章将卡斯克的风格比作“清理者”，认为她试图去除传统叙事中积累的物件、细节和人物特征，以创造一个更少限制、更自由的创作空间，尤其对女性写作而言，传统的小说形式常常限制了其自主性。在《Parade》中，小说由四部分组成，通过一个名为“G”的、性别和身份不断变化的流动艺术家形象来贯穿。G常常与视觉艺术相关，卡斯克通过不同视角外部审视G及其作品，而非像传统小说那样深入人物内心或提供连续的叙事。这种方式旨在挑战读者对稳定身份的依恋，追求一种抽象和非具体化的表达。文章引用福楼拜的宣言“写一本关于无物的书”并对比卡斯克的追求“写一本关于无人的书”，认为她寻求一种超越历史、文化和心理连续性的、完全未被限定的生命状态的想象。书中包含了一系列人物试图摆脱自身的故事，他们辞职、离开伴侣或家庭，仿佛在进行一种净化仪式，渴望摆脱自我，进入一种未知的、空虚的状态。文章指出这种追求带来了一种强烈的禁欲主义和冷淡感，卡斯克的语言依然精准，但缺乏过去的讽刺和批判锋芒，她似乎不再对人物的怪癖和内心冲突感兴趣，认为那是一种“身份的悲情”（pathos of identity），转而追求一种超然的态度。然而，文章认为卡斯克对“人物”的清除并不彻底，尤其在写到母子关系时，小说重新焕发生机。对她而言，母子捆绑是身份束缚的核心隐喻：母亲为孩子塑造身份，孩子则限定了母亲的角色，双方都在寻求摆脱对方创造的界限，而这种逃离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牺牲。文章认为，卡斯克通过母子关系揭示了获得自由的代价，而这一主题是《Parade》中最具情感力量的部分。尽管卡斯克希望通过剥离人物和情节来展现新的可能性，但作者认为这种高度抽象和冷淡的风格使得小说缺乏传统叙事的吸引力，读者可能会渴望人物的生动和情感的爆发，而卡斯克的回应似乎是质疑这种渴望本身的价值。最终，文章认为《Parade》是卡斯克在探索文学形式的孤独实验中，达到了一种极端洁净、近乎透明的状态，它抛弃了传统小说的诱惑，但也因此可能失去了吸引读者的部分魔力，成为一次远离人物的、孤高的智性探索。

## In Wildnes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orld

本文是《The Atlantic》杂志主编Jeffrey Goldberg为本期杂志撰写的编者按，主要介绍了本期杂志关注的核心议题：气候变化以及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文章开篇引用亨利·大卫·梭罗的名言，强调了自然世界的价值及其对我们生存的意义。主编提到《The Atlantic》杂志有着关注环境保护的悠久历史，曾刊登过梭罗、约翰·缪尔、蕾切尔·卡森等重要环保思想家的作品，并致力于探索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接下来，文章简要介绍了本期几篇重点文章的内容，并将其置于气候变化这一宏大背景下。其中包括Vann R. Newkirk II关于美国在气候变化中对其他国家所负债务以及气候赔偿可能性的论述，George Packer对菲尼克斯——一个象征美国困境、虚伪与自我修正潜力的城市——在气候变暖下面临的挑战的深入报道，Ross Andersen关于在格陵兰阻止冰川融化的技术探索，以及Katherine J. Wu关于澳大利亚考拉如何在气候变化和疾病威胁下挣扎的特写（作者特别提到这是杂志首次报道有袋动物衣原体问题）。主编本人也分享了他到梭罗隐居地沃尔登湖（按语译为瓦尔登湖）的拜访经历，指出今天的沃尔登湖与当年梭罗笔下的景象已大不相同，面临着附近机场扩建等发展带来的噪音和破坏威胁。通过这些文章和个人感悟，主编强调了一个核心观点：将地球恢复到某种气候平衡 상태 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利益。他拒绝了埃隆·马斯克等人提出的通过星际移民来解决環境危机的主张，重申了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本身的关注和责任。文章结尾再次强调，虽然财富有多种形式，自然世界的“野性”便是其中一种，认识到保护地球、恢复平衡的重要性，是全人类为了共同未来必须面对的普遍课题，尤其是在当前气候变化加速的时期。总而言之，这篇编者按为读者概述了本期杂志的专题方向及其重要性，突显了杂志以深入报道和历史视角探讨气候危机和人类与自然复杂关系的宗旨。

## ‘I Will Never, Ever Go on a Cruise’

本篇文章汇总了《The Atlantic》杂志读者对2024年5月号部分文章的反馈，其中核心部分是关于Gary Shteyngart撰写的乘坐世界上最大的游轮“海洋标志号”的文章引发的讨论。一些读者对Shteyngart的报道赞不绝口，认为其幽默、精彩且尖锐，加深了他们永不乘坐游轮的决心。他们欣赏作者敏锐的观察和风趣的笔触。然而，另一些读者对Shteyngart的笔触表示失望甚至批评。他们认为作者态度傲慢，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品味流露出明显的精英主义蔑视，这与他所批评的政治极化和对立情绪不谋而合。有读者指出，游轮旅行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士（如使用轮椅者）来说是重要的旅行途径，使他们得以看到世界，这是作者可能忽视的角度。还有读者，包括曾担任旅游记者的人，批评Shteyngart未能展现出应有的对旅行地或体验的尊重和价值发现，过度聚焦个人感受和批判，未能客观呈现他人的享受或体验。他们认为好的旅游写作应避免居高临下和个人中心主义，應努力理解不同旅行者的视角。也有读者将Shteyngart对游轮乘客的描述与特朗普支持者的形象联系起来，认为这种带有偏见的描绘加剧了社会分裂，可能反过来证明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对“蓝州精英”的看法。另一组读者来信涉及Jeffrey Goldberg关于共和党参议员未能投票弹劾特朗普的文章。一些读者对Goldberg的观点表示赞同，谴责那些参议员的虚伪和胆怯，认为他们为了政治利益或害怕特朗普而放弃了原则，未能阻止对民主的威胁。另一些读者则为这些参议员辩护，认为他们的投票可能有更复杂的考量，例如避免进一步加剧政治分裂或相信特朗普主义终将过去，他们的决定是基于规则和对未来的希望。文章最后还包括了杂志一些小型更正，指出之前文章中的事实错误细节，体现了杂志对准确性的承诺。

# The Atlantic (2024-09-02)

## How M. Night Shyamalan Came Back From the Dead

M. Night Shyamalan 的职业生涯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从《第六感》、《不死劫》、《天兆》等早期作品的巨大成功和评论界赞誉，他被誉为“下一个斯皮尔伯格”，到《神秘村》、《水中女妖》等影片遭遇严厉批评和票房失利，再到他通过自筹资金拍摄小成本恐怖片如《探访惊魂》、《分裂》成功复苏。文章深入探讨了 Shyamalan 独特的电影视角、他对好莱坞体系的抵触以及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家庭和对父权的焦虑）如何影响其创作。他经历了疯狂的炒作和残酷的批评，最终找到了不同于传统制片厂的道路。文章指出，随着好莱坞大片模式的疲态显现，Shyamalan 坚持原创、带有标志性反转的惊悚片反而重新赢得了观众的青睐。他的新作《陷阱》继续探索父女关系与黑暗主题的融合，展现了他如何将个人恐惧转化为引人入胜的心理恐怖故事。

## To Save the World, My Mother Abandoned Me

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个人回忆录，作者 Xochitl Gonzalez 讲述了她童年时期被母亲 Andrea González 抛弃的经历。母亲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为了追求革命理想和“拯救世界”，将年仅三岁的作者送往外祖父母家抚养。文章细腻地描绘了作者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成长的复杂情感，她对外祖父母的感激，对母亲政治事业（如竞选副总统）的懵懂自豪，以及内心深处因被抛弃而产生的困惑和痛苦。作者通过母亲的竞选徽章等物件寻找与母亲的联系，并试图理解母亲激进理想主义背后的牺牲。文章对比了母亲对集体事业的献身与作者对个人成就的追求，反思了激进运动对个体家庭造成的伤害。作者在创作小说《奥尔加梦想死去》时，通过研究母亲的政治生涯，对她有了新的理解，并在一次坦诚的对话中，母亲终于承认了未能抚养她的遗憾。

## Beauty

这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 Phillips 先生在孙女 Clare 自杀三周后，前往她就读的大学宿舍探访的故事。他由一位名叫 Sarah Gibbs 的院长陪同。故事围绕 Phillips 先生的悲伤、困惑以及在这一沉重时刻，他对美丽的女院长产生的意外且令人不安的吸引力展开。小说通过 Phillips 先生的内心独白，探讨了他失去孙女（以及六个月前去世的妻子）的巨大痛苦，以及在悲剧背景下，美和情欲的出现所带来的错乱感。他努力理解孙女自杀的“为什么”，但始终没有答案。对空荡荡的宿舍房间的探访是故事的核心，象征着无法填补的空虚和失落。小说细腻地捕捉了人物在极端情绪下的复杂心理，以及在死亡阴影下，生命中不可预测的、令人困惑的面向。

## The Most Revealing Moment of a Trump Rally

这篇文章分析了唐纳德·特朗普竞选集会开场祈祷词中的宗教和政治信息。作者审阅了大量祈祷词，发现其中频繁引用《历代志下》，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背弃上帝契约、需要悔改的国家。祈祷词对美国现状持悲观态度，归咎于移民、进步主义政策等“罪恶”。文章指出，特朗普在宗教支持者心中的形象已从“非典型器皿”转变为正义、受膏的领袖。因此，祈祷词不再祈求特朗普顺从上帝旨意，而是祈求上帝保护他、赐予他胜利。文中充斥着“属灵争战”语言，将政治对手描绘成“邪魔”。文章探讨了这种末日论框架的潜在危险，尤其是在选举结果不如预期时可能引发的危机或暴力，并引用了一段明确呼吁在特朗普获胜后进行报复的祈祷词。

## American Fury

这篇文章探讨了美国日益升级的政治暴力，以针对特朗普的未遂暗杀为例。作者认为，这类暴力并非随机，而是社会长期恶化条件的必然结果，包括贫富差距、对制度信任下降、党派对立、非人化言论和阴谋论。文章指出，政治暴力在美国已更普遍和被接受，专家警告其将持续一代人。社交媒体加剧了问题。虽然暴力时期会结束，但这往往需要重大变革或“大灾难”。作者呼吁选择明确反对政治暴力的领导人，积极参与公民事务，强调流血带来更多流血，民主承受暴力有限。

## A Field Guide to the Flags of the Far Right

这篇文章是一份指南，介绍了美国极右翼群体使用或挪用的各种旗帜和符号，如国会山骚乱和特朗普集会中出现的。文章强调旗帜作为象征性武器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标志的作用。文中列举并解释了多种旗帜的含义，包括：贝琪·罗斯旗（象征革命）、倒挂的美国国旗（抗议）、基督教旗帜（基督教民族主义）、松树旗/“诉诸天堂”旗（神权政治）、凯尔特十字和黑太阳（白人至上主义、新纳粹）、束棒（法西斯主义）、“美国优先”旗（白人至上主义）以及“Kek”旗（网络恶搞）。文章追溯了历史渊源，解释了当代含义，揭示了极端主义思想演变及内部派别标识。

## The DeLorean Owners Association Strikes a Pose

这篇短文聚焦摄影师 Neal Slavin 的作品集《两人或多人聚集时》，该书收录了他的团体肖像照。作者 Cullen Murphy 探讨了团体照这一形式的限制与解放，以及 Slavin 独特的拍摄手法——让被摄者自行决定姿势——如何捕捉到人物的活力、幽默感以及他们通过自我安排所展现的特质。文章以 DeLorean 汽车车主与爱车合影、公墓工人在墓穴旁微笑等为例，说明了这种拍摄方式的魅力。Slavin 认为，群体是美国真正的基石，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观点，并相信照片中的能量源于群体在决定如何摆姿势时的共同决策过程。文章赞美了这些合作式团体肖像照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愉悦和启示。

## How Greed Got Good Again

这篇文章分析了 HBO 电视剧《行业》，该剧聚焦伦敦一家虚构金融公司的年轻员工，被视为现代“贪婪是好事”精神的写照，暗示 Z 世代金融从业者同样痴迷金钱。剧集由曾从事金融业的编剧创作，展现新人如何适应残酷机构，因对金融术语和文化的描绘（触及脱欧、ESG）受赞扬。文章指出，剧集虽批判行业堕落，但也美化了生活方式，吸引年轻观众。探讨角色野心、复杂关系及对金融胜利循环的沉迷。第三季聚焦 ESG，以愤世嫉俗视角描绘其为投机途径，突显贪婪代际传承。

## A Satire of America’s Obsession With Identity

这篇文章评论了 Danzy Senna 的新小说《彩色电视》，该书以讽刺手法探讨美国对身份的痴迷，特别是混血儿经历。主人公 Jane 试图创作“伟大的美国混血小说”并制作混血喜剧。文章对比 Jane 小说与 Senna 讽刺风格，认为两者都难以找到明确“混血儿原型”，因后民权时代混血身份流动复杂。Senna 小说批判身份政治、好莱坞商品化、文学刻板印象、学术界、进步派公众“身份崇拜”。强调将种族比作无味冰沙的隐喻，及 Jane 难以定义“更混血”的困境。小说暗示混血经历是无解谜题，提供“喜剧性谦逊”。

## A Marriage That Changed Literary History

这篇文章评论了 Camille Peri 的著作《更狂野的海岸》，讲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及其妻子范妮的婚姻。文章认为，范妮这位年长、非传统的美国女性，对史蒂文森的文学成就和生存至关重要。详细描述范妮遇路易斯前的艰难生活及路易斯早期形象。路易斯史诗般的加州之行迫使他过上“更宏大”生活。文章强调范妮作为护士、医生、第一读者和合作者的作用，认为没有她，史蒂文森不可能创作出主要作品。突出了他们非传统生活方式、共同创造经历及范妮的韧性。评论赞扬该书为范妮正名，并富有同情心和活力地描绘了他们复杂的婚姻。

## Consider the Boor

这篇文章评论了 Jo Hamya 的小说《伪君子》，通过女儿 Sophia 的戏剧揭露其著名小说家父亲的缺点，探讨权力、性别和代际冲突。文章对比历史人物（如弥尔顿）与女儿的可能怨恨，类比 Sophia 为父抄写手稿经历。小说设定在父亲看剧时，穿插闪回。评论探讨小说将父定位为思考/同情对象，同时揭露其问题行为。置于 #MeToo 背景下，但 Hamya 不站队、拥抱道德模糊。强调小说探索同情作为权力形式（使有权者变小），赞扬 Hamya 技巧及模糊确定性、促读者反思的勇气。

# The Atlantic (2024-10-02)

## The Insurrectionists Next Door

文章深入探讨了美国右翼围绕“1月6日事件”参与者构建的新神话，聚焦于作者的邻居——阿什利·巴比特的母亲米基·维特霍夫特和盖伊·雷菲特的妻子妮可·雷菲特。文章描述了她们在华盛顿特区监狱外为1月6日囚犯举行的日常守夜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将参与者塑造成“爱国者”和“政治犯”。作者通过与这些女性及其圈子的互动，揭示了她们的悲伤、愤怒以及对阴谋论的接受，探讨了这场运动如何将个人悲剧转化为政治燃料，并吸引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右翼知名人士的支持。文章反思了与持有激进观点的邻居共处带来的挑战，以及这场运动对美国政治文化和未来潜在政治暴力的影响。

## Why Mike Lee Folded

本文分析了犹他州参议员迈克·李在唐纳德·特朗普时代令人费解的政治转变。文章回顾了李在2016年曾是特朗普的坚定反对者，甚至试图阻止其获得共和党提名，并公开表达对特朗普专制倾向的担忧。然而，到2020年，李却成为了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积极协助其推翻选举结果。作者探讨了导致这一转变的可能原因，包括李对右翼认可的渴望以及与同州参议员米特·罗姆尼的竞争。文章指出，李的转变不仅背离了他曾珍视的宪法原则，也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的普遍屈服。最后，文章讨论了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迈克·李可能担任司法部长一职，以及这对美国司法独立构成的潜在威胁。

## The Man Who Will Do Anything for Trump

文章聚焦于卡什·帕特尔，一位在特朗普政府中迅速崛起但缺乏经验的律师，他因对特朗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忠诚而引起了许多高级官员的警惕。文章描述了帕特尔如何被视为一个只专注于取悦特朗普而非遵循制度规范的人，以及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等官员为何反对他担任关键职位。文章详细介绍了帕特尔离任后的活动，包括利用与特朗普的关系进行商业活动、推广阴谋论以及公开表示愿意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追查其政治对手。文章认为，帕特尔代表了特朗普可能依赖的那类忠诚者，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执行总统的意愿，这预示着如果特朗普再次执政，可能会出现以报复为驱动的政治议程。

## ‘That’s Something That You Won’t Recover From as a Doctor’

本文探讨了爱达荷州等地的严苛堕胎禁令对妇产科医生及其提供医疗护理能力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文章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医生如何在胎儿无法存活或母亲健康面临风险时，因法律模糊和害怕被起诉而被迫延迟或拒绝提供堕胎服务。文章采访了多位医生，包括一些自认为是“支持生命”的医生，他们都对禁令缺乏医疗豁免表示担忧，并描述了由此产生的道德困境和心理压力。文章指出，这些法律导致医生大量流失，加剧了医疗资源短缺，迫使医院不得不将危重孕妇空运到其他州接受治疗。文章强调，无论医生个人对堕胎持何种观点，现行法律都迫使他们在法律风险和患者生命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这种经历对他们造成了深刻的创伤。

## Inside the Dangerous, Secretive World of Extreme Fishing

文章深入探讨了蒙托克地区一种名为“湿衣钓鱼”的极限运动，即渔民穿着湿衣在夜间或恶劣天气下游泳或涉水到达离岸岩石，以捕捉条纹鲈鱼。作者作为这项运动的参与者，描述了其固有的危险性，包括汹涌的海浪、强劲的洋流以及日益增多的鲨鱼。文章介绍了该领域的知名人物布兰登·索塞尔，分享了他与鲨鱼的惊险遭遇和对这项运动的执着。文章探讨了这项运动的衰落原因，包括蒙托克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条纹鲈鱼数量的下降以及鲨鱼的威胁。文章还深入分析了参与者的心理动机，将其描述为一种近乎成瘾的追求，一种在危险中寻找刺激和意义的方式，并反思了这种古老而危险的捕鱼方式与现代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 The Judges Who Serve at Trump’s Pleasure

文章探讨了美国司法独立的根基及其当前面临的威胁，追溯了建国先辈对法官效忠于统治者的担忧，并与波兰近期司法独立的倒退进行对比。文章指出，美国宪法通过终身任期和薪资保护等机制确保联邦法官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正受到部分法官自身行为的侵蚀，他们似乎更倾向于效忠特定政治人物（尤其是特朗普）而非法律本身。文章引用特朗普任命的法官艾琳·坎农的裁决等案例，说明这种现象对法治的损害。通过波兰的例子，文章警示了司法规范可能迅速瓦解，导致法院沦为政治工具的危险。尽管美国体系更为稳固，但文章认为，当前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可能导致司法系统失去公众信任，并为未来的政治危机埋下隐患。

## To Understand Mississippi, I Went to Spain

作者通过追溯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历史源头，探讨了该地区暴力和不平等的深层原因。文章以西班牙探险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于1544年绘制的第一批该地区地图为起点，作者前往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印度档案馆亲手查阅这份地图。文章认为，这张将三角洲描绘成“空地”的地图，象征着欧洲殖民者对这片土地进行资源掠夺和商业开发的意图，从而开启了一系列塑造该地区历史的事件，包括原住民社区的消失、基于奴隶制和佃农制的棉花经济兴起，以及埃米特·蒂尔谋杀案等暴力事件。文章强调，理解密西西比的历史需要将其置于全球资本流动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宏大背景下，揭示隐藏在地方叙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驱动力。

## Men on Trips Eating Food

文章分析了由菲尔·罗森塔尔、尤金·利维和斯坦利·图奇等中年好莱坞男星主持的旅行美食节目的流行现象。文章描述了这类节目的共同特点：优美的风景、诱人的食物特写以及轻松愉快的氛围。作者认为，这些节目在当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提供了一种“反文化”的体验，传递着友善和包容的精神。文章特别提到了柯南·奥布莱恩的旅行节目，认为他以更狂野、更自嘲的方式突破了这一类型。通过对比，文章探讨了这些节目深层的主题，可能是在一个感官和情感都变得迟钝的世界中，通过美食和旅行来寻找强烈体验的尝试，以及对节目本身模式的戏谑和反思。文章认为，柯南的节目或许更接近这类节目核心的某种荒诞感和对真实的追求。

## Rachel Kushner’s Surprising Swerve

文章评论了雷切尔·库什纳的最新小说《创造之湖》，并将其与她之前的作品进行对比，指出作者在角色塑造和主题探索上的显著转变。库什纳之前的作品常塑造在男性主导环境中挣扎求生的女性主人公，她们通常以冷漠和强硬作为防御机制。然而，《创造之湖》的主角萨迪·史密斯，尽管表面独立强大，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脆弱和易感。文章认为，库什纳通过让萨迪的情感崩溃，进行了一次“大胆的作者性飞跃”，开始探索脆弱中蕴含的力量，并以新的方式挑战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小说从惊悚叙事转向对主角内心转变的情感刻画，表明库什纳愿意在写作中触及更深层次的情感，并探索女性在摆脱性别束缚后的新可能性。

## Yuval Noah Harari’s Apocalyptic Vision

文章评论了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新书《连接：从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信息网络简史》，重点关注其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末日式警告。文章回顾了赫拉利作为畅销书作家的崛起及其在硅谷的影响力，并指出他新书中的观点比以往更为悲观。赫拉利认为，信息流的增加并未带来更多真理或智慧，反而加剧了监控和暴政。他将人工智能的出现描述为可能毁灭人类意识的威胁，并批评其开发者对这一“外星智能”缺乏理解和控制。然而，文章也质疑赫拉利过于宏观的视角，认为他忽视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具体经济和政治力量，以及大型科技公司对知识生态的侵蚀。文章认为，赫拉利的警告虽然引人注目，但在如何避免这些危险方面提供的具体建议不足，且其叙事风格可能无意中模糊了责任主体。

## The Anti–Rock Star

文章探讨了莱昂纳德·科恩作为“反摇滚明星”的独特地位，以及他的音乐如何与摇滚乐坛盛行的男性自我中心主义形成对比。文章回顾了科恩职业生涯的几个阶段，包括他作为诗人出道、对自身魅力的警惕、以及在音乐道路上的摸索。文章指出，科恩与猫王等同龄摇滚巨星不同，他的音乐从未迎合青少年对救世主式偶像的崇拜，而是根植于对普通经历和失败感的深刻体悟。文章强调，科恩通过不断挑战自我、改变音乐风格（如放弃吉他转向合成器），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声音，其作品充满了对人类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和温柔接纳。文章认为，科恩的晚期作品，尤其是《我是你的男人》和《你想它更黑暗》，以其对社会弊病的批判和对死亡的坦然，恰好迎合了厌倦了摇滚明星式自大的听众，最终使他在晚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认可，成为一个象征着成熟、谦逊和人性的偶像。

## The Commons: Phoenix Isn’t Doomed to Evaporate Into the Blistering Sun

本栏目汇集了读者对《大西洋月刊》此前文章（特别是关于凤凰城的报道）的回应。读者们就凤凰城的未来、水资源挑战和历史叙事展开讨论。有读者认为，应将图森和皮马县与凤凰城进行对比，以更全面地理解亚利桑那州的情况。另有读者强调创新和技术在解决水资源问题中的作用，认为凤凰城可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范例。还有读者批评了文章中关于霍霍卡姆文明“消失”的神话，指出这忽视了原住民在沙漠中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此外，栏目还包括了关于杂志封面艺术的背景介绍和对之前文章的勘误。

# The Atlantic (2024-11-02)

## How Do You Forgive the People Who Killed Your Family?

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三十年后，幸存者与施暴者如何共存以及宽恕的可能性。作者克林特·史密斯访问了卢旺达，通过与大屠杀参与者侯赛因·隆戈隆戈和幸存者塞尔日·瑞维甘巴等人的对话，展现了创伤的持续影响和和解的复杂性。隆戈隆戈曾参与杀害数百人，他声称自己被胡图族极端宣传洗脑，但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在出狱后试图与受害者家属和解。瑞维甘巴在大屠杀中失去了数十位亲人，包括被隆戈隆戈团伙杀害的父亲和兄弟。他努力理解施暴者的动机，并思考宽恕作为一种自我疗愈的选择，尽管他认为许多施暴者并未真正承担责任。文章描述了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和穆兰比大屠杀纪念中心等场所，特别是穆兰比纪念中心展示的经过处理的遇难者遗体，引发了关于如何纪念暴行、是否应展示残酷真相的讨论。一些人认为这是反驳大屠杀否认论的必要证据，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损害了死者的尊严。文章还回顾了卢旺达种族仇恨的历史根源，特别是殖民时期加剧的胡图族与图西族分裂，以及大屠杀后的加卡卡（Gacaca）社区审判体系，该体系在处理大量案件的同时，其公正性和效果也存在争议。最后，文章指出，尽管卢旺达政府推行和解政策并试图消除民族身份区分，但大屠杀的伤痕依然存在，幸存者与施暴者之间的不信任感并未完全消失。宽恕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更多地被视为幸存者为了自我保护和继续生活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遗忘或完全信任的标志。

## The Playwright in the Age of AI

本文是一篇关于剧作家阿亚德·阿赫塔尔（Ayad Akhtar）的新剧《麦克尼尔》（McNeal）及其对人工智能时代创意挑战的探讨。文章记录了作者杰弗里·戈德堡与阿赫塔尔、导演巴特利特·谢尔和主演小罗伯特·唐尼的对话。该剧以一位著名作家在近未来人工智能威胁下崩溃的故事为背景，探讨了创意、抄袭和原创性等议题。阿赫塔尔本人在创作过程中使用了大型语言模型（LLMs），并认为它们是人类作家的潜在工具，而非简单的威胁。对话中，小罗伯特·唐尼将该剧主题与他在《复仇者联盟：奥创纪元》和《奥本海默》中的角色联系起来，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人类对理解和被理解的渴望。导演谢尔认为该剧的核心是主人公的悲剧，而人工智能是探索这一悲剧的载体。阿赫塔尔指出，该剧试图捍卫艺术的价值，即使艺术是由有缺陷的人创作的，同时也触及了身份、代际冲突和取消文化等当代议题。文章讨论了人工智能对艺术领域的潜在威胁，但小罗伯特·唐尼和谢尔对戏剧的未来相对乐观，认为导演的工作复杂且需要整合多种活动，而戏剧的现场性和人类互动是人工智能难以复制的。阿赫塔尔承认技术发展迅速，但将其视为技术长期以来改变人类认知和社会的延续。他甚至透露，该剧结尾的台词部分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他将其视为一种合作，旨在让观众体验到人工智能生成语言时可能产生的惊奇感。尽管存在争议，阿赫塔尔认为在一部关于人工智能的戏剧中使用人工智能是合乎逻辑的。最终，文章强调了人类创造力中不可或缺的直觉、对无聊的低容忍度以及在合作中产生的火花，认为人工智能已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艺术的任务是反映这一新的现实。

## The Rise of the Right-Wing Tattletale

本文探讨了美国右翼，特别是在德克萨斯州，如何通过立法和政策鼓励公民互相举报，从而构建一个“告密者国家”（Snitch State）。文章以马库斯·席尔瓦起诉帮助其前妻堕胎的朋友为例，揭示了保守派律师乔纳森·米切尔等人在推动此类法律中的作用，这些法律为成功举报堕胎行为的人提供经济奖励。作者指出，这种策略已扩展到LGBTQ议题、学校课程等领域，旨在通过侵入性的强制手段强加保守价值观。尽管许多文化议题上的公众舆论偏向自由派，但这些政策制造了寒蝉效应，使人们因害怕被举报而不敢寻求特定服务或表达某些观点。文章将这一趋势与美国历史上的“红色恐慌”时期相比较，当时政府鼓励告密，惩罚被视为颠覆性的言论和行为。当代保守派使用“反觉醒文化”和“保护儿童”等说辞来合理化其极端措施，甚至公开赞扬匈牙利等非自由主义政权。数字时代加剧了这一问题，个人在线活动（如位置、搜索记录）使人们成为非自愿的告密者。文章列举了“告密者国家”在德州的具体表现：州长格雷格·阿博特下令调查跨性别未成年人的父母是否构成虐待，鼓励公众举报，导致家庭遭受创伤并被迫迁离；学校中针对种族和LGBTQ议题的审查和禁书运动，利用模糊的法律语言鼓励家长和学生举报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导致相关书籍被下架，甚至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失业；医生因担心被举报而不敢讨论堕胎选项，即使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迫使女性不得不前往其他州寻求医疗服务。文章认为，这种恐惧和不确定性主要在保守派占主导的地区盛行，但也可能在共和党总统执政下扩展到全国范围，引用了“2025计划”中关于清洗联邦政府、利用联邦执法部门针对政治对手和限制堕胎及跨性别医疗的提议。最终，作者认为，尽管保守派谴责“取消文化”，但他们正在通过国家权力构建自己的取消机制，这种以“自由”之名推行的政策，实际上是通过恐惧和互相举报来强制推行压抑的政治和社会一致性。

## Inside the Carjacking Crisis

本文聚焦于华盛顿特区及周边地区日益严重的劫车犯罪，探讨了犯罪浪潮背后的原因、执法部门的应对以及关于刑事司法体系的辩论。文章以受害者香提斯·萨默斯的可怕经历开篇，她被青少年持枪劫车，而施暴者却未受到严厉惩罚，这反映了许多受害者的沮丧。劫车已成为该地区的一个主要问题，许多案件由青少年实施，且累犯现象普遍。文章介绍了乔治王子县警方的劫车干预特遣队，这支精英部队致力于打击犯罪，其成员经常面临危险。劫车激增的原因复杂，包括新冠疫情期间学校关闭导致青少年失管、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的警察改革限制了执法能力，以及警察在反警情绪高涨的环境中工作积极性下降。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特别是华盛顿地区的劫车案显著增加，影响了各阶层人群。文章回顾了“劫车”一词的出现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联邦罪行的历史，指出劫车犯与传统盗车贼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文章分析了劫车犯的特点，许多是来自经济欠发达社区的青少年，其中不少人本身也是虐待或忽视的受害者。关于青少年司法体系的辩论是文章核心之一。警方和部分社区成员认为，体系过于“溺爱”，缺乏有意义的惩罚，导致高累犯率，呼吁对持枪劫车等严重罪行实行强制最低刑期。然而，司法改革倡导者认为，单纯惩罚忽视了贫困、创伤等根本原因，且将青少年更深地卷入司法体系反而可能增加犯罪率。文章指出，公众情绪在2020年支持警察改革后，随着犯罪率上升迅速转向“严打”立场。文章提出了“既要也要”的平衡方法，即在严厉起诉暴力犯罪者的同时，投资解决贫困社区的根本问题。尽管近期数据显示劫车案有所下降，警方和检方将其归因于特遣队和成功起诉，但改革者警告不要重蹈过去失败政策的覆辙。文章最后强调，一些学生对劫车态度随意，而受害者和施暴者（许多本身也是受害者）都面临困境，如何在社区安全与青少年改造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 The Israeli Artist Who Offends Everyone

本文介绍了以色列艺术家佐娅·切尔卡斯基-恩纳迪（Zoya Cherkassky-Nnadi）的生平、艺术风格及其在当前以色列社会和国际艺术界面临的挑战。佐娅是一位受欢迎的画家，以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尖锐批判和讽刺性肖像画闻名，她关注移民、性工作者等被忽视的群体。作为来自乌克兰的移民，她认为自己在以色列社会中是局外人，这种身份认同深刻影响了她的创作。她的作品常常挑战禁忌，例如她曾创作讽刺拉比权威、影射反犹血祭诽谤的作品，以及描绘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残酷行为的作品。她2018年的展览“真理报”以讽刺手法描绘了苏联移民在以色列的经历。然而，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发生后，佐娅创作了一系列描绘以色列受害者痛苦的画作。这些作品在纽约展出时引发了抗议，她被指控为以色列做宣传，忽视加沙的巴勒斯坦受害者。佐娅对此回应强硬，批评抗议者，并表示她可能会创作关于巴勒斯坦受害者的作品，但她首先需要处理自己经历的创伤。文章描述了她10月7日系列作品的风格：阴郁、表现主义，借鉴了描绘苦难的历史画作。文章还探讨了针对以色列艺术家的文化抵制运动，这场运动在10月7日后加剧，导致以色列艺术家在国际上受到排斥。佐娅本人对以色列的未来感到绝望，不仅担忧外部威胁，也对国内政治分裂和右翼政府的行为感到不安。她认为自己夹在10月7日的创伤和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之间。文章回顾了佐娅的艺术发展，从概念艺术转向具象绘画，以及她早期作品《犹太藏品》如何通过挑衅性地使用反犹符号来探索扭曲的犹太自我认知。尽管她的作品具有争议性，但文章认为其提供了对以色列复杂现实的细致描绘，而抵制运动可能导致这种宝贵视角的丧失。文章最后指出，佐娅目前正努力应对当前的现实，她的艺术和个人经历都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在创伤和冲突中的挣扎。

## The Case for Kamala Harris

本文是《大西洋月刊》对卡玛拉·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表示支持的社论。杂志指出，这是其1857年创刊以来的第四次总统背书，前三次分别是1860年的亚伯拉罕·林肯、1964年的林登·B·约翰逊以及2016年和2020年的民主党候选人。杂志明确表示，支持哈里斯的首要原因是为了阻止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认为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生存威胁，其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以及其在第二任期的计划都证实了这一点。文章将特朗普描述为具有恶意、政治危险、反复无常且寻求巩固前所未有权力的人。杂志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立场坚定，选举结果将取决于少数摇摆选民。此次背书并非基于具体的政策立场，因为杂志内部对此存在分歧，而是基于哈里斯的品格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尊重。文章赞扬哈里斯致力于公共服务，尊重法律和宪法，信仰所有美国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未受腐败玷污，不以言行令同胞蒙羞，不挑拨离间，不讨好独裁者，并坚信民主。杂志认为，选择哈里斯并击败特朗普是摆脱当前“政治噩梦”的唯一途径，也是让共和党恢复健康（回归里根、多尔、麦凯恩等人的理念）的必要步骤。文章向那些对两位候选人都不满意的选民喊话，无论是保守派、进步派还是想放弃投票的人，强调击败特朗普是实现任何政治变革或恢复常态的必要第一步。文章将投票视为公民的责任，并指出不作为也是一种行动。特朗普被比作阻碍美国走向更光明未来的“斯芬克斯”，而击败他的“答案”掌握在每一位美国选民手中。

## The Elite College Students Who Can’t Read Books

本文探讨了美国精英大学教授们观察到的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新生似乎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阅读整本书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戴姆斯注意到，过去十年间，学生们对阅读量感到不堪重负，尤其难以完成每学期多本书的阅读任务。这不仅仅是难度问题，而是学生们似乎缺乏阅读长篇文本的技能或习惯，这可能与他们在高中阶段未被要求阅读整本书有关。许多其他大学的教授也报告了类似经历，学生们在理解复杂文本、保持专注和坚持阅读具有挑战性的材料方面存在困难。文章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潜在原因：智能手机和数字干扰降低了学生对无聊的容忍度和持续专注的能力；K-12教育的转变，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共同核心”等教育改革，强调信息性文本和标准化考试格式，导致教师减少了整本书的教学，转而使用节选和短篇文章；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转变。文章指出，虽然一些社区大学面临基本的识字问题，但精英大学的问题在于学生能够解码文字，但缺乏阅读大量文本所需的“注意力和抱负”。面对这一困境，大学教授们不得不调整教学，减少阅读量，降低期望。文章认为，这一趋势与学生价值观的转变有关，他们更关注就业前景和职业导向的学位，从而减少了在人文学科阅读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文章强调，阅读整本书籍不仅仅关乎出版业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培养同理心、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等重要的心智习惯，这些是浅层阅读或短时阅读无法替代的。文章最后指出，尽管有少数例外，但普遍情况是年轻一代阅读书籍越来越少，这可能导致他们错过理解复杂思想和人类状况的宝贵机会。

## Scent of a Man

本文是对阿尔·帕西诺新回忆录《桑尼男孩》（Sonny Boy）的书评，探讨了这本回忆录揭示的演员本人及其表演艺术。评论者首先描述了帕西诺作为演员独特的个人魅力：深邃的眼神、厚重的手、标志性的嗓音、独特的表演节奏以及充沛的能量。文章引用了回忆录中帕西诺与弗兰克·塞尔皮科（他在电影《塞尔皮科》中饰演的角色原型）的一段对话，塞尔皮科解释他为何不收受贿赂时说：“当我听贝多芬时，我将成为谁？”评论者认为这句话触及了艺术家的本质和正直的核心。评论者指出，尽管帕西诺扮演了许多标志性角色，但公众对他本人了解甚少，并质疑他在表演中是否从未脱离“阿尔·帕西诺”本身。回忆录揭示了帕西诺的成长背景：在南布朗克斯贫民区的艰难童年、一位敏感而困扰的母亲、叛逆的青少年时期以及充满酗酒和波西米亚式不确定性的青年时期，但他也怀揣着强烈的命运感。他的表演植根于方法派，利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和从真实生活中继承的情感。文章讨论了帕西诺的几个重要角色：《教父》中的迈克尔·科莱昂，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需要扮演一个起初缺乏形态但后来变得极其危险的角色；《炎热的下午》中的桑尼·沃齐克，他成功地将环境的混乱能量融入角色；《闻香识女人》中的弗兰克·斯莱德中校，他后期的夸张风格恰好完美地服务于这个角色。评论者认为，在帕西诺的一些后期电影中，他似乎处于一种“炽热的自动驾驶”状态。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关于帕西诺“普通行为”的片段，显示他服务于自己的表演事业，但可能为了保护其表演核心的“珍贵神秘感”而有所保留，没有进行过多的自我分析。

## Alan Hollinghurst’s Lost England

本文是对英国作家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新小说《我们的夜晚》（Our Evenings）的书评，并将其置于他之前作品和主题的背景下进行分析。霍林赫斯特被誉为英国最优秀的在世散文作家之一，常因其作品的广度、对阶级的深刻理解和优美的文笔而被比作亨利·詹姆斯。他早期的小说如《游泳池图书馆》和《折叠星》因其精湛的文笔和对同性性行为的坦率描写而引起轰动。他的作品主题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层面，尤其是在《美的线条》中，该书讽刺了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并哀悼了失去的纯真，同时也触及了艾滋病危机。在《美的线条》之后，霍林赫斯特的小说性描写减少，更多地探讨时间、记忆和真相的难以捉摸等主题。新小说《我们的夜晚》重访了《美的线条》中的一些主题，特别是政治主题，但以更长远、更清醒的视角审视了当代英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混血演员大卫·温的成长故事，他努力融入英国的阶级体系。温是一个局外人，在追求演艺事业的同时，努力应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持续存在的偏见。小说探讨了虚伪、表演以及实现情感亲密关系的困难，将温的真诚与他人的伪装形成对比。书名《我们的夜晚》暗示了一种衰落或黄昏感，既指人物的个人生活，也指英国的国家状态（脱欧、社会动荡）。评论者认为，《我们的夜晚》可能是霍林赫斯特最悲伤的作品，传达了一种未实现的生命和失去的田园诗般过去的哀愁。评论者认为该书并非霍林赫斯特最出色的作品，但其对时间影响以及在变化、活力减退的英国中应对身份和亲密关系的挑战的探索是感人的。文章还注意到小说中性描写减少，这可能反映了作者关注点的转变，或者认为之前打破的界限已不再需要强调。

## You Are Going to Die

本文是对奥利弗·伯克曼（Oliver Burkeman）新书《凡人的冥想》（Meditations for Mortals）及其先前作品的评论。伯克曼凭借畅销书《四千周：凡人的时间管理》而闻名，该书通过强调人类生命的有限性（约四千周）来挑战传统的时间管理和效率观念。他的核心思想是，试图“掌握”时间或“完成所有事情”是不可能且徒劳的陷阱；相反，人们应该接受自身的局限性，并将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这种方法吸引了那些对传统自助书籍持怀疑态度的人。新书《凡人的冥想》是一本为期28天的指南，旨在帮助读者内化生命的有限性并拥抱局限。评论者采访了伯克曼，他谈到了自己从对效率技巧的玩世不恭转变为更真诚地接受脆弱性，并认识到生活中“严肃而温柔”的一面。伯克曼认为，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与对失去控制的恐惧有关，而现代对效率的关注将生活变成了一种需要“熬过去”的状态，而不是去真正体验和居住。他激进的建议是容忍无法完成所有事情的不适感，并培养对“问题”的兴趣，将其视为生活的基础。新书《凡人的冥想》将实用技巧与哲学思考相结合，旨在帮助读者获得一种“切实的领悟”，而不仅仅是智力上的理解。该书围绕“有限性”、“行动”、“放下”和“呈现”等主题展开，鼓励读者直面他们对当下时刻以及生活不可预测性的恐惧。评论者认为伯克曼的方法既令人不安又令人安心，它提供了一种通过放松而非克服困难来获得慰藉的方式。文章最后指出，伯克曼关于生活问题无法真正解决的信息，反而促使读者寻求更多建议，这是一种悖论。评论者表示，随着伯克曼的思想逐渐渗透，她也慢慢接受了生活固有的混乱和有限性，并准备好迎接随之而来的“令人振奋的不适感”。

## Malcolm Gladwell, Meet Mark Zuckerberg

本文评论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新书《引爆点复仇》（Revenge of the Tipping Point），批评其未能充分考虑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社会传染和变革的影响。格拉德威尔的首部著作《引爆点》（2000年）通过三个规则（少数人法则、附着力因素、背景力量）解释社会传染，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反映了当时乐观、互联网尚未主导的时代背景。然而，该书的例子依赖于传统传播途径，缺乏对当今“失控式病毒传播”的描述。评论者原本期待《引爆点复仇》能探讨数字革命如何复杂化了这些规则，但格拉德威尔在新书中基本忽略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新书侧重于规则如何被操纵，并引入了“上层故事”（Overstory）的概念，将其视为引爆点的关键背景。文章批评格拉德威尔对“上层故事”概念的应用过于笼统且不足，尤其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以一个看似“单一文化”郊区青少年自杀群发事件为例，评论者认为格拉德威尔未能考虑社交媒体、在线内容等虚拟力量的显著影响，这些力量可能构成相互竞争或强化的“上层故事”。格拉德威尔坚持认为社会传染“并非失控”，有单一来源，这与数字传播的混乱和不可预测性相悖。评论者追溯了格拉德威尔长期以来对数字传播的忽视，引用了他早年关于电子邮件会分散权力以及他后来关于在线活动“弱联系”不足以引发深刻变革的论点。尽管后者在某些方面具有先见之明，但低估了互联网对社会和政治的整体变革性影响。评论者认为，当今主要的传播形式（快速、嘈杂、反应性的数字媒体）以同样混乱的方式塑造着文化和政治。格拉德威尔使用电视节目（如《浩劫》迷你剧和情景喜剧《威尔和格蕾丝》）为例说明“上层故事”如何形成并影响社会，强调电视作为一种广播、被动媒介的力量。然而，评论者指出电视已不再是主导媒介，受众高度分散。当今的社会传染通过快速、互动、常未经筛选的数字渠道发生，产生多重、竞争性的叙事。评论者总结说，格拉德威尔对简洁规则的坚持以及对数字景观的忽视，使得他的分析显得过时，缺乏理解我们所处“光荣而危险的不可预测时代”所需的“谦逊”。

## The Commons: Immigrants Are ‘Normal People Forced to Flee Their Countries’

本栏目汇集了读者对《大西洋月刊》2024年9月号文章的反馈。针对凯特琳·迪克森关于达连隘口移民之路的文章《达连隘口七十英里》，读者们深感触动，赞扬了报道的勇气和新闻工作的扎实。有读者分享了自己作为哥伦比亚裔美国人帮助难民的经历，以及一位高中老师的学生写下穿越达连隘口故事的经历，强调了移民的人道困境和背后的深层原因（如原居住国的恶劣环境和美国政策的影响），呼吁媒体更多关注根本原因而非仅仅边境管控，并反对对移民的负面刻板印象。针对麦凯·科平斯关于特朗普集会祈祷的文章《上帝，帮助我们再次伟大》，一位读者认为分析令人不安，但也看到了特朗普支持者与反对者在极端言辞上的相似性，并建议进步派也表现出准宗教式的狂热和“取消文化”，希望杂志也能分析民主党/进步派的言论。针对索奇特尔·冈萨雷斯关于其革命家母亲的文章《我的革命家母亲》，一位读者（一位社会主义组织者和母亲）批评文章对像她这样的人的生活描绘不切实际且古怪，认为文章将个人经历与政治分析混杂，尤其不满对社会主义解放党总统候选人克劳迪娅·德拉·克鲁兹和卡琳娜·加西亚的简略和轻蔑处理，认为作者压制了这些女性的声音。该读者强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看到资本主义的失败，并认为她们作为母亲的身份在斗争中是优势而非负担。

# The Atlantic (2024-12-02)

## He Was the World’s Longest-Held Death-Row Inmate. He Was Also Innocent.

本文详细记述了日本前拳击手袴田岩男长达半个世纪的冤狱经历及其最终获释的故事。1966年，袴田岩男被指控谋杀四人，审判存在严重缺陷，他被判死刑，并在死刑犯监狱度过了创纪录的50年。期间，他遭受了长达23天的残酷审讯并被迫认罪，身心遭受巨大折磨，最终精神失常。故事重点描写了他90岁的姐姐袴田秀子如何坚持不懈地为他争取重审和正义，以及当年判处他死刑的一位法官熊元德路如何因内疚辞职并支持平反运动。文章揭示了日本司法制度的弊端，如对口供的过度依赖、“人质司法”现象以及重审的困难，指出袴田案成为推动日本司法改革的象征。尽管袴田岩男于2023年最终被判无罪，但漫长的牢狱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他的故事及其支持者的努力，不仅揭示了日本司法系统的深层问题，也鼓舞了更广泛的争取平反和改革的运动，体现了在困难面前信念和坚持的力量。

## How One Woman Became the Scapegoat for America’s Reading Crisis

本文探讨了教育专家露西·考尔金斯如何成为美国阅读危机众矢之的。考尔金斯曾是教育界的明星，其“平衡识字法”（强调培养阅读热爱、独立阅读、利用语境和图片解码）被美国许多学校，特别是纽约市广泛采用。然而，随着国家阅读水平测试结果不佳，考尔金斯方法受到强烈批评，尤其是在播客“Sold a Story”中被指责为不符合“阅读科学”（science of reading），忽视了自然拼读（phonics）重要性。文章指出，“阅读科学”强调显性系统拼读教学。尽管考尔金斯已修改课程加入更多拼读，她仍面临激烈反对，批评者认为其方法对需要结构化教学的弱势学生 ineffective。文章触及教育辩论政治化及更替课程的 costs 和复杂性，质疑简单归咎个人或课程。作者通过对考尔金斯、教师和专家采访，展现了持续 decades 的“阅读战争”的复杂性，以及在寻求教育问题速效方案背景下，考尔金斯如何成为争议焦点。

## The Exhibit That Will Change How You See Impressionism

本文评述了纪念 ấn tượng派首次展览150周年的特展“巴黎1874：印象派时刻”。展览旨在挑战公众对印象派传统认知，即将其视为描绘愉悦光明场景的艺术运动，简单看作打破传统学院派束缚的胜利。文章将印象派兴起置于1870-71年普法战争、巴黎围城和巴黎公社等创伤历史事件背景下。评论家认为，印象派艺术家对短暂瞬间、主观感受及非正式风格（“写意”）的focus，是对那个恐怖和幻灭时代的 response，标志他们从宏大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对当下和个人体验的 captured。展览对比当年印象派沙龙和官方沙龙的作品，揭示双方风格和主题多样性，many artists 同时参与两个展览。文章认为早期印象派的“不妥协”在于拒绝说教，拥抱模糊性和不完整性。这种对视觉确定性颠覆，通过“写意”笔触和非传统构图，强调绘画物质性和 illusion 不稳定性，呼应法国经历的创伤，为20世纪艺术开辟 new path。

## My Hope for Palestine

本文作家萨默·西尼劳伊结合其耶路撒冷生活和以色列监狱服刑经历，对巴以冲突进行深刻反思，展望和平。他反驳冲突不可解，坚信巴勒斯坦建国与两族共存可能，但需双方思维和领导层根本转变。他强调巴勒斯坦人须理解以色列人安全恐惧（尤其是十月七日后），同时以色列人须承认巴勒斯坦人 long-term 被剥夺尊严权利的需求。作者批评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是 peace process 主要障碍，主张 direct negotiation 实现两国方案，而非外力施压。他呼吁巴勒斯坦新联合领导层由改革派和非极端分子组成，并 urged 以色列人 ends 内塔尼亚胡 government。他指出伊朗是 external enemy，批评西方极端立场加剧分歧。作家认为巴勒斯坦人 from their national interest 应优先保障以色列安全，采取“多换多”策略逐步重建信任。他在希伯来大学看到以巴学生互动，从中看到 hope，认为年轻人已具备为邻潜力，只需 right leadership 引导。

## What the Band Eats

本文是Reya Hart，感恩至死乐队鼓手女儿的 personal essay，通过食物描绘乐队巡演回忆与经历。文章以 current 乐队拉斯维加斯Sphere固定演出为背景，对比定点与游走演出感受。作者详细描述巡演中团队用餐 routine——相似菜单，固定菜品（炸鸡、沙拉、素食意面），及这种单调中寻新意尝试。她穿插 many food-related 童年及 work memories，如不同 venue 特色食物及 private food memories（生日蛋糕尴尬，偷拿奶酪）， these all 形构成她独特“路上”生活体验。食物不仅是必需品（父对寿司要求），更是连接团队、标记巡演路线、承载情感记忆 symbol。文章通过食物描绘，展乐队巡演生活节奏、文化及 human relationships。结尾，作者反思巡演后回归 normal life 时，面对简单食物选择反 produced 迷失感，以此象征告别过去生活方式不适与 seeking self。

## Hydraulic Revolution

本文是一篇图文报道，展示摄影师Owen Harvey拍摄洛杉矶低底盘汽车（lowriding）场景。Lowriding自上世纪40年代起在墨西哥裔美国人群流行，通过改装 vehicle 使 vehicle 离地面极近。因加州曾禁 lowriders，认为其与 gang violence 相关，此爱好 thus 具反叛和文化 pride 意味，并在警方骚扰下发展。文章提及加州州长2023年10月废禁令使其 legal。照片 captured 定制改装 lowriders 及 hydraulic system（使车“跳跃”）细节。文章 citing 几位低底盘汽车爱好者的故事（Erik Rodriguez, Carmen Vera），showing 个人对此爱好热爱、投入（包括 Carmen Vera 通过其 business 为改装车融资）及 as a form of self-expression, overcoming prejudice and doubt（ especially for female enthusiasts）。全篇通过 visual 和 text 共同呈现这项 unique 汽车 culture 及背后蕴含的 community spirit 和 identity。

## Nick Cave’s Revised Rules for Men

本文深入探索音乐家尼克·凯夫 in the wake of personal tragedy (两子去世) 及其 aging 如何 transformed his artistic output 和对男性气质、悲痛和人性的视角。凯夫早期作品以黑暗、暴力、explicitly masculine 主题著称，但近年音乐（如《Ghosteen》和《Wild God》）更抒情、脆弱，呈更具“女性特质”声音和 viewpoint，融入 ഭാര്യ共同分担悲痛 experience。文章记述其从 misanthrope 转变为人道主义者，seeking connection 和 redemption。通过其博客“The Red Hand Files”，凯夫表现出 for others 提供慰藉、在 suffering 中寻 meaning 的愿望，与他 perceive 的 nihilism 对比。文章分析他对 Jordan Peterson 等 figure 从 interest 到 disappointment 的转变，认为他们 involved in extreme culture wars。评新专辑《Wild God》指出其 Gospel/piano-pop style，主题 navigation sorrow towards joy，finding self worth，and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凯夫视 art as a force against reductive binaries，re-enchanting the world，believing music can redeem个体。

## Richard Price’s Radical, Retrograde Novel

本文评理查德·普莱斯小说《拉撒路人》，认为其虽具 urban social realism 元素（工人阶级、少数族裔人物 navigating 困境），但因拒绝当代 literary tropes 故 radical/retrograde。Price 不将人物 simple 刻画为 structural forces 受害者（racism, poverty...），反 emphasis 在挑战环境中的 individual agency 和 moral choices。倒塌 building 虽 central event， less important than characters' internal responses 和 meaning-seeking。主角 Anthony Carter (幸存者) 发展 catastrophe as gift 哲学，但小说 subtly critiques 此 idea，示转变是 chosen，非 events 神奇赋予。文章赞其聚焦“微型顿悟”，捕捉揭示 personality 和 truth 的细微瞬间。Price 避免 political context 评论， deliberately 作为白人作家写黑人 urban life，挑战convention。小说 being praised as a defense of humanism，holds characters accountable 同时承认 social pressures，Leaving them in a state of chosen, uncertain transformation。

## The Genius of Handel’s Messiah

本文探索亨德尔神剧《弥赛亚》在西方 classical music 中 enduring power 和 unique place。 Handel 是首位自 lifetime 作品（primarily 《弥赛亚》）持续 popular 的作曲家。 《弥赛亚》作为 masterpiece， globally 爱好者和专业人士 widely performed， even non-classical listeners 熟悉（如哈利路亚 chorus）。评查尔斯·金书《在每个山谷中：造就亨德尔《弥赛亚》的绝望人生与 troubled 时代》，深入创作背景，强调 librettist 詹宁斯 crucial作用，其汇编 based on scripture, plotless 剧本，文章称《弥赛亚》为无叙事神剧的 eccentric 作品。金书连结《弥赛亚》在苦难中寻希望主题与当时人们艰难生活（包括歌手西伯个人 suffering）甚至 slave trade 等 broader issues。文章评论亨德尔作为 prolific 作曲家 talent，擅 dramatic effects, text painting, skillful borrowing， arguing 《弥赛亚》power 在于融合“高雅与通俗”，以 simpleseeming 手法达 transcendentffects。

## The Magic Mountain Saved My Life

本文作家乔治·帕克讲述托马斯·曼小说《魔山》如何在他 as Peace Corps volunteer in West Africa 期间，provided solace and purpose during a period of 严重焦虑和抑郁，他 described 那段 as a terrifying “意义虚空”。将自己 disorientation experience 和主角汉斯·卡斯托普在高山疗养院 time and reality warp，被迫 confront 存在主义问题 parallel。 vurgūs 小说探索 time, illness, death， ideas Clash（Settembrini vs Naphta），以及曼写作小说过程中 political and artistic evolution，从 conservative aesthete转向民主和人道主义 defendern， especially after WWI and rise of Nazism。曼在小说中 Message，通过汉斯·卡斯托普雪中梦，not to let death or reason dominate thought，embrace “brotherly love” 和 human dignity。帕克觉得此 Message startlingly relevant today，an age of self-contempt, polarization，forces diminishing human dignity，抵抗这些需 belief in our shared humanity as a foundation deeper than politics。

## Falling in Love With Reading Will Change Your Life

本文是杂志“公共事务”栏目，集读者对去年11月《 unable 阅读整本书的顶尖大学生们》反馈。读者视点 diverse：高中 English teacher 将问题归因课外负担重与学校限 home reading time； psych professor 认大学招生标准 neglect 阅读 experience； retired English teacher share 其让学生自选 YA books for independent class reading foster reading love 成功经验； educator 提公立学校 budgettight，can't afford enough books for home read； college history professor sharing heartwarming story of a student lifelong became avid reader through his course option。原文作者 acknowledge systemic pressures (careerism, overcheduling) 及 curriculum changes difficulties，但 find hope in stories like the latter, validating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reading a book.

## Failed Elegy

这首诗是马修·扎普鲁德的“失败的挽歌”。诗人反思在充斥 losses 和环境 crisis（如“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世界中，创作挽歌的 difficulties 和 pointlessness。诗人 question 写作意义（“写这个有什么用？”），feelings powerless，甚至 guilt（与排放 company similarity）。他回忆 past “ridiculous elegy for broken nail clipper” 和 scatter ashes 经历，承认 reality mundane than poem might suggest。他连接这些 personal meditations 与 world state，suggesting poets' attempts to capture meaning or lament feel inadequate，more like arrange deck chairs。 cuối poem refers Emily Dickinson compared herself to wren， suggesting Maybe even small artistic efforts valuable facing crisis，even if feels like “failed elegy”。诗歌通过对挽歌形式的 meta-commentary，expresses art limitations vs persistence facing grand suffering。

# The Atlantic (2025-01-02)

## The Business-School Scandal That Just Keeps Getting Bigger

文章揭露了商学院学术界日益严重的学术不端丑闻，核心人物是哈佛商学院教授Francesca Gino，她因数据造假指控被调查。丑闻引发了她的合著者Juliana Schroeder的自我审计，Schroeder的努力不仅旨在洗清无辜同事的嫌疑，也意外揭示了她自己参与的论文中可能存在的数据问题，包括一篇关于仪式如何降低焦虑的研究。文章指出，商学院心理学领域因其高回报和宽松的研究标准，可能比其他学科更容易出现欺诈行为。尽管Schroeder的透明行为受到赞扬，但丑闻揭示的问题远超个人，涉及更广泛的学术诚信危机，以及追责和解决问题的困难。整个领域弥漫着不信任感，许多学者对现状感到沮丧。

## The Hawaiians Who Want Their Nation Back

文章探讨了夏威夷原住民寻求恢复主权的复杂议题，追溯了1893年美国支持的政变推翻夏威夷王国、直至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一州的历史。作者采访了不同立场的夏威夷人，包括主张完全独立的“夏威夷国”自封总统Dennis Kanahele、认为王国从未合法终止的Keanu Sai，以及主张在现有体系内争取权益的前州长John Waihe‘e和市议员Esther Kia‘āina。文章强调了夏威夷人面临的现实困境，如经济差距、文化流失、土地被外来富豪购买，以及美国军事存在的巨大影响。尽管存在分歧，许多夏威夷人对现状不满，并思考在美国权力可能衰退的未来如何实现自给自足和独立。文章认为，夏威夷的故事不仅关乎历史错误，也反映了美国扩张主义的本质及其对自身价值观的挑战。

## Zamboni

这是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母亲带着儿子在春假期间偶然遇到一个电影拍摄现场，地点就在他们熟悉的学校操场和附近街道。电影剧组搭建并拆毁了一个户外用餐棚，带来了非现实的色彩和静止的孩子群演，打破了日常的熟悉感。母亲对电影的虚幻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感到困惑，尤其是看到一个似乎是真实但又像道具的蓝色椅子餐桌。她试图让儿子参与其中，但儿子更关注现实。故事穿插了母亲对儿子、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以及她与电影明星的短暂交流，明星透露了电影关于一位失去妻子的老师在学校经历的超现实故事。小说通过电影拍摄对日常环境的侵入，探讨了现实与表演、熟悉与陌生、以及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 The End of Democratic Delusions

文章分析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标志着美国进入“特朗普反动”时代，并认为这终结了进步派的两个幻想：一是基于身份政治的人口结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优势，但2024年选举显示少数族裔选民并非铁板一块；二是认为结构性障碍阻碍了多数民意，但特朗普赢得了普选和选举人票。文章指出，民主党已成为建制派政党，与工人阶级脱节，而特朗普代表了反建制的大众运动。作者认为，民主党需要深刻反思并重建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同时也要积极利用公民社会和现有机构对抗特朗普政府可能滥用权力的行为。文章强调，尽管面临挑战，但政治仍需面对面、基于尊重，并且即使在绝望中也要努力改变现状。

## Misogyny Comes Roaring Back

文章认为，特朗普及其盟友（如J.D. Vance、Elon Musk）的崛起和再次当选，标志着美国性别政治中厌女症的卷土重来。作者指出，特朗普竞选团队推广一种男性主导、限制女性自主和地位的愿景，并通过网络平台传播厌女言论。年轻男性选民向右转的趋势令人担忧。文章批评了特朗普阵营对女性的贬低和性化攻击，认为这反映了一种将女性权力与所谓“失控的女性性行为”联系起来的潜意识。作者认为，尽管政府无法强制女性回到过去，但这种厌女思潮正在加剧性别鸿沟。然而，这种对女性自主的压制可能适得其反，促使更多女性选择独立生活，甚至加入拒绝与男性建立亲密关系的运动。文章强调，传统的性别歧视分析已不足以应对当前的仇恨浪潮，并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最终会伤害那些接受其信息的男性。

## America’s Lonely Future

文章批判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认为它背离了二战后美国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和安全的传统。作者指出，特朗普将国际关系视为零和博弈，要求盟友支付保护费，并表现出对独裁者的亲近，同时通过关税等手段推行掠夺性贸易政策。这种做法削弱了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和潜在伙伴的关系，损害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安全。文章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受个人经济利益和与富豪捐助者的关系影响，而非战略考量。历史经验表明，孤立主义和自私的政策曾导致灾难。尽管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美国从“保护者”转变为“掠夺者”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使美国更加孤立和不安全，尽管一些人可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国家再次伟大。

## The ‘Mainstream Media’ Has Already Lost

文章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报纸、电视网络）在当前媒体环境中已失去主导地位。拥有巨大网络影响力的个人，如播客Joe Rogan和科技巨头Elon Musk，已成为新的主流信息源。这些新媒体人物往往不受传统新闻业道德规范和客观性要求的约束，更倾向于通过个人魅力和“氛围”传播信息，而非深入分析政策。文章指出，特朗普等政治人物积极利用这一变化，绕过传统媒体，直接与网络名人对话，这使得竞选更多地依赖口号和个人形象。这种转变有利于政治右翼，他们将传统媒体描绘为带有偏见的“假新闻”，而将自身平台宣传为更真实可信。文章认为，媒体格局的改变导致阴谋论和噪音增多，传统新闻机构难以恢复，未来的信息环境将更加碎片化和党派化。

## No One Has to Settle for Bad Pizza Anymore

文章探讨了家用高温披萨烤箱（如Ooni）的兴起如何改变了家庭制作披萨的可能性。作者作为一名“披萨狂热者”，分享了使用这些烤箱制作餐厅级披萨的体验，指出传统家用烤箱无法达到所需的高温（至少600度，最好650度），而便携式高温烤箱能在短时间内达到950度，实现完美的饼皮和融化的奶酪。文章描述了家用披萨烤箱市场的繁荣，将其比作家庭烧烤的延伸，满足了人们对火焰和烹饪玩具的热爱。尽管制作完美披萨需要技巧和练习，且成本不菲，但作者认为，自己制作的披萨具有独特的价值。文章也承认，有时仍需依赖专业披萨店，但家用高温烤箱的出现无疑提升了家庭披萨的水平，并在疫情期间加速普及。

## Bob Dylan’s Carnival Act

文章评论了关于年轻鲍勃·迪伦的传记电影《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探讨了迪伦从民谣歌手到摇滚偶像的转变过程及其表演性身份。作者认为电影是一则关于艺术残酷性的童话，迪伦通过编造经历、改变形象，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嘉年华”式的人物，一个不尊重现实、擅长魔术般写作的骗子。文章分析了迪伦独特的嗓音和歌词如何切入时代精神，以及他与皮特·西格、琼·贝兹等民谣界人物的关系。迪伦在纽波特民谣节使用电声乐器引发的争议被视为他反叛和颠覆民谣传统的象征。文章强调，迪伦的伟大在于他成为了一个神话和透镜，通过他非凡的洞察力反映时代，并最终抛弃了追随者，教会他们如何在被抛弃中感到振奋。文章以迪伦的故事反思了当前时代是否需要一位新的“末日吟游诗人”。

## America Needs to Radically Rethink What It Means to Be Old

文章讨论了随着人类寿命延长，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老年”和“退休”的含义。作者回顾了美国养老体系的发展，从早期老年贫困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建立后的改善，以及像Sun City这样的退休社区的出现。文章引用两本新书的观点，指出传统的教育-工作-退休三阶段人生模式已不再适用，因为人们的健康寿命也在延长。挑战在于如何确保额外的生命年是健康和富有成效的，以及如何应对养老金和医疗成本的财政压力。文章批评了将老年人视为一个同质群体的观念，主张基于个人需求和能力制定政策，并强调社会需要改变对衰老的负面看法。作者提出“晚期成年”的概念，将其视为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人们可以在此期间继续学习、工作（可能是不那么辛苦的工作）、回馈社会，并享受情感成熟和智慧带来的积极影响。

# The Atlantic (2025-02-02)

## The Army of God Comes Out of the Shadows

本文深入探讨美国基督教的新使徒改革（NAR）运动，其目标是摧毁世俗国家，建立由基督徒主导的上帝的国度。数千万信徒相信现代先知，进行属灵争战，并积极参与政治，尤其与特朗普主义紧密结合。起源于宣教运动，由C. Peter Wagner发展出“七山使命”，鼓励信徒在社会各领域掌握主导权。文章指出，该运动正在迅速吸纳信徒，尽管国家整体更趋世俗，这些信徒却日益激进，渴望改变世界。与MAGA运动结合后，NAR成为右翼重要力量，体现在对Project 2025等政策议程的影响。作者描绘了参与其祷告会的见闻，感受到信徒对“上帝胜利”的狂热，并警惕媒体被视为“邪恶堡垒”。NAR运动最终意在解构世俗政府，这给美国民主带来严峻挑战，体现了在文化变革中，宗教力量寻求掌控的愿望。

## Narendra Modi’s Populist Facade Is Cracking

本文分析印度总理莫迪在2024年大选中失去议会多数地位，其民粹主义策略面临挑战。尽管莫迪强调印度教民族主义并主持修建引争议的罗摩神庙，但这未能弥合印度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文章通过普通公民的视角，展示了高失业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腐败以及偏袒富豪等问题导致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废钞政策和疫情应对失误对小企业造成重创，而保护奶牛的政策在基层引发管理混乱和腐败。文章质疑单靠煽动民族主义能否长期掩盖经济困境和生活水平下降。莫迪的选举结果表明，尽管他通过扭曲体制争取优势，选民开始对其实质性改革的不足感到失望。他不得不依靠联盟伙伴，权力不再绝对。文章认为，印度正成为检验民粹宣传与严峻现实哪者更能影响选票的试验场，莫迪的领导缺陷和未能解决的深层问题正使得其光环褪色。

## American Realism

这篇短篇小说围绕着身患绝症的伊戈尔及其妻子加琳娜在家中举办的晚宴展开，这次晚宴被视为伊戈尔进入临终关怀前的“最后的华章”。主人公卡斯珀因城市抗议活动迟到。派对上，卡斯珀与伊戈尔互动，感受到其临终前的恍惚与不安。他还结识了伊戈尔年轻的欧洲亲戚拉德克，拉德克作为钢琴师演奏了带嘲讽意味的舒伯特，并推荐了勃拉姆斯作品中的沉郁而充满希望的间奏曲。故事借助人物互动探讨了生命、死亡、艺术、记忆和人际连接。在纽约社会动荡和个人悲伤交织的背景下，卡斯珀与拉德克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的联系。文中还穿插了卡斯珀与老友妮娜的对话，揭示了人物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对当前社会事件的不同看法。故事在一次伊戈尔去世后的聚会上重现勃拉姆斯的音乐，呼应了生离死别的沉重与一丝慰藉。最终，卡斯珀与拉德克偶遇并交换联系方式，他们选择在咖啡馆静坐消磨时光，象征着在混乱现实中寻找连接和宁静的努力。

## The New Rasputins

本文探讨“新蒙昧主义”现象在全球崛起，这股反科学、亲威权的政治力量正侵蚀民主。文章以罗马尼亚总统候选人Călin Georgescu为例，他结合健康神秘主义、阴谋论、民族主义与亲俄立场，通过网络传播快速吸粉，挑战传统政治分类。新蒙昧主义表现为融合反疫苗、气候变化否定、QAnon式阴谋论等元素，跨越左右翼界限，共同质疑理性、证据和透明度。文章指出，这种趋势已影响美国高层政治，一些与特朗普相关的要员或盟友（如RFK Jr.）推广伪科学或阴谋论。富有的支持者如埃隆·马斯克也助推虚假信息传播，其动机或为利益或为信念。历史对照俄帝国末期的神秘主义和拉斯普京，文章认为当前剧变、信息混乱和对传统机构不信任的环境滋生了类似现象。新蒙昧主义挑战了基于理性、法律和程序的民主基石，在恐惧中创造了允许魅力型领导者利用情感和操纵的真空。

## What Not to Wear

本文分析了“季节色彩分析”潮流在社交媒体上的复兴。这种理论依据个人肤色等特征将其归入四季，并推荐适合的颜色。作者追溯其从19世纪到80年代畅销书的演变，指出如今在TikTok等平台更为复杂。色彩分析视频走红，满足了人们在信息爆炸、照片泛滥时代对形象指导和确定性的渴望。该理论号称科学，实則更像商业化的伪科学。文章认为，它并非解决形象困惑的灵丹妙药，反而可能因复杂的分类和主观性带来困惑和不满足感，促使人们过度消费并质疑自身判断。这种对外部体系的依赖反映了现代人在追求所谓“最佳自我”时的焦虑，以及在海量信息和完美滤镜下，难以信任自己的审美。最终，这股潮流与其帮助个体建立风格自信，不如说加剧了对外貌的过度关注和不安全感。

## Georgia O’Keeffe at Home

本文通过攝影師托德·韦伯的镜头，展现了画家乔治亚·奥基夫在新墨西哥故居的私人生活。韦伯与奥基夫是多年好友。文章叙述了奥基夫的生活细节，如她为防晒常戴帽子、关心发质、早餐习惯以及对松狮犬的深情，她甚至为爱犬Bo在钟爱的“白色之地”设墓。韦伯还教会奥基夫使用相机。文章特别聚焦于阿比丘住宅那扇标志性的门，奥基夫多次将其入画，并因其独特比例（“对神”而设）而购买下房屋。韦伯拍摄于50-60年代的照片捕捉了奥基夫站在门口、与狗互动以及居家环境的画面，提供了了解这位传奇画家及其与新墨西哥景观深刻连接的罕见窗口。这些照片呈现的日常片段， дополняют艺术家在画布上建构的形象，展现了她在大地景观中的恬淡与独特风范。

## The Saint America Needs Now

文章探讨圣方济各（约1181年生）在当代的启示意义，认为其激进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为现代美国社会提供了一面镜子。圣方济各是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放弃巨额财富，过着彻底贫困并亲吻麻风病人的生活，直接模仿耶稣的教导。文章引用其传记故事，展现其驯狼、向鸟布道等神奇行径，以及他对教会体制的独特挑战——并非言语指责，而是通过自身榜样。在“友善反常”、强调自我关怀的时代，方济各极端的慈善行为以及“快乐地藐视”舒适和安全，构成了对当下的有力反驳。他拥抱被社会排斥的底层，在最低处寻找尊严。文章认为，方济各提醒我们，真正的稳定并非来自世俗安全，而是源自神圣之爱的无限接纳。美国需要这种激进的慈善和禁欲精神，来对抗自恋和逃避痛苦，重寻人性的光辉。

## A Palestinian Story Unlike Any Other

本文评述贝蒂·夏米赫小说《太早》，赞赏其打破传统巴勒斯坦故事的模式。常见叙事侧重流亡与悲情英雄，承载教育读者重负，易趋说教。夏米赫小说则被比作“巴勒斯坦版《欲望都市》”，以反英雄主角、幽默感和复杂性著称。主人公阿拉伯拉，一位导演，夹在象征家族与民族责任的巴勒斯坦男子和代表纽约独立生活的以色列裔美国男子之间，纠结于身份认同。小说不避讳人物缺点，通过主人公的祖母和母亲的故事线，展现同样规避传统的女性形象。文章突出夏米赫对打破刻板印象的努力，通过融入（如埃及犹太人流亡史等）竞争性叙事，呈现更复杂多面的巴勒斯坦身份图景，而非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小说以个人困境切入，而非政治宣传，通过有缺陷、不循规蹈矩的人物，回归对人性本身的探索，可能为巴勒斯坦文学开辟新径。

## Apocalypse, Constantly

文章探究人类对末日经久不衰的恐惧感，及其想象方式随科技发展而演变。从作者童年对核末日的恐惧，到如今年轻人对气候变化的焦虑。Dorian Lynskey的书记述了200年来从天体碰撞到核战、AI失控等末日叙事演变。现代末日故事多含自我谴责，人类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与Adamson笔下相信能预测控制未来的“未来学家”形成对比，后者如Robert McNamara即是过度相信技术规划的失败代表。文章指出气候变化末日虽是现实，但其缓慢不如核战这类突发灾难易戏剧化。历史中未实现的恐惧带来慰藉，身处“最坏时代” conviction seems永恒。文章鼓励面对现实挑战，努力行动而非宿命论，即使当前困境不如核战争那般能激发宏大叙事，但积极应对仍是必要。

## Where Han Kang’s Nightmares Come From

文章探讨了韩国作家韩江及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着重分析其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韩国血腥的过去带来的创伤。理解韩江作品需知其国史，尤其是国家暴力。韩江巧妙将创伤融入个人叙事，影响人物身心甚至自然描绘。重点评述其新作《我们不分开》，以暴风雪为背景，雪象征遗忘与记忆重现。小说围绕女主角探寻济州岛一段被压制的骇人历史展开。文章指出，韩江通过 subtle暗示美国在支持ZF、参与反COMMUNIST行动中的角色。这种回避直接指控的策略反而增强了对韩国专制和外国串谋的批判力。韩江的“全球小说”通过探索历史创伤，成功跨越文化壁垒，引导读者反思自身可能存在的历史责任。

## The Commons: Harvard Didn’t Break America

本部分汇集读者对此前《大西洋月刊》关于精英教育文章的回应及编辑部内容。读者讨论哈佛等精英大学是否应对美国精英体制弊端和社会分裂负责。部分读者认同精英大学招生偏向富裕阶层，加剧不平等。另有读者反驳，认为更广泛的经济因素（全球资本主义、服务经济转型）或经济体制对工人阶级不利才是主因，而非大学本身。一位读者分享个人经历，感叹教育影响观点，但仍理解工人阶级选民。本部分包括执行主编宣布杂志恢复月刊的正面消息，并强调杂志财务健康和优质新闻。艺术总监介绍了本期封面，以孤立人物图像象征美国社会日益增长的独处现象。整体反映了关于社会流动、阶级、教育及精英机构角色的多层面讨论。

## Or (For Isaac)

这首诗是丹尼尔·博尔祖茨基对《圣经》亚伯拉罕献子故事的现代视角演绎，由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被儿子带往火焰，儿子称他将成为“山羊”，象征献祭。父亲流露对失去掌控的疲惫，以及以他名义造成的破坏的思索。他惊叹儿子的决心，也感受成为“重担”的意义。诗中暗示了驱使献祭的抽象力量。父亲虽不愿，但顺从命运。他从儿子手中感到悲伤、坚韧、愤怒和希望，以及儿子体内承载的“世纪的暴力”和民族期望带来的孤独。从天而降的身体和孩子的低语增添了幻灭与质问。诗歌融合了古老故事和现代敏感，探讨了牺牲、顺从、代际暴力以及在历史和期望重压下个人的复杂情感与困境。

# The Atlantic (2025-03-02)

## 午夜蓝六股意大利精纺羊毛西装男士

作家加里·什泰恩加特（Gary Shteyngart）讲述了他定制一套完美西装的个人旅程，这不仅仅是为了着装，更是为了自我转变与接纳。文章回顾了作者因苏联童年和移民经历而产生的身体形象焦虑和着装不适。通过与杰出工匠（裁缝山本雄平、衬衫制造商和鞋匠）合作，在意大利、香港、日本等地精选面料、历经数次试穿，这套西装逐渐成为他身体的延伸，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与自在，尤其是在社交场合。什泰恩加特反思了身份、阶级、归属感等主题，最终通过拥有这件精心制作的服装，找到了与自己身体和解并走向自爱的道路。这趟昂贵而细致的定制经历，象征着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深刻个人治愈。

## 一位凝视黑暗的小说家

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英国小说家阿里·史密斯（Ali Smith）的文学世界，赞扬她实验性却又极具可读性的写作风格。史密斯的作品以非线性叙事、文字游戏和对传统形式的打破而著称，她敢于挑战读者，引导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文章特别提到她对 Brexit（脱欧）和移民危机等当代政治社会议题的关注，如何在《季节四重奏》（Seasonal Quartet）等作品中巧妙地将时事融入永恒的季节循环。新作《Gliff》（一本地反乌托邦小马书）延续了她的风格，探讨了性别、边界与非中介性接触世界的重要性。尽管主题常显黑暗，史密斯的小说总能找到人性的连接，展现出复杂性和对简单二元对立的超越，她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使其在评论界和商业上均获得巨大成功。

## 白痴工厂

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的短篇小说描绘了一个普通办公室中暗流涌动的人际冲突和意外戏剧。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者“T”（托马斯）的视角展开，记录了同事莎莉（一位善良、古怪、拥有众多子女和宠物的女士）和刻薄多话的莉芙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场由糖果销售引起的办公室邮件争执意外升级，导致莎莉一气之下辞职。随后，莎莉的丈夫西德戏剧性地谎报莎莉离世（意在引起关注），在办公室引发巨大震动和同事们的自我反省。最终，当莎莉并非去世的真相揭开，莉芙的极端反应暴露了她隐藏的创伤和脆弱一面。故事以一场集体释然收场，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在经历这场风波后，出人意料地找到了片刻的人性连接和宽恕，甚至一起跳舞庆祝这份意外的平安，讽刺地照亮了日常工作场所下人们复杂的内在世界。

## 新冠否认者为何胜出

大卫·弗鲁姆（David Frum）分析了在新冠疫情爆发五年后，美国社会中那些最小化疫情风险、反对公共卫生措施并拒绝疫苗的人似乎在政治和话语权上占据上风的原因。文章指出，疫情从一开始就高度政治化，前总统特朗普在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数据显示，疫苗普及后，美国共和党支持者的死亡率明显高于民主党支持者，表明政治立场与个人健康行为紧密相关。不信任的产生源于多种因素，包括公共卫生建议的反复变化（如对户外活动的指导）、以及对不同群体（如抗议者与学童）实施标准差异化的感知。虽然“否认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最大化者”（如长期关闭学校）也造成了教育损失等伤害。文章同时强调了美国在疫苗研发和经济复苏中的韧性与成功，认为应当全面看待危机，既反思错误，也肯定集体成就，并呼吁社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国家自我宽恕，从经验中学习以应对未来的危机。

## 欧洲的埃隆·马斯克问题

这篇文章探讨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科技寡头对欧洲自由公正选举构成的挑战。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通常对竞选资金、政治广告和诽谤有更严格的规定。然而，由少数强大个人控制的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如X、TikTok）可以轻易绕过这些国家法规，传播虚假信息、匿名政治捐款并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推广极端主义政治人物。文章列举了马斯克直接使用X平台干预欧洲政治的例子（如采访德国右翼政党领导人），并强调了算法不透明的问题。欧洲正试图通过《数字服务法案》等方式监管这些平台，但面临执行困难以及可能与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立场产生的冲突。作者认为，这些科技巨头挑战了国家对公共辩论的控制权，迫使欧洲面临在与美国联盟和维护自身选举主权之间做出选择的困境。文章呼吁提高平台透明度，并强调国家不应被迫成为选举的“拉斯维加斯”。

## 国王所有的审查官

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探访了英国图书馆档案中关于英国戏剧审查制度的历史记录。文章揭露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英国宫务大臣办公室的审查官们如何对所有公开上演的戏剧剧本进行严格审查，以防止触犯国王、教会、政治或伤风败俗。这些审查官多是缺乏艺术素养的退休军官，他们的审查报告常显得荒谬、保守且充满偏见（针对性、同性恋、政治等）。文章引用了审查官对易卜生、萨特、加缪、田纳西·威廉斯、哈罗德·品特等作家作品的审查记录，展示了审查制度对英国戏剧创作造成的压制和束缚，迫使创作者进行自我审查。尽管审查官们看似滑稽，但他们权力巨大，严重阻碍了英国戏剧对当代重大议题的探讨。制度最终在1968年被废除。文章最后指出，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严谨的审查过程，意外地为后人保存了一个关于英国特别是黑人和酷儿戏剧的宝贵档案，成为了一种历史的“报复”。

## 屈服是传染性的

亚德里安娜·拉弗朗斯（Adrienne LaFrance）探讨了身居高位者面对威胁时易于屈服的现象及其“传染性”。文章将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与当代科技媒体寡头进行对比，指出两者都曾试图利用财富和权力控制信息、压制异见。导火索是《华盛顿邮报》（由杰夫·贝索斯拥有）漫画家安·特尔纳斯因报社拒绝发表她一幅讽刺贝索斯、马斯克等人向特朗普下跪的漫画而辞职。作者认为，这一事件象征着当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政治压力面前，倾向于选择顺从而非坚守原则。文章论证，机构的失败往往并非源于被迫就范，而是由于掌权者自身的选择性崩溃。面对特朗普等人物的威胁，屈服似乎提供了捷径，但这种怯懦会蔓延。文章呼吁普通公民像历史上的无畏者一样，坚持自己的原则，因为民主制度依赖于个体的勇气和行动，而非仅仅依赖机构本身。

## 在亚马逊搁浅

这篇文章由亚历克斯·夸德罗斯（Alex Cuadros）撰写，配有穆苏克·诺尔特（Musuk Nolte）的摄影作品，生动记录了亚马逊盆地在2023-2024年经历的史上最严重干旱。干旱导致河流水位大幅下降，许多过去可通行的水道干涸，原本漂浮在水上的房屋如今“搁浅”在泥地上，形同“船难”。文章描述了 Manaus 周边社区遭受的冲击，当地居民（如河流贸易商）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一些人甚至被迫离开家园迁往城市。作者指出，这种极端干旱与过去五十年亚马逊雨林的砍伐有着直接联系，森林砍伐破坏了其自我维持水循环的能力。穆苏克·诺尔特的照片不仅仅记录了干旱景象，更是受伤地球留下的“伤痕”，是对环境危机及其对人类社区影响的视觉控诉。

## 布里奇特·琼斯并非后女权主义的遗物

索菲·吉尔伯特（Sophie Gilbert）重新评价了虚构人物布里奇特·琼斯的持久魅力与文化意义，尤其结合新电影《布里奇特·琼斯：为男孩疯狂》进行分析。文章认为，尽管琼斯最初常被视为“后女权主义”的代表，但她通过小说和电影的发展，特别是蕾妮·齐薇格的演绎，展现出超越标签的生命力。作者探讨了琼斯作品幽默自嘲与经典浪漫叙事（如《傲慢与偏见》）的结合，以及齐薇格赋予角色笨拙而充满希望的可爱特质。新电影勇敢地触及中年丧偶、独自育儿等更沉重主题，却仍保持了浪漫喜剧的结构，从中找到了深度。文章认为，琼斯的韧性、自我意识、珍贵的友谊及其对自我接纳的不懈追求，是她能克服生活困境和外界审视（包括关于齐薇格外形的公众讨论）的关键。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姿态，展现了无需迎合周遭而顽强存在的价值，使其在众多年代角色中脱颖而出。

## 罗伯特·弗罗斯特曾写过烂诗

詹姆斯·帕克（James Parker）探讨了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早年生涯中一些不成功的作品，并将其与他后来的诗艺成熟进行对比。文章从一首作者认为平庸的早期诗作《我的蝴蝶》切入，尽管这首诗帮助弗罗斯特开启了职业生涯。他分析了弗罗斯特关于象征、意识及其著名诗句“事实是劳动所知最甜美的梦想”等哲学思想，认为其常显晦涩。作者指出弗罗斯特的创作在1913-1914年旅居英国期间发生了质变，结识了庞德等现代主义者，诗风从矫情的抒情转向了更具象、复杂且常带不安的乡村叙事和人物独白（如《波士顿以北》）。文章承认弗罗斯特的巨大声名，但也认为其后期作品并非首首佳作，甚至包括一些被推崇的作品。最终，文章通过分析弗罗斯特的优秀作品，如《伐木工之夜》、《荒凉之地》等，展示了他如何在现实与“他性”之间找到独特的平衡，塑造了现代诗歌中既扎根真实又充满神秘力量的声音，尽管他个人复杂甚至令人难以忍受。

## 现代战争写作之声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探讨了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作为现代战争文学奠基性作品的意义。文章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其微不足道的起因和毁灭性的后果，最能体现战争的荒谬和痛苦。雷马克的小说开创了“战士反战宣言”体裁，其特点在于从普通士兵视角出发，聚焦体感现实（危险、饥饿）、反权威立场、片段叙事、直观细节以及战友们的逐渐消逝。文章推荐了库尔特·比尔斯（Kurt Beals）的新译本，认为其更贴近原作口语化和辛辣的现代声音。小说力量在于其普遍性，迫使读者直面战争的恐怖。核心主题是战争对年轻人、普通人以及士兵与后方平民之间造成的割裂和伤害。主人公保罗·鲍默艰难的归乡经历，凸显了士兵在战场后与日常生活的格格不入。文章认为，小说最深刻的悲剧在于战争让幸存者变得仅适合战争，战后他们疲惫、破碎，找不到归属，永远被过去的记忆困扰。

## 哈尼夫·库雷希毫不留情的袒露式回忆录

希拉里·凯利（Hillary Kelly）评介了作家哈尼夫·库雷希（Hanif Kureishi）及其在2022年意外摔倒导致四肢瘫痪后口述完成的回忆录《破碎》（Shattered）。文章回顾了库雷希从昔日文坛“坏男孩”到因事故被迫转变的人生轨迹和写作方式（从手写到口述）。《破碎》被描述为一部“赤裸、动荡的病痛现实主义”作品，充满对身体状况、医疗过程和内心世界的激进透明公开，与他早期作品中对身体、痛苦和快感的探索形成对照。事故意外地重燃了他强烈的写作欲望，使虚构显得轻浮，转而专注记录当下原始、未经修饰的体验，如同战时日记。文章将其与维吉尼亚·伍尔夫关于疾病写作的论述及其他疾病回忆录比较，强调库雷希独特、不加过滤的坦诚。写作的动力既有经济需求，更重要的是生存驱动——声音成为他与世界连接的方式。作者也提及他与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相似的受伤经历及交流。

## 公共园地：“阅读教学没有标准答案”

本栏目刊载了读者对Helen Lewis之前一篇关于露西·考尔金斯（Lucy Calkins）和美国阅读教学争论（自然拼读 vs. 全语言）的文章的回应。来自各地的读者，包括许多教育工作者，表达了不同观点。一些人赞赏Lewis的细致分析，认同有效的阅读教学应采取平衡方法，并将考尔金斯视为争论的替罪羊。另一些人指出了英语语言不规律性对自然拼读法的挑战，支持考尔金斯注重使用有意义文本的理念。读者普遍强调教师需要自主权，根据学生个体需求调整教学方法。许多人对教育系统强制推行课程、教师缺乏培训和评估时间表示担忧，并警告“阅读科学”运动可能被出版商利用，贩卖“简单速效”方案。Helen Lewis在回应中cknowledges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观点的分歧，强调解决阅读危机需要审慎和谦逊的态度，并指出即使在以自然拼读闻名的芬兰，阅读分数近年也有下降，提醒人们保持警惕。

# The Atlantic (2025-04-02)

## Turtleboy Will Not Be Stopped

本文深入探讨了博客主 Aidan Kearney（网名 “Turtleboy”）在 Karen Read 谋杀案审判中所扮演的极具争议的角色。Read 被控开车撞死其男友、波士顿警官 John O’Keefe。Kearney 坚信 Read 无辜，并认为此案涉及警方和涉案人员的联手指控与掩盖真相。Article 详细描述了 Kearney 如何从一个前教师转变为一个以言辞粗俗、不拘小节著称的博主，并因收到线索后对 Read 案进行一系列长篇调查和评论而声名大噪，成为“解放 Karen Read”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采用了非正统甚至侵扰性的手段，如在公共场合骚扰证人和组织“滚动集会”在其住所外抗议。  
  
文章揭示了 Kearney 与 Karen Read 本人保持着密切且长期的私人沟通（一度长达40多个小时的通话记录），尽管他起初对此予以否认，声称 Read 是匿名信息源。这种联系与其声称的独立新闻报道立场形成了矛盾。Kearney 因其行为面临多项证人恐吓重罪指控，甚至因此被关押60天，但他依旧坚定不移地支持 Read，认为自己正在揭露腐败的权力系统，并将自己的努力与美国开国元勋和马丁·路德·金相提并论。他通过支持者的捐款、商品销售和订阅获得了可观的收入。文章讨论了近期审判流审的结果，以及陪审员透露已一致裁定 Read 谋杀罪和肇事逃逸罪不成立，但在过失杀人罪上存在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 Kearney 的部分论点，但他对陪审团未能完全理解他深信不疑的证据表示不满。文章最后强调了 Kearney 的不屈不挠和坚定信心，无论个人面临何种代价，他都将继续投身于 Read 案，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

## I’d Had Jobs Before, but None Like This

本文是作者 Graydon Carter 回忆自己在19岁时（1968年夏天）在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工作的经历。当时，让中产家庭的儿子去西部铁路工作一段时间是一种传统，旨在锻炼他们、让他们了解更广阔的世界。通过铁路公司担任副总裁的姑姑的帮助，Carter 获得了一份艰苦的铁路工人工作，尽管他原本希望能获得更安全的地勤工作，最终被分配去做需要爬电线杆架设电线的“架线工”。工友大多有犯罪记录，生活条件艰苦（住在行李车廂里），工作危险（没有安全带）。  
  
Carter 克服了恐高症，学会了爬杆，但也受了伤。他描述了日常工作和生活细节：长时间体力劳动、应对恶劣天气（尤其是黑蝇），以及工友之间的情谊，如与有抱负的作家 Craig Walls 成为朋友。文章生动描绘了工友们的背景和发生的一些事件，包括一名工友因与镇上女性约会被殴打。周末，工友们可以乘坐火车出行，或留在营地组织水枪大战。在工作即将结束时，Carter 坐在铁轨边看着豪华客运列车上衣着光鲜的乘客，经历了一个顿悟时刻。这一刻让他决心改变人生方向，不再从事体力劳动，而是追求“车窗另一边”的生活。Carter 回顾这段铁路工作经历，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最具挑战也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时期，这段经历让他认识到形形色色的人，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尽管他后来从事了更成功的职业，但没有任何其他工作能像这段时期一样带给他如此深刻的自我认识和非凡的成就感。

## The Trump World Order

本文批评了特朗普政府新的对外政策方向，认为其核心在于摒弃基于联盟和价值观的“软实力”，转而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单边主义和强制性策略。作者以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初遭受的迅速瓦解为例，指出其被视为“软目标”而遭攻击，意在测试瘫痪联邦机构的方法。USAID 的资金被冻结、员工被裁撤或强制休假，其公共信息渠道被关闭，这些行动被比作是一场针对美国对外援助体系的“闪电战”。  
  
文章认为，这种做法代表了对二战后美国两党长期坚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背叛，即通过对外援助、发展项目和人道主义努力来增进美国利益、预防不稳定并扩大影响力。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被解读为排他性的交易主义，优先考虑强制性手段和短期利益，而非合作与联盟。作者强调，这种转变使美国更接近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威权国家，而这些国家也乐见 USAID 的瓦解。文章列举了切断援助的严重后果，例如阻碍全球卫生监测、为竞争对手（如中国）扩张影响力打开方便之门，以及背弃了曾依赖美国支持的个人，如阿富汗的盟友和寻求庇护的难民。文章指出，特朗普和马斯克通过传播虚假信息来掩盖这些残酷政策的后果，因为美国公众表面上对外国援助持怀疑态度，但内心深处仍认同人道主义价值观和扶危济困的愿望。作者认为，美国国民固有的忠诚和同情心是这种强权路线可能面临的唯一真正阻碍，背离这些核心价值会对美国的国家认同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害。

## The Real Goal of the Trump Economy

本文认为，特朗普的经济目标并非像传统资本主义理论那样追求自由市场带来的普遍繁荣，而是旨在通过政治控制经济的“制高点”来巩固个人权力。作者将特朗普与美国商界领袖（如马克·扎克伯格）的互动比作普京与俄罗斯寡头的关系，即商业成功取决于对政治目标的服从。文章描述了美国企业高管中出现的“心理转变”，他们现在通过捐款、雇用前特朗普政府人员、改变公司声明，甚至调整业务策略（与马斯克掌控的平台合作）来取悦并迎合特朗普，以避免潜在的报复并寻求青睐。这种由恐惧和逢迎驱动的行为模式被视为是前所未有的，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游说。  
  
文章特别强调媒体行业成为特朗普攻击的目标，他通过提起诉讼向媒体所有者施压，被认为是效仿威权统治者控制信息流的策略。除了媒体，特朗普还利用关税作为个人和政治杠杆，而非连贯的经济政策工具。他的政府在关税豁免上表现出武断性，有证据表明捐助者和盟友更容易获得例外，这形成了一个通过政治关系分配利益的“分赃系统”，且缺乏监督。文本认为，特朗普的经济观融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糟糕的方面：严厉的国家控制与高度的不平等相结合，形成一个忠于他的寡头集团。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它将政治关系置于市场竞争（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关键驱动力）之上，从长远来看会损害国家的整体经济健康和活力。文章最后警告，如果美国选择用自由和政治自由来换取特朗普承诺的繁荣，最终可能会发现自己将一无所有。

## The Great Salt Shake-Up

本文探讨了美国厨房中食盐使用习惯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粗粒犹太盐（kosher salt）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碘盐（table salt）。作者回忆起童年时只有一种常见的“盐”（即碘盐），而如今犹太盐已成为多数大厨和美食类出版物推荐的首选，《纽约时报》、《Bon Appétit》等都倾向于在菜谱中 specify 它。文章解释说，犹太盐的化学成分与其他盐一样是氯化钠（NaCl），其名称源于它在犹太洁食屠宰过程中用于吸取动物血液，而非其本身更符合宗教规定。  
  
犹太盐流行的主要原因异常简单：其粗大且棱角分明的晶体更容易用手指捏取，方便厨师在烹饪时凭感觉和经验直覺地调味而无需精确测量。随着烹饪节目的普及，家用厨师开始模仿这种做法，导致犹太盐进入家庭厨房。网络菜谱的兴起也对此推波助澜，详细描述的菜谱为了统一标准而推荐特定类型的盐，犹太盐因其密度与其他盐不同而被选中。然而，作者指出其中的反讽：厨师使用犹太盐是为了避免测量，而家用厨师却又開始精确测量它。更严重的是，这种潮流导致人们放弃了加碘盐，无意中削弱了20世纪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进步——食盐加碘。加碘盐曾有效消除了碘缺乏症引起的甲状腺问题。如今，医生报告称碘缺乏引起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有所增加，部分原因归咎于人们转向不含碘的犹太盐以及过度依赖使用非碘盐的加工食品。  
  
文章认为，犹太盐的主导地位并非源于其内在的卓越性，而更多是厨师文化、媒体影响和烹饪潮流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主张采用更灵活的用盐方法，根据不同烹饪需求使用不同类型的盐，并提醒需关注加碘盐所提供的碘对健康的重要性。对于日常烹饪，加碘盐与犹太盐一样有效，甚至在补充碘方面優於后者。文章鼓勵家用厨师不必拘泥于犹太盐的“正统”，可以凭直觉调味，并根据烹饪目的和健康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盐。

## The Nicest Swamp on the Internet

本文探讨了 Reddit 平台令人惊讶的转变，从一个曾经以充斥着有毒内容（如种族主义、仇视女性和令人不安图像）而臭名昭著的“粪坑”，演变为一个具有大众吸引力、以利基兴趣、专业知识和相对积极互動著称的在线社区。作者回顾了早期互联网充满开放和可能性的时代，并将其与当前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如 X、Facebook）进行对比，后者正日益被僵尸账号、虚假信息以及旨在煽动愤怒的算法所困扰。  
  
Reddit 起初是一个分享各类内容的平台，随后发展成为一个由用户创建的社区网络，称之为 subreddit。文章指出，Reddit 近期之所以能获得大众喜爱，实现用户增长和盈利，部分归功于其饱受争议但必要的措施：移除那些最惡劣的 subreddit。更关键的是，Reddit 的结构赋予了用戶更大的权力，特别是志愿版主，他们在其管理的社区内设定和执行规则。这种去中心化的管理方式催生了极其多样化的 subreddit，涵盖从主流的科学讨论到高度具体或幽默的利基话题（如“指东西的老年人”、“不是蓝莓的浆果”、“离婚的鸟”等）。  
  
作者认为，Reddit 已成为一个获取专业知识的宝贵來源，也是对正在退化的搜索引擎谷歌的有效替代。Reddit 的力量在于其社区内部共享的专业知识，集体的智慧在社区规范和批判性思维的引导下，往往能针对各种问题提供有用的答案。文章将 Reddit 的崛起视为对开放、去中心化、以人为本的网络愿景的一种肯定，这与某些为了规模和算法驱动增长而犧牲人性的“超大规模”平台形成鲜明对比。尽管 Reddit 并非完美无缺，有时仍显稚嫩，且面临引入人工智能等挑战，作者仍认为其核心优势在于用户——正是这些人创造和维护着这些社区，提供了联系感、好奇心以及共享的人性。文章最后总结道，人们在 Reddit 上提出的深层问题（“我孤单吗？”“我还好吗？”）在最好的社区里往往能得到安慰的回应和社群的归属感。

## The Rise of th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Skeptics

本文探讨了美国黒人知识分子群体中对1954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日益增长的质疑。这种质疑最初源于黒人左翼和保守派，如今正向更广泛的主流群体扩展。文章首先描述了《布朗案》刚宣判时，黒人社区和民权领袖（如瑟古德·马歇尔、马丁·路德·金）对该裁决的狂喜和崇敬，将其视为反抗种族隔离的巨大胜利。然而，早期也出现了批评声音，如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认为《布朗案》并未带来实质性的去隔离，只是一种法律上的“欺骗”。随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等黒人权力运动倡导者更进一步，直接反对融合理念本身，认为其隐含了对黒人社区和机构价值的否定，主张应专注于建设和加强黑人社区。近年，克拉伦斯·托马斯等保守派人士也呼应了这种批评，反对强制融合，并推崇黒人学校作为社区中心的重要性。  
  
文章重点关注布朗大学非裔研究系主任 Noliwe Rooks 的新书《综合：美国学校如何辜负黒人儿童》，认为该书代表了这种质疑进入黒人知识分子主流的显著例证。Rooks 最初支持融合，但被黒人家长讲述子女在白人主导学校经历的創傷所动摇，认为这种经历有时比隔离学校的教育不足更具破坏性。Rooks 认为《布朗案》是对黒人学校、政治和社区的“攻击”，对黒人生活造成了“拆遷球”般的影响，特别点출了黒人教师因学校合并而失业的困境。她认为，融合项目常常是一种危险的尝试，旨在将少数黒人学生“像盐洒在爆米花上”一样放入白人环境，而非改善黒人自己的学校。她以父亲和儿子在融合经历中面临的负面遭遇为例，证明在融合环境中遭遇的隐形种族主义和支持不足可能与貧困隔离环境中的暴力一样具有毁灭性。作者认识到《布朗案》执行中的失败（如“所有有意的速度”的模糊性）导致了隔离的长期存在和黒人学校的表现不佳。然而，他强烈反对浪漫化隔离时代或认为《布朗案》是错误裁决的观点，指出这种怀旧忽视了吉姆•克劳时代普遍存在的不人性，并提到那些亲历隔离并憎恶它的黒人领袖（如查尔斯•汉密尔顿•休斯顿）的观点。作者总结说，《布朗案》的革命性影響远超教育领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黒人群体的自我认知，让他们从恳求者变为权利享有者。同时，作者认为将融合学校中遭遇的創傷与贫困落后、面临实际生命危险的隔离学校中学生的困境等同是错误的，“并非所有困境都是平等的”。

## The Last Great Yiddish Novel

本文评论了恰伊姆·格拉德（Chaim Grade）的最后一本、最近被翻译成英文的小说《儿女们》（Sons and Daughters），认为它可能是最后一部重要的意第绪语小说，也是一个对失落世界的有力重建。作者介绍了格拉德是一位重要的意第绪语作家，他通过逃难躲过了大屠杀，但失去了家人和充满活力的维尔纳犹太社区。他的回忆录《我母亲的安息日》捕捉了他回到被毀灭的维尔纳后的创伤经历。格拉德在生命的后半段致力于通过写作来记录被纳粹消灭的东歐犹太世界，特别是贫困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严格的立陶宛米斯纳格德（Misnagdic）犹太教世界，与辛格笔下更具神秘色彩的哈西德派形成对比。尽管后来变得世俗化，格拉德对他的拉比老师们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敬意。  
  
文章认为，格拉德的作品避免直接提及大屠杀，而是承担了一种“圣经式”的任务，通过富有想象力的重建来“通过文学解构大屠杀”，借此保存记忆，以防散居的犹太人忘记自己的身份。《儿女们》写于1965年至1976年，背景设定在1930年代初期，时间跨度长，讲述了两个著名的拉比家族在现代性压力下分崩离析的故事。他们的子女开始挑戰传统期望：女儿成为护士，儿子加入锡安主义运动（正統犹太教徒非常厌恶），另一个儿子則在瑞士攻读哲学并娶了非犹太妻子，完全放弃宗教实践。小说探讨了父母确保子女继续遵循犹太教律法的巨大压力，以及子女偏离传统时所带来的痛苦妥协和回避。格拉德对代际冲突的描写細膩入微，对父母为维护传统所做的挣扎和子女追求新生活的愿望都表示同情。书中有一个特别古怪而令人难忘的角色：一个嘲讽他虔诚父亲的“疯狂”儿子。  
  
小说还巧妙地融入了1930年代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青年團体和日益高涨的波兰反犹民族主义。作者指出，小说中转型为意第绪语诗歌的前拉比学校学生 Khlavneh 可能是格拉德的自我写照，象征着传统与现代、世俗主义与犹太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利用意第绪语文学来捕捉已逝世界的精神。文章提及格拉德生前被低估（相较于辛格）以及他去世后其遗孀对作品出版的阻挠。文章最后讨论了意第绪语的复兴，注意到学术界和文化界对其重新燃起的兴趣，这其中包括一些前哈西德派人士的贡献，暗示了一种可能性：新的意第绪语文学文化可能从宗教社区中萌生。文章总结说，格拉德终生在“古代犹太人”和“彻底的现代人”之间的内心冲突，尽管痛苦，却孕育了他的杰作。

## The Man Who Owned 181 Renoirs

本文通过回顾布莱克·戈普尼克（Blake Gopnik）的传记《特立独行的博物馆》和尼尔·L·鲁登斯坦（Neil L. Rudenstine）的机构历史著作《巴恩斯故居》，审视了化学家兼艺术品收藏家艾伯特·C·巴恩斯（Albert C. Barnes）及其创立的巴恩斯基金会。巴恩斯白手起家，通过其医药产品 Argyrol 积累了巨额财富。他性格复杂：一方面支持民权和实验性教育，另一方面又臭名昭著地刻薄、多疑。受画家朋友威廉·格拉肯斯的影响，巴恩斯开始收藏艺术品，初期是印象派，很快转向现代主义，购入大量塞尚、雷诺阿、马蒂斯等人的作品，其收藏规模（69幅塞尚、181幅雷诺阿）空前绝后。他是美国最早一批重要的现代艺术收藏家之一，藏品还涵盖非洲雕塑、古代大师作品、古董、美国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他认为伟大的绘画与手工铁艺品的艺术本质没有区别。  
  
巴恩斯不仅仅是收藏家，他发展了一套基于形式（线条、色彩、空间）的艺术理论，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教授如何“看”艺术，让普通人也能深入体验。1925年，他创立了巴恩斯基金会，将其定位为教育机构而非公共博物馆。参观者必须申请课程，且准入受到严格控制，藏品不得外借或彩色复制。他在陈列上独具匠心，创造了“展品组合”（ensembles），将不同时期、来源和功能的物品并置，突出形式上的呼应。巴恩斯固执己见和糟糕的性格导致其与人合作困难重重，最终在去世前指定历史上的黑人大学林肯大学为其机构继承人董事会。1951年，巴恩斯死于车祸。他的副手 Violette de Mazia 延续了其严格的政策，导致基金会日益封闭，走向破产。在她去世后，一系列法律诉讼旨在突破巴恩斯的限制性遗嘱，最终导致基金会搬迁至费城博物馆区的新址，引发巨大争议。新馆复制了旧馆的展室布局，但运营模式更大众化（收取门票、设有咖啡馆和礼品店），与巴恩斯严格的封闭式学习愿景形成鮮明对比。  
  
文章认为，尽管巴恩斯性格有缺陷，且其控制欲几乎毁掉了基金会，但他对艺术的热情以及试图为艺术体验寻找客观规律的努力令人着迷。他努力理解人性的主观世界，这在他的藏品中得到了体现，但他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容忍模糊和不确定性，这恰恰是他最热爱艺术作品內在包含的元素。最终，正是他最不理解的東西，恰恰构成了他最珍視的事物的关键。

## The Commons: ‘We Are Better Off Cultivating Relationships Offline’

本文汇集了读者们对《大西洋月刊》2025年2月封面故事“反社交世纪”（The Anti-Social Century）的回应，该文探讨了美国因独处时间和线上时间增加导致的孤独和隔阂现象。读者来信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造成这种孤立的原因，并分享了个人经历和对策。有读者指出，经济压力是人们宅在家里的重要原因，外出花销大，居家更经济實惠，建议提供免费公共空间和活动作为 çözüm。另一位读者认为，公共设施（如公立泳池）的衰落可以追溯到排斥少数族裔的历史决策，暗示社会凝聚力的瓦解与长期以來纳税人对共享空间的放弃有关。還有读者引用 Philip Slater 1970年的著作《孤独的追求》，认为书中预测的个人主义和孤立趋势已在当下加剧，甚至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分离。  
  
一位年长的读者分享了自己退休后通过做 Uber 司机来对抗孤立的积极经历，他发现与乘客的短暂交流能带来满足感，同时也注意到年轻一代似乎不太习惯這種与陌生人的隨意交流。另一封感人的来信描述了飓风海伦意外切断通讯、迫使人们走出家门后，邻里之間建立起來的臨時社区感和互助情谊，突显了灾难在瞬间打破现代隔阂、重塑人际关系的力量。最后，一位横跨 Z 世代和千禧一代的年轻读者分享了自己从儿童时期宅家线上社交到通过远足、加入宗教团体和积极与人互动来构建线下关系的转变过程，并承认同龄人普遍意识到線下关系更好，但仍難以擺脫線上依赖。总的来说，这些回应共同指出，现代生活（经济、技术、潜在的历史社会变迁）助长了孤立，但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内心对连接的渴望，并通过个人努力、公共资源或意外事件寻找回归社群的方式。

# The Atlantic (2025-05-02)

## The Hollow Men

文章分析了共和党政客如何迅速采纳唐纳德·特朗普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反复立场，将其行为比作奥威尔小说《1984》中机械、缺乏思考的顺从。文章认为，这种世界观的背叛是特朗普进行忠诚测试和展示统治地位的方式，将政客变成了“空心人”，他们将忠诚置于原则之上。文章将此与特朗普本人对独裁者的真正偏好以及对民主价值观的蔑视进行对比，认为他的外交政策并非现实主义，而是粗暴的权力崇拜。文章最后指出，尽管精英阶层表现出顺从，但大多数普通美国人仍坚持传统价值观，这可能成为最后的希望。

## America’s Future Is Hungary

文章分析了MAGA保守派对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的钦佩，并将其言论与其实际统治状况进行对比。文章描述了欧尔班如何通过瓦解民主机构（公务员体系、自由媒体、司法机构、大学）来巩固权力并使少数忠诚者致富，导致腐败、经济停滞和人口外流。文章认为，美国保守派欣赏欧尔班的专制手段，并试图在美国实施类似的变革，警告说这条道路将导致匈牙利出现的负面结果。

## America Is Watching the Rise of a Dual State

文章探讨了恩斯特·弗兰克尔在纳粹德国描述的“双重国家”概念，即稳定的法律体系（规范国家）与任意权力及暴力领域（特权国家）并存。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正通过赦免叛乱者、清洗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攻击法官以及利用政府权力惩罚对手等行为，在美国建立类似的双重国家。文章警告说，虽然规范国家可能对许多人继续运作，但特权国家允许对异议进行有针对性的压制，并最终可能吞噬任何人。

## What Porn Taught a Generation of Women

文章探讨了色情内容对美国流行文化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以及它对一代女性的影响。作者认为，“色情时尚”时代将女性商品化，将权力等同于基于青春和参与意愿的性吸引力，而女性往往成为这种“游戏”的笑柄。文章追溯了色情内容的审美和规范如何渗透到主流媒体、时尚甚至早期互联网，塑造了女性的自我认知、抱负和人际关系。文章讨论了这种文化背景如何助长了后女权主义环境，使厌女症常态化，女性常被视为奇观或物品，最终体现在政治领域，如唐纳德·特朗普和女性政治家的待遇。作者反思，为了让女性重获真正的力量并创造新的叙事，这种文化制约需要被“反学习”。

## When I’m 84

这是一篇关于84岁的林戈·斯塔尔的人物特写，反思了他作为披头士乐队鼓手之外的持久存在、个性和独特贡献。作者描述了斯塔尔的“和平与爱”座右铭，他克服个人困境（童年疾病、成瘾）的韧性，以及他在披头士乐队中作为凝聚力量的角色。文章强调了他的“林戈主义”——捕捉意外真相的古怪短语——以及他与全明星乐队持续的音乐活动和最近成功的乡村专辑。文章将斯塔尔积极、感恩的态度和对联系的渴望与当前分裂的政治气候形成对比，认为他的和平与爱的信息仍然相关且必要。文章还提到了他与保罗·麦卡特尼作为仅存的两名披头士成员之间独特的纽带，分享着无人能完全理解的经历。

## Dwyane Wade’s Greatest Challenge

文章探讨了NBA球星德维恩·韦德在名人堂篮球生涯之外的发展，重点关注他退役后如何定义自己作为男人和父亲的旅程。文章对比了他凶猛、强硬的球场形象（体现在一座备受争议的雕像中）与他如今作为支持妻子的丈夫（加布里埃尔·尤尼恩）和父亲的公众形象，特别是他公开支持跨性别女儿扎亚。文章深入探讨了韦德在芝加哥充满挑战的童年，母亲的毒瘾和严厉父亲的“严厉的爱”给他带来了纪律，但也缺乏情感温暖。文章强调了韦德有意识地努力成为一个不同的父亲，优先考虑情感联系和接纳，尤其是对扎亚。文章讨论了他因挑战传统黑人男性气质规范而面临的挑战和审视，以及他的家人为了扎亚的福祉搬到加州。最终，文章将韦德退役后的生活描绘成一个自我发现和有意识的父爱之旅，在公众审视和家庭动态中坚持他不断发展的价值观。

## How Leonard Bernstein Changed the Canon

文章讨论了伦纳德·伯恩斯坦在恢复古斯塔夫·马勒音乐地位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纳粹时期马勒音乐被压制后的维也纳。文章强调了伯恩斯坦对马勒的强烈支持，认为马勒的音乐对于理解20世纪至关重要，反映了犹太局外人复杂、常带痛苦的经历。文章将伯恩斯坦的美国移民背景及其对古典和流行音乐的融合，与以赫伯特·冯·卡拉扬为代表的更传统的欧洲方式进行对比。文章描述了伯恩斯坦在让维也纳爱乐乐团接受马勒作品方面所做的充满挑战但最终成功的努力，该乐团此前曾将马勒的音乐斥为“Scheissmusik”（狗屎音乐）。文章认为，伯恩斯坦作为一名美国犹太人，成为欧洲正视其历史并将犹太贡献重新融入其文化经典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改变了美国评论家对他在欧洲成功后的看法。

## A New Force of Indian Country

这是一篇短文，回顾了作者菲利普·J·德洛里亚的父亲，维恩·德洛里亚二世，他是20世纪60年代末“新印第安人”活动家一代的关键人物。文章描述了维恩·德洛里亚二世如何从一名政治组织者转变为作家，在他们丹佛的小家中创作了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卡斯特为你而死》。文章强调了他要求美国尊重条约并承认部落主权的作用，为印第安地区带来了新的、坚定的立场。文章使用了一张他父亲在家工作的照片，来说明这场运动背后的个人和智力基础。

## The Dark Weirdness of R. Crumb

文章探讨了传奇地下漫画家R.克拉姆的作品和个性，重点关注他愿意暴露个人癖好和潜意识的执念，特别是关于女性身体的描绘。文章认为，克拉姆的艺术触及了美国文化中“集体古怪”的一面，成为反对20世纪50年代墨守成规的反体制力量。文章讨论了他作品中备受争议且常令人不安的性质，这招致了厌女症和种族主义的指控，突显了他究竟是在批判还是在体现这些黑暗冲动上的模糊性。文章提到了他后期的作品变得更加内省，以及他出人意料地为《创世纪》配图，暗示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缓和，但最终将他的遗产定位在他揭示内心“污垢”的冒险尝试及其对漫画媒介的影响上。

## Do You Actually Know What Classical Music Is? Does Anyone?

文章挑战了基于声音或风格对“古典音乐”的普遍理解，认为其真正的定义特征在于其“书写性”——即依赖乐谱作为权威形式。作者作为作曲家和指挥家，将其与流行音乐和爵士乐等口头传统形成对比，后者的权威主要在于录音或现场表演。他认为，这种跨越1000多年和多种风格的书写传统，允许创造复杂的结构和深度，这在口头形式中难以实现。文章捍卫了音乐识谱和作曲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和交流形式的价值，并对录音技术导致其在主流文化中被边缘化表示遗憾。文章认为，通过其书写性来理解古典音乐可以拓宽其定义，揭示意想不到的联系（如杜克·艾灵顿），并强调扩大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 Who Needs Intimacy?

文章评论了凯蒂·北村的小说《试镜》，将其置于当代女性小说家探索独立女性自我与传统关系角色（伴侣、孩子）脱离的可能性这一趋势中。文章讨论了北村笔下的主人公，她们常无名无姓、身体模糊，漂浮在异国他乡，质疑自我、真实性的本质以及关系中固有的表演性。文章分析了《试镜》的情节，叙述者是一位放弃了母职的演员，她被一个自称是她儿子的年轻人找上门，模糊了现实与表演的界限。评论认为，这一趋势反映了对女性身体“必须性”和关系束缚的集体拒绝，但质疑这种超脱的“惨胜”是否真正解放，还是仅仅用一套新的束缚取代了旧的。文章最后指出，北村的小说尽管在模糊现实方面进行了形式上的实验，但最终还是将叙述者带回了具身生活和人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混乱，暗示真正的创造可能来自于这种复杂性内部，而非逃离。

## The New King of Tech

文章围绕史蒂芬·维特的书《思考机器》展开，该书以英伟达CEO黄仁勋的传记为框架，探讨了英伟达如何从一家游戏显卡公司转变为AI淘金热的“卖铲人”，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文章强调了黄仁勋敢于冒险的领导力，特别是将芯片架构从串行处理转向并行处理，以及后来将显卡改造为科学家可用的超级计算机。文章指出，英伟达的成功离不开硅谷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由劳动力市场、政府和大学的研究投资、移民贡献以及独立芯片代工厂的兴起。文章也提及黄仁勋对AI风险的乐观态度，认为他专注于工具和效率的愿景推动了公司的发展，但也伴随着巨大的未知风险。

## What to Make of Miracles

文章探讨了伊莱恩·佩格尔斯（Elaine Pagels）的著作《奇迹与惊奇：耶稣的历史之谜》，该书从历史和文学角度审视了新约中奇迹故事的起源和功能。文章讨论了佩格尔斯的研究方法，她不太关注奇迹的字面真实性，而更关注它们揭示了早期基督教社群、他们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确立耶稣神圣权威的努力。文章重点介绍了佩格尔斯对童贞降生和受难叙事的分析，展示了这些故事如何演变以应对批评（如耶稣可能非婚生或他蒙羞的受难），并服务于神学和政治目的（如赦免本丢·彼拉多以避免罗马迫害）。文章提及了佩格尔斯作为诺斯替主义历史学家的背景以及她对恩典的个人探索，认为从历史角度理解这些叙事可以提供新的见解，并揭示福音传道者在构建新世界宗教方面的创造性天才，同时也承认了替罪羊犹太人所造成的有害后果。

## The Commons: Who’s to Blame for America’s Housing Crisis?

本节汇集了读者对《大西洋月刊》2025年3月号关于美国流动性下降与住房危机之间联系的文章的回应。读者们提出了多种观点：一些人认为，富裕城市中限制性土地使用政策是主要原因，这是由房主为保护房产价值而推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原因更复杂，警告不要将问题过度简化或牺牲历史特色/绿地；还有人强调扎根社区的价值，认为过度追求流动性和金钱导致了孤独；有读者指出女性在家庭照护中的角色影响了迁移决策；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企业贪婪，认为其优先建设豪华住宅而非经济适用房；另有读者为简·雅各布斯辩护，认为她的思想被误读或误用，她提倡的是动态的城市发展。

# The Atlantic (January/February 2024)

## The Danger Ahead

若特朗普重返白宫，他将更了解体制弱点，拥有更顺从的助手，并带着明确的报复议程，可能引发宪法危机 [cite: 22, 27]。其优先事项包括：终止针对他的案件，赦免盟友，利用司法部打击对手，削弱公务员独立性，并可能动用军队镇压抗议 [cite: 32, 33, 34, 35, 36]。与第一任期不同，他受到的约束将更少，因质疑其做法的共和党人已被边缘化 [cite: 47, 48, 49, 50, 51]。国际上，或将抛弃乌克兰，退出北约，并对其他民主国家施压 [cite: 60, 61, 62, 63, 64, 65, 66]。这可能导致少数统治，并引发大规模示威，而特朗普或动用军队镇压，终结自由社会 [cite: 68, 69, 72, 79, 80, 81, 82, 84, 85]。击败特朗普对于维护美国宪政民主结构、保留解决其他重大问题（如战争、气候变化、经济民生）的可能性至关重要 [cite: 87, 88, 89]。其再度当选将是不可逆转的冲击，严重损害民主传统 [cite: 90, 91, 92, 93, 94]。

## Trump Will Abandon NATO

特朗普对北约长期不屑，若再次当选，他很可能终结美国对这一欧洲联盟的承诺 [cite: 111, 114, 115, 116]。与第一任期不同，届时白宫将缺乏能劝阻他的人物 [cite: 118, 119, 120, 121, 122]。尽管正式退出北约面临制度和法律障碍 [cite: 125, 126, 127, 128]，但特朗普仅凭言论就足以瓦解北约的心理威慑力，因为集体防御的信念主要存在于潜在威胁者的心中 [cite: 133, 136, 137, 138, 139, 140]。这将使欧洲暴露于俄罗斯的潜在攻击之下，乌克兰的军事补给也将中断，俄罗斯或将重新考虑全面征服乌克兰 [cite: 150, 151, 152, 153, 154]。此举还将危及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联盟体系，盟友可能转向中俄寻求自保，美国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亦将随之衰退 [cite: 159, 160, 163, 164, 167]。届时，美国国内问题将使其无暇他顾，其影响力的终结可能在不为人知中发生 [cite: 168, 169, 170]。

## Loyalists, Lapdogs, and Cronies

特朗普若再度执政，其内阁人选将不再寻求“房间里的大人”，而是优先考虑个人忠诚而非资历 [cite: 175, 183, 187, 188, 189, 190]。第一任期内许多资深官员或因不满而离职，或被解雇，且大多不愿回归 [cite: 184, 185, 186]。潜在人选可能包括：负责移民政策或担任幕僚长的斯蒂芬·米勒 [cite: 194, 196, 197, 198, 200]；国务卿候选人理查德·格雷内尔 [cite: 202, 203, 204, 205, 206]；以及多位旨在执行特朗普复仇议程的司法部长人选，如克鲁兹、霍利等 [cite: 207, 210, 211, 212, 213]。此外，通过“F计划”，可能有多达五万名联邦公务员的职位将转为政治任命，以便随意解雇并安插效忠者，旨在打造一个更顺从的联邦政府并“摧毁深层国家” [cite: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9, 230, 231]。

## The Specter of Family Separation

特朗普若再次当选，其移民政策顾问斯蒂芬·米勒声称将以更快、更有力的方式推行严厉措施 [cite: 242, 247]。特朗普已承诺将执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驱逐行动，可能重启家庭分离政策 [cite: 248, 249, 250]。具体计划包括：派遣ICE及其他联邦探员大规模搜捕，完成边境墙，恢复“42条”边境条款以阻止庇护申请，扩大使用军事化拘留营，终止出生公民权，筛查移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援引《叛乱法》在边境部署军队及实施海上封锁 [cite: 251, 252, 253, 254, 255, 256]。米勒将确保只有与其移民观点一致的人才能进入政府，而曾推行争议政策的官员几乎未受任何惩罚，这将鼓励新任者更加肆无忌惮 [cite: 258, 259, 260, 261]。这些政策不仅会重新揭开许多社群的伤疤，损害经济，还将向世界发出信号：美国允许几乎任何形式的移民限制 [cite: 267, 271, 272, 273, 274, 275]。

## How Trump Gets Away With It

特朗普若重获总统职位，将再次成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但他极度缺乏忠实执行法律的品格，其行为将主要受自身利益和复仇欲望驱使 [cite: 283, 284, 287]。他将致力于撤销针对自身的刑事指控，并动用联邦检察官打击包括拜登在内的政敌 [cite: 288]。鉴于第一任期内遭遇的体制内抵制，他此次将坚决安插效忠者担任关键职位，如司法部长，以便直接控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 [cite: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他可能通过解雇特别检察官、命令撤案、或利用“政府承认错误”的法律手段来摆脱联邦指控，甚至尝试自我赦免 [cite: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6, 317, 321, 323, 324, 325, 328, 329, 330, 331]。州级刑事案件也可能因其总统身份而推迟审理 [cite: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他还可能利用法律顾问办公室为非法行为寻求合法性，例如在边境使用致命武力或推迟选举 [cite: 351, 352, 353, 354]。特朗普曾宣称纠正选举舞弊允许“终止所有规则，包括宪法”，表明其对法律边界的漠视 [cite: 360]。

## Four More Years of Unchecked Misogyny

特朗普的厌女症并非单纯憎恨女性，而是强制女性顺从其欲望和特定社会角色的体现；挑战或拒绝他的人会受到惩罚 [cite: 370, 371]。其第一任期已通过最高法院任命推翻了堕胎权，并使共和党愈发男性化，助长了社会上的性别歧视和网络暴力 [cite: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他将“厌女圈”（manosphere）的极端声音推向主流，影响了一代人的性别观念 [cite: 381, 382, 383, 384, 385, 387]。厌女是特朗普始终如一的信条 [cite: 388]。若再度当选，他将更加肆无忌惮，因为身边的顾问只会助长其阴暗冲动 [cite: 392, 393, 394]。例如，在2023年CNN市民大会上，他在顾问杰森·米勒的怂恿下，对女主持人凯特兰·柯林斯表现出攻击性，其语气犹如虐待关系中的施暴者 [cite: 395, 396, 397]。这意味着女性将面临一个更加不受约束、充满敌意的四年。

## The Climate Can't Afford Another Trump Presidency

特朗普首个任期内，气候变化议题遭到系统性压制，相关信息从政府网站移除，环保署页面被删 [cite: 408, 409, 410, 411, 412]。若其连任，美国极可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引发全球气候行动的连锁负面效应 [cite: 413, 414, 1417, 418]。尽管电动汽车普及和太阳能成本下降等趋势难以逆转，且部分气候友好政策（如《通胀削减法案》）惠及共和党州份 [cite: 419, 420, 424, 425, 426]，但特朗普政府仍能造成重大破坏。化石燃料游说集团及“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等组织已制定计划，意图阻止清洁能源电网升级、阻碍各州采纳更严汽车排放标准，并削减能源部的清洁能源部门 [cite: 427, 428]。环保署将面临预算削减、人员流失和执法停滞的困境 [cite: 429, 430]。由于无法律禁止，政府机构删除气候数据的行为可能重演，此前志愿者存档的数据仍保存在私人服务器以防万一 [cite: 404, 431, 432, 433, 434]。

## Is Journalism Ready?

特朗普与新闻媒体间存在一种虚伪的共生关系：他渴望关注，媒体则从其丑闻中获利，但这已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并助长了特朗普对客观真相的破坏 [cite: 440, 441, 443, 444, 445, 446, 450, 451, 452, 453]。特朗普使美国媒体变得更像他：唯我独尊、制造分裂、自以为是，并被诱导放弃独立性转向行动主义 [cite: 455, 456, 457, 458, 459]。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团队将更有策略地削弱新闻自由，安插欢迎媒体攻击的效忠者，可能将独家新闻给予友好媒体，并重塑白宫记者团规则 [cite: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特朗普或将违法打压记者，甚至动用司法部调查泄密，包括查封记录 [cite: 480, 481, 482, 483]。他最强大的武器是让民众相信媒体无价值，事实可被随意扭曲 [cite: 488, 489, 490, 491]。新闻界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变得无关紧要，正如在匈牙利等国发生的那样 [cite: 492, 493, 494, 495, 496, 499, 500, 501, 502, 503, 504]。媒体不应幻想通过事实核查改变其支持者，也不期待出现“水门事件”式的结局 [cite: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面对盈利模式与公共服务使命的冲突，媒体应坚持不懈地调查其滥用权力行为，而非追求短期利益 [cite: 527, 528, 529, 530, 531, 534, 535]。

## Trump's Polarization of Science Is Bad for Everyone

特朗普习惯于攻击、歪曲或完全阻止任何阻碍其议程的科学研究，例如“夏皮门”事件、撤换环保署科学家、取消煤矿风险研究及污染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等 [cite: 542, 543, 544, 545, 546, 550, 551, 552, 553]。其疫情应对充斥着淡化病毒威胁、推广无效疗法、嘲笑口罩及对疫苗半心半意的支持 [cite: 554, 555, 556, 557, 558]。尽管特朗普执政期间公众对科学家的整体信任度有所上升，但这掩盖了严重的政治两极分化：共和党人信任度下降，民主党人则上升 [cite: 559, 560, 561, 562, 563]。自由派将科学议题政治化（如“科学是真实的”标语牌），反而加剧了保守派对科学的负面态度 [cite: 564, 565, 566, 567, 568, 569]。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重启对环境科学的压制，并针对堕胎药、胎儿组织研究等新的政治敏感领域 [cite: 571, 572]。更持久的危险在于，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将持续演变为部落化的信仰，导致社会在面对未来危机时缺乏共识和凝聚力 [cite: 574, 575,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 Corruption Unbound

特朗普的从商经历显示他视政府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其首个任期内未与家族生意切割，并通过推广自家产业、向特勤局收取高额费用等行为不断试探腐败的边界 [cite: 595, 596, 597, 598, 599, 600]。到任期结束时，他与亲信已形成一套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的“剧本”，并消除了共和党内外对腐败的顾忌 [cite: 601, 602]。第二任期可能出现系统性的权力滥用，美国或将演变成类似匈牙利欧尔班领导下的“黑手党国家” [cite: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届时，大规模安插效忠者进入政府（如通过“F计划”），将使官员们利用职权为友好企业输送合同、强迫寻求政府帮助的公司向特朗普产业“纳贡”，并打击批评者 [cite: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拜登时代的基础设施法案、反垄断执法等新政策也可能被用于中饱私囊 [cite: 644, 645, 646, 647, 648]。外国势力亦将通过贿赂官员、投资特朗普项目等方式寻求美国政府的偏袒，这正是美国国父们最为忧惧的局面 [cite: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 Why Xi Wants Trump to Win

经历拜登四年执政后，中国领导层或更乐见特朗普重返白宫 [cite: 664]。拜登政府在损害中国经济及地缘政治野心方面（如限制先进半导体出口）比 特朗普更为强硬有效 [cite: 667, 668, 669, 670, 671]。同时，拜登重振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联盟网络以对抗中国，令北京感到被围堵的忧虑 [cite: 672, 673, 674, 675]。相比之下，特朗普执政时期的贸易摩擦和言语交锋对北京而言仅是小麻烦，其从全球领导地位的后撤反而为习近平提供了将中国塑造为更负责任大国的机会，美国国内的混乱也助长了中国“美国衰落论”的宣传 [cite: 676, 677, 678, 679]。特朗普若再次当选，即使保留部分对华强硬政策，也可能破坏拜登建立的民主国家统一战线，其政策可能摇摆不定，使中国认为他比特朗普更易于管理，从而为习近平拓展中国影响力提供更多机会 [cite: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也使其更难预测，但可能更有利于习近平的议程 [cite: 693, 694]。

## A MAGA Judiciary

特朗普的首个任期使保守派法律运动实现了推翻罗诉韦德案、终止平权法案等目标，并将联邦司法系统变为右翼文化战争的战场 [cite: 701, 702, 704]。许多特朗普任命的法官视自身为这场战争的步兵，其裁决往往是带有历史断章取义的右翼政治宣传 [cite: 705, 706]。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及其盟友将更有准备地安插右翼狂热分子进入司法体系 [cite: 707, 708, 709]。例如，反堕胎活动家背景的法官卡斯马里克，便曾无视先例，以“历史与传统”为由禁止校园变装表演 [cite: 710, 711, 712, 713, 714, 717, 718, 719, 720]。当前保守派宪法分析主流的“原旨主义”，在实践中常沦为主观解读，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并在多起重大案件中表现为选择性引用历史事实 [cite: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34, 735, 736, 737]。一些右翼法官的行为日益网红化，其裁决也常带有党派偏见和个人情绪 [cite: 745, 746, 747, 748]。这些法官若继续得到提拔，将进一步巩固一个倾向于为特朗普集中权力辩护的司法体系，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保守派政治权力不受挑战的未来 [cite: 752, 755, 756]。

## The Proud Boys Love a Winner

特朗普对“骄傲男孩”、“誓言守护者”等极右翼暴力团体的培养，在其总统任期末期从暗示转向公开煽动，最终在2021年1月6日酿成暴力事件 [cite: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尽管目前法律反击已使这些团体及其追随者有所收敛 [cite: 767, 768, 769]，但极端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其是否被视为“胜利者” [cite: 770, 771, 772, 773]。特朗普的败选和法律困境削弱了其号召力，多名极端组织头目被判刑，福克斯新闻也因诽谤付出代价，这些都显示了问责的存在 [cite: 773, 774, 775, 776, 777]。然而，若特朗普胜选连任，他本人及其支持者将感到被“平反” [cite: 778]。特朗普已承诺赦免许多1月6日骚乱者，甚至可能包括极端组织领导人 [cite: 779, 780, 781]。届时，一个控制司法部、拥有愿意使用恐吓手段的支持者、并在执法部门有一定追随者的总统，可能压倒州级机构维护法律的能力 [cite: 782, 783, 784]。极端主义将不再是边缘力量，而是嵌入国家机构，针对“国家公敌” [cite: 785, 786, 787]。特朗普的获胜将为右翼极端主义的再次猖獗提供“胜利叙事” [cite: 788]。

## A Plan to Outlaw Abortion Everywhere

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反堕胎运动的下一个目标是在全美范围内终结合法堕胎 [cite: 795, 796, 797]。由于通过联邦禁令（需参议院60票）难度较大 [cite: 798]，一些活动家寄望于特朗普政府通过执行1873年的《康斯托克法案》来达到目的 [cite: 799]。该法案禁止邮寄任何“用于堕胎或不道德用途的物品” [cite: 800]。目前司法部备忘录允许邮寄堕胎药，前提是寄件人无意将其用于非法用途 [cite: 803, 804, 805]。但特朗普政府可能发布新备忘录，将《康斯托克法案》解释为全面禁止运送堕胎药物，无论其预期用途为何 [cite: 806, 807]。更广泛的解释可能将接收堕胎药也视为联邦犯罪，并起诉制造商、提供者甚至个人 [cite: 808, 809, 810]。活动家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此法案关闭全美所有堕胎设施，阻止相关医疗和手术用品的运输，这将严重影响堕胎服务乃至流产护理，使可治疗的状况危及生命 [cite: 811, 812, 813]。法律专家认为此策略可能成功将议题诉诸法庭，最高法院的裁决尚不明朗 [cite: 814, 815, 816, 817, 818]。特朗普本人对堕胎问题的态度近期有所摇摆，但他仍可能为取悦基本盘而积极执行《康斯托克法案》 [cite: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 The Truth Won't Matter

特朗普以其“直觉”治国，认为气候变化是党派宣传，消毒剂可治新冠，选举失败必有猫腻 [cite: 830, 831, 832, 833]。其首个任期已显露民主的脆弱；第二任期将威胁民主的基石——公众对共享现实的认同 [cite: 834, 835, 836]。事实需要努力探求，民主亦然，而特朗普则诱导民众将其思维外包给他的直觉 [cite: 836, 837, 839]。他擅长制造问题再自我推销为解决方案，通过制造冲击与荒谬，让世界显得艰难，然后将自己定位为能让美国再次“简单”的救世主 [cite: 843, 844, 845, 846]。谎言不仅扭曲真相，更是彻底摧毁真相，成为其卖点 [cite: 847, 848]。他借用并放大了党派媒体以叙事取代真相的做法，其编造的每个故事都默许听众“凭感觉认定事实” [cite: 849, 850, 851]。真相被重塑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品，消费者只需选择合自己口味的故事 [cite: 852]。这种迎合情感、摒弃理性的做法，限制而非拓展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和同情心，将选民视为顾客——顾客永远是对的 [cite: 855, 856, 857, 858, 859, 860]。特朗普坚持政治中只有情感，将自由曲解为摆脱事实的自由 [cite: 864, 865]。

## Donald Trump vs. American History

特朗普对邦联将领罗伯特·E·李的赞扬，实则是向其白人、男性、南方基督教徒为主的基本盘发出信号，巩固其恢复此类群体主导地位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诉求 [cite: 875, 876, 877, 879, 880, 885, 886, 887]。他已承诺在第二任期将自己错误且有害的历史观强加于学校课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压制不同叙事 [cite: 888, 889]。特朗普计划削减对包含“批判性种族理论、性别意识形态或其他不当内容”的学校和项目的联邦资助，这与一些共和党州已在施行的压制多元历史教学的做法如出一辙 [cite: 890, 891, 892, 893]。他期望的教育是让儿童错误地认为美国历来是正义的灯塔，忽视奴隶制、种族隔离、原住民屠杀等复杂历史 [cite: 894, 895, 896]。为此，他成立“1776委员会”以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标准，旨在清除所谓“谎言”，宣扬美国例外论的“壮丽真相” [cite: 897, 898, 899, 900]。任何揭示不平等或压迫的经验证据都被其描绘为激进运动的意识形态灌输 [cite: 902, 903, 904, 905, 906, 907]。同时，MAGA运动正试图将1月6日事件塑造为一场“失落的事业”，将骚乱者描绘成爱国英雄 [cite: 914, 915, 916, 917, 818]。而真正的爱国教育应是直面美国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道德矛盾，特朗普主义则力图审查此类努力 [cite: 918, 919, 920]。

## A War on Blue America

特朗普执政期间，将“蓝州美国”（民主党主导地区）视为对手，试图将“红州美国”的优先事项强加于这些地区 [cite: 928, 929]。其首个任期行动包括：限制州和地方税收抵扣（损害纽约、加州等高税州富裕居民利益），试图拒绝对“庇护城市”的拨款，并剥夺加州制定更严污染标准的权力 [cite: 932, 933, 934, 935]。在其任期最后一年，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期间，他不顾地方反对，向波特兰、华盛顿特区等蓝州城市派遣联邦执法人员 [cite: 936, 937, 938, 939, 940, 941]。第二任期，特朗普计划升级这场战争：通过联邦立法将红州政策推广至蓝州，例如削减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或性别意识形态学校的资金，调查自由派地方检察官，并以联邦拨款为条件要求城市采纳保守派警务政策 [cite: 942, 943, 944, 945]。他更公开承诺在蓝州城市发起军事化的执法行动，甚至可能形成联邦占领军 [cite: 946, 947, 948]。此外，他还计划通过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手段，执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驱逐行动”，并建立大型拘留营安置无证移民和无家可归者 [cite: 949, 950, 951, 952, 953]。这些举措可能引发混乱、大规模示威乃至地方警察与国民警卫队的对峙，其法律依据模糊，依赖于对《叛乱法》等紧急状态法规的解释 [cite: 953, 954, 955, 956, 957, 961, 962, 963, 964, 965]。特朗普视自己为“红州国家”的领袖，其议程或对国家凝聚力构成内战以来最大威胁 [cite: 966, 967, 968, 969]。

## Trump Isn’t Bluffing

特朗普的言论已变得更加黑暗，例如他声称要“铲除国内像害虫一样活着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激进左翼暴徒”，暗示要对政治异见者进行清洗或镇压 [cite: 974, 975, 976, 977]。这种言论并非全新，但他对2020年败选的愤怒、缠身的法律案件以及对政敌的复仇欲望已使其变得更加极端 [cite: 978, 980, 981]。近期，他自称“非常自豪的选举否认者”，威胁法官和检察官，暗示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应以叛国罪处死，呼吁调查NBC并可能吊销其执照，并誓言逮捕拜登等政治对手 [cite: 982, 983, 984, 985, 986]。公众对此类威权主义言论的警惕性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长期接触导致麻木，另一部分是特朗普离开推特后其极端言论的传播范围受限 [cite: 987, 988, 989, 990]。极端言论通过反复出现而被“正常化”：初听震惊，再听习惯，最终沦为背景噪音 [cite: 991, 992, 993, 994]。特朗普正通过这种方式让国家逐渐适应威权主义，若他再次当选并指示司法部迫害政敌，人们虽会不安，但也可能因其早有预告而见怪不怪 [cite: 995, 996, 997]。

## Civil Rights Undone

2020年底，时任司法部长巴尔曾提议废除司法部在处理歧视案件时使用的“差别影响”标准，该提议因1月6日事件而未实施，但特朗普若连任，必将力推此事 [cite: 1001, 1002, 1003, 1004]。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边缘群体的法律和公民权利总体呈扩张趋势，直至特朗普上任，其政府开始侵蚀民权执法 [cite: 1004, 1005]。在其任内，司法部放弃积极保护投票权，环保署忽视民权投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缩减住房歧视调查，其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也削弱了里程碑式的民权立法并终止了平权法案 [cite: 1006, 1007, 1008]。废除“差别影响”理论将是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削弱民权保护最有效的手段。该理论允许禁止那些无意中对边缘化群体产生不成比例负面影响的做法，而不仅仅是针对明显的恶意歧视，这对于打击隐性或系统性歧视至关重要 [cite: 1009, 1010, 1011, 1012, 1014]。保守派长期质疑此理论，部分人甚至认为确保平等并非合法的联邦优先事项，特朗普时代更助长了这种思想 [cite: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第二任期内，特朗普政府不仅可能放弃该理论，甚至可能提起诉讼试图宣布其违宪，这些改变在当前保守派主导的司法体系下可能永久化，严重削弱解决警察暴行、环境正义及住房歧视等问题的能力，民权时代的根基或将因此瓦解 [cite: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 Trump’s Plan to Police Gender

当前，LGBTQ社群面临政治领导人再度将其污名化为“怪人”和“掠夺者”的严峻气候，多州已出台限制跨性别者权利的措施 [cite: 1047, 1048, 1049, 1050]。特朗普承诺将此类压制行动全国化，干涉数百万成年人的私生活，剥夺多元社会应有的自由 [cite: 1051, 1052]。尽管2016年竞选时曾伪装同情，其首个任期内已广泛撤销对LGBTQ的保护 [cite: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如今，他不再掩饰不容忍态度，公开称跨性别者“病态”、“精神错乱”，并利用此议题煽动选民情绪 [cite: 1059, 1060, 1061, 1062]。其“保护儿童免受左翼性别疯狂侵害的十点计划”旨在从政府层面抹去跨性别者的存在 [cite: 1063, 1064, 1065]。他将推动国会确立性别二元且出生即定的全国性定义，并通过行政令停止所有促进任何年龄段性别转换的联邦项目，这可能导致无法更改护照性别、低收入跨性别成年人无法使用医疗补助获得关键治疗等后果 [cite: 1066, 1067, 1068]。第二任期内，他还将任命更多反对酷儿事业的法官，并继续推广允许不平等待遇少数群体的“宗教自由”解释 [cite: 1069, 1070]。特朗普的连任将进一步鼓励社会歧视，加剧针对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仇恨犯罪，使美国社会对儿童而言更加压抑和危险 [cite: 1072, 1073, 1074, 1075, 1077, 1078]。

## A Military Loyal to Trump

特朗普若再度当选，其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将美国武装部队转变为效忠其个人而非宪法的“禁卫军” [cite: 1084, 1085]。尽管多数军人为专业爱国人士，且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已领教过军方高层并非其私人雇员 [cite: 1085, 1086, 1087]，但他及其团队已吸取教训 [cite: 1088]。第一任期内，由于缺乏组织和华盛顿政治经验，以及军官和文职官员的抵制（如反对暗杀阿萨德、反对动用军队镇压BLM示威），他未能完全控制国防部 [cite: 1089, 1090, 1091, 1092]。特朗普对那些阻止其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军方高层（如米利将军）尤为怨恨，甚至暗示米利应判死刑 [cite: 1092, 1093, 1094, 1095]。第二任期，他将寻求报复并瓦解军队作为宪法和法治的制约力量 [cite: 1096, 1097]。他将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安插亲信（如塔塔、麦格雷戈）实现对国防部高层的威权控制，并可能利用“F计划”将关键文职岗位变为政治任命 [cite: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通过影响人事任命和晋升，以及利用军中存在的政治素养不足问题，特朗普可能在军队内部培养对其个人的效忠，从而发布非法命令（如酷刑、战争罪、动用核武、国内镇压），最终对国家安全和民主制度构成致命威胁 [cite: 1122, 1124, 1125, 1126, 1134, 1135, 1136, 1137, 1138, 1139, 1140, 1141, 1142, 1143, 1144, 1145, 1146, 1147]。

## The Left Can’t Afford to Go Mad

特朗普时代不仅激化了右翼，也让许多左翼人士陷入非理性状态，特别是部分中上层白人自由派因他人无法认同特朗普的恶劣而备受打击 [cite: 1156, 1157, 1158]。最初的抗议（如反对穆斯林旅行禁令的法律挑战）尚有成效，但很快演变成戏剧性强而影响力弱的愤怒表达 [cite: 1159, 1160, 1161]。部分“抵抗运动”成员沉迷于社交媒体，对特朗普的言行不加区分地抨击，并幻想通过弹劾、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等方式将其赶下台，却收效甚微 [cite: 1162, 1163, 1164, 1165, 1166]。左翼未能有效引导反特朗普的政治能量，反而转向内部净化，清除异见，将政治分歧上升为道德缺陷 [cite: 1170, 1171, 1172, 1173, 1174, 1175, 1176]。2020年的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也未能使其清醒，反而陷入更深的僵化思维，例如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之际，一些活动组织却纠结于语言的“纯洁性” [cite: 1177, 1178, 1179, 1180, 1181]。一个糟糕的政府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应致力于争取同盟而非清除异端 [cite: 1182, 1183]。拜登的胜出正是因为其温和务实路线赢得了更广泛选民的认可 [cite: 1186, 1187, 1188, 1189, 1190, 1911]。面对特朗普可能回归带来的巨大挑战，左翼必须吸取教训，着眼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如反对操纵选区、选举干预、堕胎禁令等，而非沉溺于内部的文化战争 [cite: 1193, 1194, 1195, 1196]。重回理性的道路在于说服、捍卫言论自由与法治、清晰冷静地反对特朗普的滥权行为，并提供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cite: 1197, 1198]。

##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American Psyche If Trump Is Reelected?

拜登的总统任期让美国民众从特朗普时代持续的心理高压中获得喘息 [cite: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若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人可能重回长达四年的“战斗或逃跑”模式，这对身心健康是巨大考验 [cite: 1210, 1211, 1212, 1213]。慢性压力会导致“静态负荷超载”，引发情绪障碍、药物滥用、心脏病等多种疾病 [cite: 1214]。持续的政治高压，如特朗普2016年当选曾与拉丁裔妇女生育早产率上升相关 [cite: 1219]，以及特朗普制造的“技术压力”（因其快速发布破坏性新闻引发的强迫性信息查阅） [cite: 1220, 1221, 1222, 1223]，都将对公众心理健康造成损害。民调显示，2020年大选已是许多美国人的主要压力源，甚至有少数人因此产生自杀念头 [cite: 1224, 1225, 1226]。特朗普的回归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习得性无助”，使民众陷入绝望和冷漠，这正是威权者所乐见的 [cite: 1227, 1228, 1229]。共和党官员将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则可能更加狂热，加剧社会仇恨犯罪 [cite: 1230, 1231, 1232, 1233, 1234, 1235, 1236, 1237]。即使特朗普败选，社会两极化带来的心理负担也难以消除 [cite: 1237, 1238, 1239]。若宪法秩序瓦解，这些心理问题恐将显得微不足道 [cite: 1240, 1241, 1242]。

## Trump Voters Are America Too

米歇尔·奥巴马在2016年针对特朗普竞选时所言“那不是我们（美国人）”如今看来更像一种自由派的良好愿望，而非对国家特性的准确评估 [cite: 1248, 1249, 1250, 1251, 1252, 1253, 1254, 1255, 1257]。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并在精英阶层宣称“我们比这更好”时，解读为“我们比他们（特朗普支持者）更好” [cite: 1260, 1261, 1262, 1263, 1264, 1265, 1266, 1267, 1268]。尽管经历了混乱的总统任期，特朗普在2020年仍获得近47%的选票，显示其民粹主义号召力依然强劲，选民的怨气未消 [cite: 1270, 1271, 1272, 1273, 1274, 1275, 1276]。1月6日事件的野蛮及其后147名共和党议员投票不承认拜登胜选，以及共和党高层迅速重归特朗普阵营，都表明共和党内多数人从未停止支持他或相信选举被窃 [cite: 1277, 1278, 1279,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1285, 1286, 1287, 1288]。如今，特朗普似乎将顺利获得第三次共和党提名，并与不受欢迎的现任总统势均力敌，一个持久的选民联盟依然信任他 [cite: 1289, 1290, 1291, 1292]。特朗普的选民与任何理想化的美国愿景一样，都是美国的一部分 [cite: 1293]。若特朗普在2024年获胜，其反对者必须再次正视这些选民的选择，并反思与这些持续支持特朗普走向道德沦丧的公民共享一个国家的意义 [cite: 1294]。

## My Father, My Faith, and Donald Trump

本文作者Tim Alberta在父亲的葬礼期间，遭遇了教会中部分人士因其著作中对特朗普的批判而进行的政治挑衅，此事令他深感痛心并开始反思美国福音派的现状 [cite: 1300, 1302, 1382, 1383, 1389, 1390, 1391, 1393, 1394, 1395, 1396, 1397, 1398, 1399, 1400, 1403, 1420, 1421, 1422, 1423, 1424,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作者的父亲是一位福音派牧师，他本人在保守的教会环境中长大，对基督教信仰有深刻理解 [cite: 1313, 1358, 1377, 1378]。文章探讨了其父亲复杂的信仰历程，以及福音派内部在特朗普时代日益加剧的政治化和分裂 [cite: 1310, 1311, 1321, 1331, 1332, 1430, 1431, 1432, 1433, 1434, 1457, 1458, 1459, 1460, 1461]。通过与其父亲继任者Chris Winans的对话，揭示了教会内部因政治立场不同而产生的冲突、焦虑和信徒流失现象 [cite: 1481, 1483, 1493, 1503, 1504, 1505, 1507, 1512, 1513, 1514, 1515, 1516, 1517, 1518, 1519, 1520, 1521, 1522, 1523]。Winans认为，部分福音派信徒将国家偶像化，将美国视为上帝的立约之地，这种“美国崇拜”已成为一种偶像崇拜，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cite: 1528, 1529, 1530, 1531, 1532, 1533, 1534, 1555]。文章最终指向对美国福音派信仰本质的深刻质疑 [cite: 1554]。

## SNL’s New Kings of Bizarro Buddy Comedy

文章回顾了《周六夜现场》(SNL)数字短剧的演变，从The Lonely Island的“Lettuce”和“Lazy Sunday”的早期探索，到其凭借“Dick in a Box”等作品将病毒式传播和名人效应结合的巅峰 [cite: 1564, 1565, 1566, 1567, 1568, 1569, 1570, 1571, 1572, 1573, 1574, 1575]。在The Lonely Island离开后，SNL一度难以复制其成功，直至2021年雇佣了Please Don’t Destroy三人组（Ben Marshall, John Higgins, Martin Herlihy） [cite: 1576, 1577, 1578, 1579, 1580, 1581]。该组合以其在TikTok等平台发布的短视频积累了高人气，他们的喜剧风格捕捉了智能手机时代喜剧的狂躁、跳跃能量 [cite: 1581, 1583]。其作品常从平凡场景迅速转入偏执的歇斯底里，节奏快速，具有TikTok美学特征，探讨了Z世代的兄弟情谊和男性焦虑，以一种超现实且更细致的方式描绘了男性友谊 [cite: 1584, 1585, 1586, 1587, 1588, 1589, 1590, 1591, 1592, 1593, 1594, 1595, 1596, 1597, 1598, 1599, 1600, 1601, 1604, 1605, 1606, 1607]。近期，他们推出了电影《Please Don’t Destroy: The Treasure of Foggy Mountain》，但影片未能完全转化其短剧的精髓，显得有些冗长 [cite: 1608, 1609, 1610, 1611, 1612, 1613, 1614, 1615, 1616, 1617]。

## What Does the Working Class Really Want?

文章探讨了美国政党对工人阶级选民的认知与争取。历史上，两党都曾梦想通过赢得特定群体的支持来实现政治版图的永久性重划，但美国政治格局持续拉锯 [cite: 1623, 1625, 1626, 1627, 1628, 1629, 1630, 1631, 1632, 1633, 1634]。当前两党都存在一种“魔法思维”，不相信对方的合法性，并将选举失利归咎于舞弊而非民意 [cite: 1635, 1636, 1637]。两党选民基础发生了显著的阶层转变，受教育程度成为划分政治立场的重要因素，文化和社会议题也压倒了经济议题 [cite: 1642, 1643, 1644, 1645]。David Leonhardt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美国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升降及政治倾向的转变，指出民主党因精英化和议题转向（从民生到身份政治、环保等）而疏远了工人阶级 [cite: 1658, 1659, 1660, 1661, 1667, 1668, 1669, 1670, 1671, 1672, 1673, 1674, 1675, 1676, 1677, 1678, 1679, 1680, 1681, 1682, 1683, 1684, 1685, 1686, 1687, 1688, 1689, 1690, 1691, 1692, 1693, 1694, 1695, 1696, 1697, 1698, 1699, 1700, 1701, 1702, 1703, 1704, 1705, 1706, 1707, 1708, 1709, 1710, 1711, 1712, 1713, 1714, 1715, 1716, 1717]。Judis和Teixeira则呼吁民主党回归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中间立场 [cite: 1718, 1719, 1720, 1721, 1722, 1723, 1724, 1725, 1726, 1727]。Joshua Green认为民主党内部已出现民粹主义转向的复兴 [cite: 1728, 1729, 1730, 1731, 1732, 1733, 1734, 1735, 1736, 1737, 1738, 1739, 1740, 1741]。共和党方面，Patrick Ruffini则展望了共和党建立多种族民粹主义联盟的可能 [cite: 1744, 1745, 1746, 1747, 1748, 1749, 1750, 1751, 1752, 1753, 1754, 1755, 1756, 1757, 1758, 1760, 1761, 1762, 1763, 1764, 1765]。文章最后指出，工人阶级关注的是稳定与尊严，而非简单的经济或文化议题划分，政党应致力于解决其真实需求 [cite: 1778, 1779, 1780, 1781, 1782, 1783, 1784, 1785, 1786, 1787, 1788]。

## Zombie History Stalks Ukraine

乌克兰作家Tanja Maljartschuk的小说《被遗忘》（Forgottenness）探讨了“僵尸历史”——即祖先经历的灾难性事件创伤在后代身上的隔代遗传与再现 [cite: 1793, 1794, 1795]。小说主角，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年轻女作家，通过强迫性拖地行为重现了其外祖母索尼娅在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期间所经历的饥饿与恐惧 [cite: 1796, 1797, 1798, 1799, 1800,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813, 1814, 1815, 1816, 1823, 1824]。小说将记忆的挖掘比作一场“复活”，旨在对抗历史的湮没与时间的吞噬 [cite: 1817, 1825, 1826, 1827, 1828, 1829, 1830, 1831, 1832, 1833, 1834]。小说交织叙述了主角的故事与20世纪初乌克兰政治思想家维亚切斯拉夫·利平斯基的生平 [cite: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利平斯基是乌克兰国家地位理论的倡导者，主张基于共同土地而非血统的“地域主义”公民身份认同 [cite: 1851,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小说通过对利平斯基及主角祖辈（如祖父博姆奇克）经历的描绘，展现了个人创伤与民族历史的交织，以及身份认同在动荡历史中的挣扎与重塑 [cite: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尽管结局带有悲观色彩，但小说本身的存在即是对遗忘的抗争，强调了幸存与记录记忆的责任 [cite: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BM Way’

文章借由Ralph Watson McElvenny与Marc Wortman合著的传记《史上最伟大的资本家》，回顾了IBM及其20世纪中期CEO小托马斯·J·沃森的历程，展现了这家科技巨头如何从机械技术成功跨越到电子技术，引领数字时代 [cite: 1924, 1925, 1932, 1933, 1934]。IBM在大型企业中独树一帜，既具创业家精神，又长期保持家族式管理，并在萧条时期承诺员工终身雇佣，秉持“尊重个人”的信条 [cite: 1934, 1935, 1936, 1937]。IBM的文化融合了进步主义与家长式作风，强调社区精神与激烈竞争 [cite: 1938, 1939, 1940]。老沃森奠定了公司文化及穿孔卡技术的基础 [cite: 1949, 1950, 1951, 1952]。小沃森则在与父亲的持续冲突与竞争中，推动IBM果断进入计算机领域，并以System/360这一革命性产品线（尽管风险巨大）巩固了IBM的领导地位 [cite: 1969, 1970, 1971, 1972,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然而，家族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对公司和个人造成了伤害 [cite: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IBM后来因未能把握个人电脑和软件市场的机遇而陷入困境，其一度引以为傲的“IBM之道”也逐渐消亡，终身雇佣制被打破，公司文化发生巨变 [cite: 2019,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如今，IBM凭借新的人工智能产品watsonx寻求复兴，这或许是其创始人未曾预料到的“永生”方式 [cite: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 Camille Claudel’s ‘Revolt Against Nature’

文章介绍了法国雕塑家卡米耶·克洛岱尔的艺术生涯及其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和洛杉矶盖蒂博物馆举办的新展览 [cite: 2040, 2041, 2051, 2058, 2059]。克洛岱尔在19世纪男性主导的艺术界中努力争取认可，其作品（如《华尔兹》）虽获赞誉，却也因其大胆的女性身体描绘而遭遇官方阻挠 [cite: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75]。她与导师奥古斯特·罗丹的复杂关系（既是艺术合作者也是情人）长期掩盖了其自身的艺术成就，甚至有评论认为其佳作可被视为罗丹之作 [cite: 2045, 2055, 2056, 2060, 2066, 2067, 206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然而，展览有力地证明了克洛岱尔的独创性及二人艺术上的相互影响，例如《年轻的罗马人》、《带穗的年轻女孩》等早期作品已展现其天赋，而《蹲着的女人》、《克洛托》、《小女堡主》、《唠叨的女人们》以及《成熟的时代》等作品则进一步凸显了她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和独特的艺术视角，使其与罗丹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并摆脱了其影响 [cite: 2057, 205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尽管克洛岱尔的才华令同时代人惊叹，称其为“反抗自然的女性天才” [cite: 2143, 2144, 2145, 2146]，但她最终因精神问题被家人囚禁于精神病院三十年直至去世，未能继续其艺术创作 [cite: 2063, 2064, 2065,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此次展览及时地重新审视了克洛岱尔的艺术贡献，并提醒人们当女性的选择权被剥夺时所造成的损失 [cite: 2162, 2163]。